

歷史的先聲

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笑蜀編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毛澤東 —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答中外記者團

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

已。我們還得當心，有人會用好東西去做壞事情的呵！

《新華日報》 —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答讀者問

ISBN 962-86421-2-X



9 789628 642120

01-0207+09

集成圖書

TEL: 23886172

\$100.00

定價：港幣一百元

111
F3
388

歷史的先聲

——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笑蜀編

博思出版集團

歷史的先聲

燭火文叢 02

2002年5月初版 定價 100 港元

編者 笑蜀

美術設計 葉譔曉

發行人 譚觀照

執行編輯 博思出版集團編輯部

出版者 博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英皇道 625 號 13 樓 1305 室

電話 (852) 2561 7733

傳真 (852) 2562 4233

香港經銷 全力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 5 8 — 7 6 號

和豐工業中心 1 樓 8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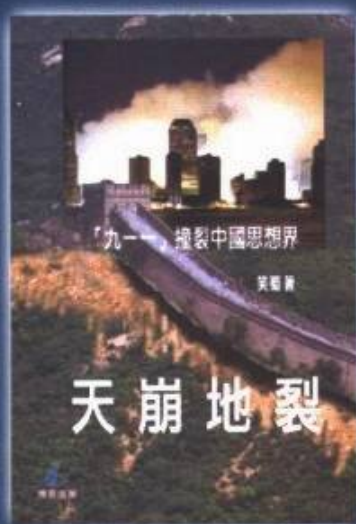
電話 (852) 2494 7282

傳真 (852) 2494 7609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反思現代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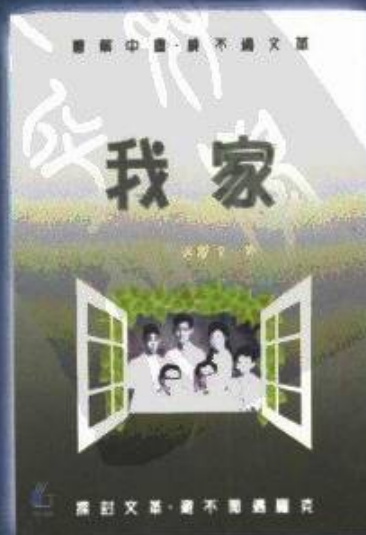


9.11 與中國





上海右派的故事



文革：中國永遠的痛

目錄

9 序：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

第一輯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 34 中國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
- 36 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
- 37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和提高人民
- 39 「我們相信、並且實行民主」
- 40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 41 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 44 民主第一
- 47 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 49 我們要看貨色
- 50 是不是代用品呢？
- 52 不是空喊民主
- 54 民主與誠實
- 56 強大而民主

- 58 民主與國情
- 60 團結與民主
- 63 諸葛亮與阿斗
- 65 民主的真義
- 67 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
- 72 戰時必須實行民主
- 75 民主國家的武器——民主（節選）
- 80 民主精神
- 82 民主原則
- 91 蔣夫人論民主精神
- 94 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
- 97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
- 99 建立憲政規模
- 101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 104 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
- 107 「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 109 科學、民主，繼續前進
- 111 中國需要「變」——摘某報社論
- 113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第二輯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 118 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 122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 125 為民主拚命
- 126 工程師和民主



127 關心政治・改良政治—— 一位工程師的話

第三輯 民主主義的利器

128 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131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133 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門爭節日

137 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

140 祝賀美國國慶

144 紀念杰斐遜先生

146 真實的民主戰士

150 美國的民主傳統

151 為了人類

153 「每一個在華美國兵都應成為民主的活廣告」

156 中美兩國是天然盟友

157 「我們不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

160 「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163 羅斯福的廣播演說：四大自由

166 東西不同論（二則）

167 延安印象記：中共對美國的友誼是真誠的

169 加強中美人民的合作

171 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第四輯 讓思想沖破牢籠

176 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179 駁「灌輸」理論

- 182 奴隸的語言
- 184 讀書與自由
- 186 論「天真無邪」
- 188 沙漠化的願望
- 193 文藝必須爭取民主
- 195 言論自由與民主
- 196 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 202 不許人民說話和欺騙人民的歪風
- 205 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 207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 210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 213 反對反動的新聞政策
- 219 要為真理而鬥爭
- 221 民主主義的利器
- 222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自由的保障書
- 224 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 225 出版自由：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 228 論學術自由
- 231 獎勵自由研究
- 234 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 242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

第五輯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 248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 251 論選舉權

255 競選

第六輯 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257 斥「人格教育」

261 學校要成為民主的堡壘

264 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

268 民主和自由新論

271 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

275 「民主一日不實現，學生運動一日不止」

278 睜睜眾目豈容狡辯 屠殺學生罪責難逃

283 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284 為死難學生呼籲

285 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286 人民是騙不了的

287 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288 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290 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節錄)

300 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303 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305 重視青年

第七輯 私人資本須自由發展

306 唯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

310 戰後私人資本的機會

311 「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就是自取滅亡」

314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323 為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第八輯 天賦人權 不可侵犯

326 切實保障人民權利

329 保障人權

330 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333 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336 自由不是專賣品

337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標尺

340 保障人民自由的開端

343 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345 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

349 限制遊行，人民自由又遭損害

350 快釋放政治犯

351 法治與人權

第九輯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356 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357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360 民主的正軌：無保留地還政於民

363 中國共產黨不會模仿蘇聯制度

366 共產黨員無權力排斥和決斷一切

370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376 共產黨絕不搞反民主的一黨專政



- 380 中國共產黨徹底實踐民主政治
- 381 三三制的實質：政權共享
- 385 全民民主優於階級民主：以三三制為例
- 387 三三制：一黨專政的天敵
- 390 政權開放才有利於黨的領導
- 394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敢鬆懈」
- 395 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 396 政黨不可凌駕於政府群眾之上
- 402 論延安學校中支部對群眾團體的關係
- 406 政府權威非築於群眾畏懼
- 407 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

第十輯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

- 409 合法的罪惡
- 414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
- 418 民不畏死
- 420 人權和觀瞻
- 421 論無恥主義
- 423 風氣・秩序・容忍
- 424 「黑名單」
- 426 希特勒的「民意」
- 427 「守法精神不夠」論
- 428 奴才見解
- 432 今與昔
- 434 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不要分割

436 言論思想自由和國際文化交流

代後記

438 還要走很長的路

447 重讀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

464 憲政民主：現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李普

鍾沛璋

何家棟



序

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

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

說它是夢，是因為夢到了過去。但是它又不太像夢，雖然長長的五六十年的時間給它蒙上了一層惆恍迷離的薄霧輕紗，然而它畢竟太真實。收在這裏面的上百篇文章，幾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過、讀過，學習過，並且宣傳過的。這些文章講話與文件都發表在 1941 年到 1946 年，正好是我上大學到參加工作的時代。我曾經據以領導過當時的抗日民主學生運動，這些文章就是我們當時的口號和綱領。抗戰勝利後我到了新華日報。雖然我是新手，輪不上我寫這書裏面收的文章，我現在也沒有能力辨認這裏的哪篇文章是誰寫的。但是我還分明能記憶起這些文章的作者們的音容笑貌來，他們大多已經過世了：范劍涯、鍾穎、陳馳、鄒適今……且不說名氣要大得多的領導人潘梓年、章漢夫、張友漁、夏衍……當然還有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自己就是當時的一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

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甚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甚麼滋味。

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是誰又騙了我呢？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有一個老朋友，六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中共黨員，1957年的時候在駐外使館工作。使館本來是不劃右派的，不知怎麼他忽然在夏天回國一行，結果當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與我重逢，我問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說，「我在美國把那麼多留學生都動員回國了，他們紛紛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脫了，怎麼對得起別人呢」？

我只能說，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抗戰壓倒啟蒙。這是得到許多人贊同的，我也曾經以為此說近乎情理。戰

爭總是要限制一點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關軍事機密的新聞，也要送審，何況民主意識十分薄弱，自由權利十分脆弱，而專制主義又根深柢固的中國。但是讀完這本書，卻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中國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見本書《歷史的先聲》第34頁）；「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類似的言論充塞在這本書中。

其實，就整個抗戰時期（1937—1945）而言，毛澤東和共產黨主張民主的言論，本書失收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澤東在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他又說：「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43—264頁）

憑這些，怎麼能得出結論說，抗戰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當然，這是共產黨方面的要求，如果執掌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相應不理，也還是沒有辦法。但是，國民黨好歹接受了共產黨方面的意見而決定對日抗戰了。抗戰開始前夕，以武裝對抗國民黨十年而且自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就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從「匪黨」變成「友黨」

了。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約略類似於兩黨並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開頭所說的「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655頁）。不過這個比喻實在不大恰當，因為國共兩黨歷來都是擁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實是很表面的，內裏都是極力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甚至吃掉對方，因此合作幾度瀕於破裂，總算勉強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舉行了中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實現中國人民的百年大願——民主憲政時，連《和平建國綱領》都協定通過了，但是就是因為國共雙方在軍隊國家化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上相持不下使會議的結果歸於流產。會議在慶祝成功半年之後終歸破裂。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國的命運還是要靠武力來決定。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曾有過六次民主啟蒙運動，第一次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1898）維新。第二次是辛亥（1911）革命，推翻了清朝，使傳承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從此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但是卻並不能阻止更精密嚴酷的專制主義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給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1927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打倒了軍閥，重新統一了中國，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

到了全國各地。第五次是1937年的抗戰開始以後，後來因為軍事上失利，抗戰越來越艱難，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也越來越大而使民主運動趨於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敗的徵象已露的時候，才又出現了第六次民主運動的高潮。抗戰勝利以後，百年國恥已經洗盡，租界已經收回，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領事裁判權已經撤銷，中國已經以五大強國之一的身份不但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手中握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人們認為1840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民族願望——實行憲政民主已經伸手可及了，因而熱烈參與討論起「民主建國綱領」來。這場運動一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完全消滅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二十年的統治，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綱領才算結束。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民主啟蒙運動的結束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最後結束。十一年以後，還有一次為回應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然而那不過是以前歷次民主啟蒙運動哀痛而淒厲的回聲而已，凡是鳴放了一聲兩聲的右派分子的悲慘下場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了。

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說明了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東方大國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說明樹起了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運動實際上並沒有使二者在中國紮下根來。中國人從根本上說並不懂得甚麼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誰都說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甚麼？必要條件是甚麼？

所有上面所說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後，就根本沒有人進行認真的啟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說盈中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句時髦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

首先證明這一點的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與「賽先生」也就是把「民主」與「科學」請進中國來的陳獨秀，就根本沒有搞懂甚麼是民主。雖然他先驅之功永不可沒，但是在五四運動的第二年（1920年）也就是他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8卷4號）上發表文章《民主黨與共產黨》，反對起資產階級民主而鼓吹起無產階級民主來了。他說：「民主主義是甚麼？乃是資本家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地國裏，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它。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裏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任何國家裏，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 67 頁，三聯書店 1984 年版）

無產階級民主由陳獨秀這樣的雄傑之士來提倡，其價

值與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陳獨秀是中國左派的開山祖師，從此以後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經過二十年的磨煉閱歷而重新覺悟回歸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來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 1940 年 11 月的《我的根本意見》中說：

「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於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辭，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在同年 9 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為的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此外他還說，「無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是領袖獨裁」。

陳獨秀的二次覺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經經過擴大宣傳而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牢牢地紮下根了。當時的陳獨秀已是「刑餘之身」，貧病衰老，僻處江津小城內。他的話已經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道，以他當時「托派」的身份，也只會被認為是「叛徒的囈語」，只有當年與他並肩戰鬥過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視，加以露布，然而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

看一看《先聲》就可以發現，許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還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其中說「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先聲》第 222 頁）最嚴密的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經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而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

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 1944 年 5 月 14 日在軍政座談會上說，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是我們當時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把報上登的他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也把他寫進自己的社論《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先聲》第 333 到 335 頁）。

總之，讀者要是仔細研究本書，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左派其實並不真懂民主，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不妨打開本書，看看當時名望很高的張申府寫的《民主原則》，就可以發現，這位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清華大學的哲學教授、羅素的朋友、著名的民主人士對於民主原則的解釋實在是混亂一團，與前面所引陳獨秀言論的乾脆明了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他還肯定「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可笑的是，當時作為左派學生的我們，水平可能更低，信心反而更足。尤其是蘇聯在 1936 年搞出了一個「斯大林憲法」，在 1941 年因為納粹的進攻而以民主國家的一員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後。

蘇聯的無產階級民主由革命初期規定的，工人階級五萬人選一名蘇維埃代表，非無產階級二十五萬人選一名代表開始，此時已發展出一套稱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我雖然年紀還小，倒也似乎曾經研究，學習過一番，很覺得它法理嚴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多麼辯證！好像比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孫中山主張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更加「簡潔」。可憐從來沒有過民主經驗的中國人，只要在文字上調一個花腔，就連專制與民主都分不出來了。只有後來嚐夠了幾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實際上根本談不上有甚麼民主可言，才認識到康生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乃是大實話。

當然也不能說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懂得民主的人都沒有。五四以前，至少嚴復是懂得的。五四以後，胡適和由他帶出來的一批留洋學生，如蕭公權、錢瑞升、張奚若、羅隆基、儲安平……應該是懂得的。但是，首先從數量上說，在當時號稱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中就不過是零頭的零頭，不但不足萬分之一，也許不足百萬分之一。這批人在一個基本上實現了民主的國家裏也許都足以有為，但是在一個專制主義已成國民思維定勢的國家裏，實在是一點施

展的餘地都沒有。嚴復晚年歸於保守，擁戴袁皇帝，也許也是認為中國只有實行君主立憲制才有出路。至於胡適等人一輩子只能癡心於改良而又始終等不到改良的機會。國共談判的時候，胡適曾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共轉變為一個不憑藉武力的議會政黨，成為中國的第二大黨，然而這話也不過是癡人說夢而已。

現在有人惋惜，胡適的建議沒被採納，中國失去了一個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機會。這實在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的話。在我們這些左派眼裏，他是「拉偏架」，是替國民黨「為虎作倀」，根本不該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勢力迅速擴張，決定了中國的前途。

根據馬列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給農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這樣對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義，可以說與上面陳獨秀所悟到的民主定義，也就是現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認識的民主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當時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接受這樣的定義，它當然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得到對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認識。

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毛澤東卻在1937年歸納了十一種不怎麼合乎「黨性」的行為，稱之為「自由主義」的表現，專門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同時他更是不斷地批評個人主義，直到稱之為「萬惡之源」，從而切斷了對

民主的正解。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中國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這個詞在中國用得泛化已極。就我個人經驗所及，沒有哪一個國家如此濫用這個詞兒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這種做法不民主，那種做法真民主。……」這樣的話幾乎隨時隨處都可以聽到，也不知該怎麼翻譯才能使外國人聽懂。中國古來沒有的「科學」這個詞兒也用得一樣泛濫。引用一句毛澤東愛講的辯證法：「甚麼都是它，就甚麼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真的是夠得上這個格兒了。另外，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的「真理」這個詞兒，在五四以後也流行得離譜，我們都是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犧牲的。

最近，我曾問一個我同時代的同學和戰友「甚麼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獨裁」。這也許可以代表我們當時大部分人的認識。甚至我們的師長一輩學識大大超過我們的民主人士，如馬寅初、聞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據這樣的認識而被捲入毛澤東所說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屢遭敗北，卻又不思改進，貪腐日甚，導致群情憤慨。然而蔣介石仍然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張，獨裁與腐敗的程度有增無已，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識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

1957年，毛澤東在反右派運動中發明了一個「反面教員」的概念。不過這個概念事實上並沒有使他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處，反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為人為地製造反

面教員而逐步敗壞了他自己的威信。不過在抗戰開始以後的整個四十年代，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反面教員」卻實實在在地幫了他的大忙。無數的知識分子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因為反蔣反國民黨而被吸引到了共產黨這邊來。由於中國人對民主完全沒有經驗，民主的政治覺悟極低，他們反獨裁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老的獨裁者打倒了以後極可能會有新的獨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國傳統的王朝輪迴一樣。像英國人那樣在對德戰爭剛取得勝利而對日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就把自己的戰時領袖、民族英雄邱吉爾選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權而成為獨裁者這樣的政治智慧，是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是因為在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抗日，比民主更高的價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幾年才發現了胡適的價值的我，在六十年前跟大批進步青年一樣是不大看得起胡適的，認為他戰鬥性太差，我們景仰的是戰鬥性最強的魯迅。魯迅的洞察力，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對阿Q性的揭露與鞭撻，其力度都是無可比擬的。毛澤東說魯迅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這話也許不夠確切，然而以魯迅晚年思想發展的傾向來說，這個評語並非沒有根據。我們都是跟魯迅走的，走著，走著，就是要走向共產主義。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光榮，是我們心甘情願的歸宿和目的。

上面，「我」變成了「我們」，因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說，我的思想歷程大體上代表了與我同時代的左派青年「進步」的歷程。我今年年近八十，還敢不嫌狂妄地說，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年齡段的知識分子（當時都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大體上都經歷過相似的歷程，而這一批人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骨幹。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贏得相當的民心，取得若干的成就，這一個年齡段的人的功勞是主要的。

稍後於魯迅帶領我們進入馬列主義理論之門的是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後來改名為《大眾哲學》，成為暢銷書了）。再深一點，就是米丁的《新哲學大綱》，比起《大眾哲學》來，可以稱得是權威的巨著。除此而外，還有可以包括社會科學幾乎全部領域的三本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分量都差不多。奇怪的是，內容也差不多，講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簡單一點說，就是社會發展史。這些書，我大體上都讀過，我的印象是，對我們那一代或者幾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大概都是這樣由啟蒙而起信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我在上海的舊書攤上買到過一本日本學者河上肇著、陳豹隱譯的《經濟學入門》，我曾把它從上海帶到北平燕京大學，還沒有來得及看，就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學校，我因為怕出校門時被搜出來而沒有帶走。這是1938年王亞南、郭大力的《資本論》全譯本出版以前，中國關於馬克思主義最高深的著作，

大概是比我大十歲以至二十歲一代人的啟蒙讀物甚或是高級讀物了。當然其他各色各樣的啟蒙讀物還有很多很多，但是以上所舉已足以代表。至於奉斯大林的旨意編寫，被毛澤東稱為「共產主義的百科全書」的《聯共黨史》，當時國內極難見到（我倒在成都地攤上買到過一本莫斯科中文版）。它的普遍流傳成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聖經」，是更後的事情了。

此外，無論如何不能忘掉的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此書於1938年出版以後，立刻風行全國。一個美國人以客觀的立場讚揚共產黨，使我們那一代的青年無不為之傾倒。我曾把此書介紹給一位比我大四十歲而對共產黨素無認識的老先生看過，他的評語是：「照這書裏寫的看，共產黨人不但個個是天兵天將，而且個個是大聖大賢」。這本書的作用，抵得過許多本一般性的啟蒙讀物與理論著作。在這方面早兩年出版的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也是一個範例，雖然分量與影響要小得多。

對當時的左派來說實際上有兩重價值。第一重價值當然是民族主義，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價值就是經由社會主義革命而達到共產主義。照我們相信的毛澤東的理論，這兩者不但毫無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裏了，可以說實際上，並無獨立的民主這個價值。我們叫抗日叫得這麼起勁，叫民主叫得這麼起勁，實際上不僅為著抗日，也為著革命。

有人發現《先聲》九十多篇文章中絕大部分是在重慶發表的，在延安發表的不過十來篇。在當時看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實行的已經是新民主主義了。它已經是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了。還有甚麼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對尚未解放的中國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蔣管區和日佔區的。

現在是人們漸漸了解1942年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怎麼樣發展到荒謬絕倫的，完全罔顧人權，違反民主的審查幹部與搶救運動，製造出成千上萬的「特務」的慘劇的事實了。老實說，我當時在成都也看到過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是我一概不信，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的造謠。後來到了延安，知道這是真的了，但是向我講自己被迫承認是特務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發發牢騷，當笑話講講而已。最嚴重的評語不過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絕對沒有一個人把這種做法提到違反民主、人權的原則上來的。韋君宜的《思痛錄》，現在讀起來當然傷心酸鼻。但是她當時也還沒有從原則高度來認識。

這正好證明了中國左派對現代民主毫無認識，也正好證明了他們除了抗日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革命的價值。毛主席說，為了革命必須把屁股轉過來，也就是轉變立場，他們跟著做了，直到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毛主席說，把他們打成特務是搞錯了。他們又跟著改口，也並不覺得有甚麼可恥。「識大體、顧大局」是中國傳統中極高的道德標準，用現在還流行的話說，是「被爹娘打了一頓，你還能怎麼樣」？為了革命的利益，個人受一

點委屈又算得了甚麼？正是因為有著比抗戰的價值更高的價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釋。

1941年4月，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艱苦時期，「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蘇聯居然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裏面竟然有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它對中國的傷害，正如同1939年8月蘇聯同納粹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波蘭和整個歐洲造成的傷害一樣，它理所當然要激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抗議。連共產黨的老朋友沈均儒、黃炎培、王造時……這樣的人也都向蘇聯發出了抗議。但是奇怪的是，這樣一件大事在重慶不過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幾個漣漪而已，並沒有引起甚麼轟動。我不知道當時的《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是怎麼反應的，只知道在重慶是由周恩來出面找那些有意見的民主人士談了談，大概總是說蘇聯在帝國主義包圍下要保護自己這個社會主義祖國，決不會損害中國的利益，而且最後是有利於中國的長遠利益的，不要「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時衝動」（《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33頁注2）。為甚麼這樣一件大事，輕易地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已經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掌握住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進步學生」。只要學生不鬧事，就不會有大的風波。

現在可以看到1941年4月16日《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了，其中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

地位極大地提高了」。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州和外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於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傢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聖事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贊助我們這種事業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941—1942》第 75—77 頁)

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我沒有看到過這個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定會擁護的。蘇聯還能有錯？中央還能有錯？毛主席還能有錯？

對比尤其明顯的是，1946 年年初，由於蘇軍在東北拆遷機器，並且殺害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學生進行抗議遊行。說實在的，其規模之「大」可能在中國是空前的。我當時正由成都到重慶，一路上看到鄉下的田間小道上都有中小學生排著隊，搖著旗子喊口號。一到重慶，就讀到了《新華日報》的社論：《愛國不等於排外》。當時蘇軍在東北搶掠姦淫的惡行，雖然我們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國人知道的是很多的，僅僅因為大學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動，也就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風波。相對比之下，僅僅一個月前昆明的「一二·一」與一年以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萬學生抗議

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而舉行的示威遊行。其勢頭之猛烈簡直不能相提並論。

革命的價值壓倒了民族主義的價值，當然也就壓倒了民主的價值。這兩重價值說並非我的一己之私見。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在 1940 年在《新民主主義義論》裏就公開聲明：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680 頁）。

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也分不清甚麼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為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組織聯合政府而努力時，我們擁護。當談判破裂，政協失敗，中央一再傳達下來說「國民黨不肯跟我們搞聯合政府，我們就單獨打天下，省得拖泥帶水」。我們也擁護。經過二十多年的「新啟蒙」，整個中國的左翼，已經完全賓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了」。

可能是中國百年來的處境是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緣故，馬列主義的思潮——共產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傳播特別迅速，特別有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691 頁）我們當時看到這話，都認為是合乎事實的。我談不上有多

少學問，然而幼承庭訓，也讀過一些古書，從小學到大學受的是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畢業以前也自己看過《資治通鑑》這樣的大部頭書，然而只要一接觸到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就立刻為之吸引而折服。第一是覺得它的道理新，第二是覺得它的體系廣大而完備，第三是覺得它的論證嚴密。真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九帝到於今，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大學問，它把甚麼問題都回答了，都解釋清楚了。中國的古書，還有我耳聞目睹的洋書，壓根兒就沒有能與之相比的。雖然現在再看這些書的時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輕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欽佩讚歎，以至頂禮膜拜。

由這種對主義的崇拜一直發展到黨的崇拜，對馬恩列斯毛的個人崇拜（或譯個人迷信，即 personalcult，這個名詞與中國今日之所謂邪教，是一個詞兒）。

到延安以後，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某某人真是狂妄自大，竟自以為「老子天下第六」。為甚麼是「天下第六」呢？原來，那裏最狂妄的人也不敢與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這句流行的話反過來證明了對領袖的崇拜的程度。

我以為自己在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中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知識和理解恐怕還可以算比較多的。我不但在大學裏修過六個學分的政治學，而且還自學過王世傑、錢瑞升的《比較政府》，還有戴雪的《英憲精義》，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部頭不小的「大學叢書」，還有一本被國民黨秘密逮捕的費翬教授寫的論英國政治的書，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

所有這些都敵不過上面所說的《新哲學大綱》之類。為甚麼會這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學得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我因為領導成都的學生運動，對昆明的學生運動也有些了解。知道西南聯大同時有一個名叫殷福生的學生，年齡大概略大於我。此人後來以殷海光的名字，在台灣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著名的戰士，也由於他對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為一代宗師，是一個非常值得欽佩的人物。然而，在我們當時的眼裏，他無非是一個「反動學生」而已。

八十年代，國門打開了，我在國外結識了幾個與我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他們出國三十多年，都是學有專長，在各自的領域內頗有成就的人。他們擁護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發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們自以為當時為了個人目的出國，不能與祖國人民同甘共苦，是有違良知，永遠負疚的事。這從另一面說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價值何等強大。

也許，這一切都可以歸因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個世界性大思潮。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都是從俄國引進的。五四是俄國十月革命兩年之後發生的。俄國當時曾宣佈廢除過去與中國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始終未曾收到這個聲明，而且後來也不見有進一步的事實表現，但是俄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經牢牢植入中國愛國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比我大了二

三十歲，我不敢說了解他們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只能從歷史書的記載中猜想他們大概也是由救亡與革命雙重價值的驅動而走上建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道路的。

據說，十月革命之初，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還不算太大，俄國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戰亂貧弱的國家，但是到 1929 年被認為「黃金遍地」的美國發生經濟大危機，危機蔓延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長期沒有起色以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言果真應驗如神。與之成為對比的是 1928 年開始的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到四年完成。這不但使馬克思主義聲威遠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為實踐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後者成為全世界左派的無可置疑的領袖。

這確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大思潮，而且對信仰這個思潮的左翼來說，還是最高的價值。不但是消息不夠靈通的魯迅，會相信蘇聯沒有大饑荒（其原因基本上同中國農民消極抵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糧食短缺因而造成饑荒一樣）的謊言，還要為之辯護。甚至親自到蘇聯去過而且看到一些蘇聯統治集團的特權與迫害異己的暴行的羅曼·羅蘭也還要為革命的利益而不願透露真相，而要把當時的日記保密到五十年後（實際上已到蘇聯瓦解改制以後）才發表。除此以外，許多著名的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如科學家約里奧·居里、藝術家巴勃羅·畢卡索都成了共產黨員。

我是晚輩，無緣得識這些大人物，不過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訪問美國了，也有機會與那裏的學者長談

了。奇怪的是，他們對我這個人的「共產黨員」身份頗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齡比我略長的丹尼爾·貝爾和丹尼爾·布林斯廷這樣的大名家都說，二戰前後，自己都是左派，都相信馬克思主義。當然。他們在美國那樣的環境下，都沒有「為自己青年時代的信仰而鬥爭到底」，反而陸續形成自己的社會理論，成為民主價值的捍衛者。這些，在他們大概都談不上有甚麼轉變，而我們在中國的進步青年卻都走上了充滿大折騰的道路。

六十年後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甚麼都不懂，既不懂甚麼叫民主，也不懂甚麼叫共產主義。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個場合當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面說：「我二十歲的時候，甚麼叫社會主義，甚麼叫計劃經濟，不但自己心裏一清二楚，而且還能說服別人，讓他跟我一起幹革命，現在我六十多了，才發現自己其實甚麼都不懂。」當時正是全國熱烈討論公有化與計劃經濟到底怎麼搞的時候。我說的是大實話。

雖然如此，我以為我當時的思想是純潔的，不是指自己為人處世一點私心雜念沒有，而是指自己對自己的理想的態度。還記得 1946 年 11 月上旬，國民黨軍已攻下張家口後，蔣介石決心召開國民大會，國共談判破裂，《新華日報》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後消失之時，報館領導人、總編輯章漢夫給我一張火車票，對我說：「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軍送代表團的飛機去延安。以後如果幹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見；幹得不好，那就永別了。」我雖然心裡也有些酸楚，可是並無甚麼震動，只覺得義之所在，理所當然，

並沒有想到我參加的竟是在三年後大勝國民黨，統治全中國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為一個勝利者，一個解放者，直到 1957 年被劃為右派。

最近有一位老同志問我：既然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說過「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他又說「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的」，又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世界第一部分」，又說，中國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655—704 頁）實際上這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在 1949 年勝利，新民主主義已經實現了。以後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了。為甚麼現在還有人認為應該實現新民主主義呢？新民主主義難道不是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必須由無產階級，因此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的麼？

這個問題提醒我，不論毛澤東如何讚揚民主、要求民主，他沒有一次不是同時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來中國人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狂飆中像枯枝敗葉似的翻滾飛揚，其原因也不妨以對「民主」和「革命」的價值理解不同來解釋。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當然要問為甚麼言論、出版、遷徙、居住、結社（包括組黨）的自由……沒有兌現？為甚

麼沒有代議制，沒有反對黨？為甚麼沒有人身保護狀，沒有無罪推定論……？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當然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以求達到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不但要解放中國人民，而且要力爭為天下先，做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榜樣。為達到目的，當然也不妨講究一下策略，照顧一下覺悟不高的人們，把各種自由權利當做最低綱領招徠一下。如果革命進行得順利，勝利得快，那就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根本沒有甚麼諾言兌現不兌現的問題。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論採取甚麼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釋一切。

然而，目的本來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

後人讀《先聲》這本書可能覺得最費解是，其中居然有許多讚揚美國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澤東公開對謝偉思說，美國應當出面干涉。毛澤東說「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美國人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讚揚他」。「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美國的活廣告」（見本書第一百五十三頁）。這些以及許多同樣的話，也許人們在今天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其實是很好理解的，還是 Ends justify means 嘛！不過，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塗的地方就在於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現在，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其糊塗實在不亞於當年的我們。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能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今天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這樣。建

立在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是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互動的。

我是一個自己對革命作出了承諾的人，又是對民主略知皮毛，而對某些人作出過承諾的人，因此在這翻滾飛揚之中，特別暈頭轉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別強烈。現在垂垂老矣，我自以為總算找到了答案。中國還是要以民主為最高的價值。中國人民只要確實得到了民主，自會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錯了，碰了釘子，也只有通過民主重新找該走的道路。這就是現在世界上所有先進的國家（可惜還不是大多數國家）所選擇的模式。我相信這是世界各國人民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輕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最籠統的說法就是「經濟決定政治」。現在，在閱盡滄桑而後，我看到：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社會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而仍然能穩定地進步。專制則不但可以壓殺民主，不讓它發展；也可以壓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用事實證明這一點，可能是二十世紀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儘管付出的血和淚實在太多了。

第一輯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中國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

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

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甚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併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會廣泛地組織起來。我所代表的工會聯盟，是在今天由各邊區工會聯盟產生，有近百萬的會員。在工會大會上，廣大的工人群眾，第一次選舉自己的官吏，並且學習了如何在自己的社會中活動。因此這些解放區就成為一條新道路的例證，說明一個新的民主的中國，是能夠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今天並不要求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甚至也不要求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中國人民僅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種權利。

這就是說，中共要結束中國的封建時代，以及寄生在這種基礎上的獨裁、官僚政治。由於這種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國的廣大人民說話。但是卻遭到反動派猛烈的反對，正像克倫威爾、華盛頓、羅斯福所遭受的那樣。

今天，中國共產黨要求停止進攻民主解放區的內戰，停止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同時要求一個民選的國民大會來解決中國未來的機構。它熱切期望這一中國臨時政府，將是一個各黨各派組成的政府，並包括共產黨在內，以便毫不猶疑、毫不遲延地實施這些步驟。

.....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日

注：本文為鄧發在英國共產黨大會上一段演說詞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和提高人民

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中國正開始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前進，這是抗戰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雖還不大，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進步。今後的努力方針在於：第一，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把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和各省正籌備中

的參議會，逐漸變為真正代表人民的機關；第二，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提高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實現民主政治，加強民眾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重要任務。

——摘自《新華日報》1939年2月2日
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我們相信、並且實行民主」

II • 福爾曼

福爾曼先生認為這些共產黨員是優秀的中國人。這些共產黨員並不在「實行共產主義」。他們並不實行集體化。他們倒是在鼓勵私人企業、合作主義以及國營事業。他們實行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認非共產黨和別的政治集團，並限止每一機構中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們的最基本的目標是農業改良、教育衛生和工業的進步，這些和俄國的共產主義實在沒有相同之處。

.....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並且實行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吳中民先生：

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不是一句空話，是敵後解放區的事實證明了的。軍隊能否打仗，頂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幫助。在敵後解放區有一句流行的話：「軍隊是魚，老百姓是水。」魚離了水，是寸步難行的，更不用說和敵人作戰了。要老百姓和軍隊合作，當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實行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而且，我們還得當心，有人會用好東西去做壞事情的呵！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 答讀者問



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羅斯福總統在這一次再度當選後，發表聲明說：「我們已在戰爭中舉行大選，這是八十年來的第一次。」他這樣說，是因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國有過一次在戰爭中舉行大選的先例。

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繼續了三年多。正在戰事十分緊張的時候，舉行了總統的改選。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選的結果是林肯大總統再度當選。林肯在那時是美國人民的民主力量團結的中心，他所領導的戰爭是為保衛民主制度的一個戰爭，所以在戰時的大選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擁戴。

這相距八十年的前後兩次大選交相輝映，其意義，正如羅斯福總統所說的，「是向舉世證明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而這種偉大的活力是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的。

在八十年前，美國的民主主義正在風雨飄搖之中，林肯大總統在那時未嘗不可以用戰爭的名義，憑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勢力來拒絕或者拖延改選。但他不這樣做。他知道他不該這樣做，因為戰爭和國家是否還需要他領導應該由人民公意來決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這樣做，因為他對於民主和進步的事業的忠誠和貢獻，已經為大多數人民所公認了。由不拒絕改選這一件事上，也就證明了林肯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對民主主義的忠誠了。試設想一下，假如那時林肯竟拒絕改選，其結果會如何呢？那麼他就成了民主的

叛徒，縱然還想戀棧不去，但人民是一定會遠遠地背離開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輝地照耀美國民主政治的歷史。在八十年後的這又一次戰時大選中，不僅總統要重新選舉，又不僅參眾議院中都有許多議席要改選，而且在四十八個州中間有三十二個州的州長要改選。像這樣的大事大更動發生在戰時，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為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為基礎的，所以整個改選過程是非常順利迅速地進行。四五千萬人同時靜靜地寫下了他們的選舉票，決定把整個國事交給為他們所信賴的人。

由這樣的改選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不僅沒有擾亂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活，妨礙反法西斯戰爭的進行，恰恰相反，是更加鞏固了國內的民主的團結，使戰爭的勝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當選所發生的作用一樣，使民主進步力量在戰爭中的最後勝利加速地來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絕不能適用於戰時的先生應該虛心看看這種事實！在這次戰爭中，各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議會中照常有公開的辯論和對政府的責問，輿論上照常有各種對於政府的人事機構政策尖銳的批評，人民照常有集會結社、選舉罷免的自由，而像可以影響一國元首的那樣的大選也仍照常舉行。這一切都說明了，民主制度不僅是在戰時完全可以適用，而且在戰時運用得更加靈活，範圍更加擴大了。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

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於民主制度，堅決地依靠民主主義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夠在民主制度下繼續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離了這偉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終於會陷於死亡的絕境！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民主第一

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

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這首先就必須徹底消滅法西斯機構，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完全肅清法西斯分子。

華萊士說，「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標是：盡速消滅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軍進入柏林和東京時，才能提出和平條件；國際壟斷專家不許在和平會議中出現；孤立主義必須繼續被攻擊」。這就是說，不僅要擊潰現在的法西斯陣線，而且要消滅一切的法西斯殘餘；（遵檢）。只要是法西斯病菌還存在，則比會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謂「民主第一」的口號，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實現。

其次，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實現「民主第一」的

口號，那就必須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這口號。因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號，自己負有首先忠實履行的義務。(遵檢)。

另一方面，「民主」是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拋棄這武器，則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上，便沒有絕對勝利的保障。即使幸而勝利，也將被認為是「以暴易暴」，不能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而戰敗國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會時時作報復的打算。歷史上，所以有循環不斷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意大利崩潰了，納粹德國也面臨崩潰的危機，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陣線各國必須堅定地把握「民主」這一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自己認真檢討，究竟已否實行民主政治？實行得夠不夠？沒有實行，

就應該立刻實行；實行得不夠，就該力求其夠。（遵檢）。
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
滅頂之禍，這是應該十分戒懼，十分警惕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茅盾

對於貴報所提出的問題，我只能這樣答覆：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受盡了欺騙。如果將來其他文獻統統失傳，只剩下堂皇的官報，則無話可說。如其不然，那末，我們的後代一定會不懂，為甚麼我們這樣容易受欺騙？我們不能再忍受那種欺騙了。現在既然連政府也口口聲聲說「民主」，那麼，我們就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我們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實現，則貴報所提的那些問題，我覺得都不難解決；否則，半個也解決不了。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甚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注：《新華日報》所提問題，系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開徵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人民獲得自由權利、怎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樣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的茅盾是應徵者之一。



我們要看貨色

國民黨市黨部負責人方治先生①，在市府招待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啊呀呀！中國原來「已經」是「民主」國家了，而且還是「世界第一」咧，你說我們胡塗不胡塗，竟連這點國家的體面都還不曉得，還要這裡那裡，嚷實現民主，不是有點「庸人自擾」麼？

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話雖是這麼說，而為了「謹防假冒」起見，我們倒不妨來看一看貨色。不看貨色則可，一看貨色可就糟糕了。原來，下令查禁《自由導報》的就是方治先生。說法和貨色竟是這樣的不同！照這種說法和做法，所謂「民主」也者，豈不就是「官主」！所謂「世界第一」也者，豈不就是黨治「世界第一」！

說漂亮話的人，倒是應該提防，不要拿出貨色來，見不得人！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27日短評

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國民黨重要的黨務活動家、CC系把守宣傳口的主將。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總裁室秘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要職。1949年退居台灣。時為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

是不是代用品呢？

友谷

朝鮮義勇軍的宣傳員用電話向敵人堡壘裡做政治宣傳，指出日本國內的貧窮的時候，敵兵很神氣地說：他身上穿著的正是前天剛發下的新軍衣。義勇軍同志馬上不客氣地追問：「那麼細細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一問就把敵兵問得啞口無言（見二月六日本報三版，《朝鮮義勇軍》）。

這的確是非常厲害的追問，這樣的問題在別の場合，在別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為在這世界上的確有很多騙子在活動，所以我們必須這樣一步緊一步地追問。光是口頭說說空話，我們不能相信，必須追問：事實到底如何呢？縱然儼乎其然地拿出事實來，我們也還不能馬上相信，必須再追問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樣追問下去，才能揭破騙子的勾當，才能達到貨真價實的目的。

假如你遇見假充風雅的市儈，拿出周鼎漢器、唐宋真跡來給你鑒賞，而你存心掃一掃他的興的話，那麼你不妨追問：「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貨認成了真的往往不過是受騙上當的人，這些假貨是從古董商手裡買來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間裡偷偷摸摸地偽裝假造，明天就拿出來眩示給人，說這是如何名貴的古物，對於這種騙子，我們應該嚴詞斥責：

不要拿代用品來騙人！

但假造古貨，不過是騙術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

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真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不是空喊民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說空話是不行的。有人說，空喊民主，不能得到甚麼結果。這種批評自然是對的。

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

歐洲戰爭快要到結束的時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動了，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結果，而是認認真真打仗的結果。蘇聯在戰爭中本有一句口號，是「一切為了前線」。他們喊了這個口號，也就認認真真照這個口號做了，一切的人力為了前線，一切的生產為了前線，沒有一個人把存款放在國外，在後方逍遙享受。現在他們又喊出了「一切為了柏林」的口號，而他們也確是在面向柏林走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而不是背對柏林空喊。

在我們這裡也有「軍事第一」的口號，而且似乎也還有人在寫、在喊「到東京去」的壯烈的口號。既然有這口號，就該認真想想怎樣來實現這些口號。

美軍在呂宋登陸作戰，準備在中國登陸，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東京去的路。但在我們這裡專制貪污因循拖沓、缺乏效率，三萬匹的霉布，三萬萬的美金存款，這些決不是到東京去的路。

當蘇聯已經歡欣地走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的時候，當美國已經一步步迫近東京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從頭來掃清引向勝利去的障礙，雖然似乎晚了，然而趕快做去，還不太遲。

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張民主的人也的確不是空喊民主的時候。如何實現民主，再切實不過的一步一步的辦法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了(見本報二十五日發表周恩來同志抵渝談話及二十六日發表的民主同盟宣言)。

要使打仗不是空話，勝利不是空話，就要趕快實現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話，就要實現這一步步的辦法。反對空喊民主的人，為甚麼不快快照這套辦法做呢？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民主與誠實

李勃

在任何社會裡，誠實總是被看成一種美德；而在民主社會裡，尤其是非看重誠實的態度不可。

誠實的內容包含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語的一致，言語和行為的一致，思想、言語和客觀事實的一致等等。

心裡怎麼想，口裡也怎麼說；嘴裡怎樣說，手裡也怎樣做，這叫做誠實。想甚麼，做甚麼，決不瞞人，老老實實說出來，與天下人共見，不另外說一套，以圖掩蔽天下人耳目，誠實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語思想都是為了解釋和說明客觀的現實，行動也是為了應付現實。但對於現實的真相，固然未必個個人都能完全知道，但總不能不以與現實完全一致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對現實的完全了解，卻不能故意掩蔽現實，反乎現實而行。假如指鹿為馬，若真以為這是鹿，那還不過是無知；但若明明心知為馬，而偏偏說這是鹿，那就是胡賴了。

誠實是對人的態度，但也是律己的準則。假如故意說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為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藥。用不誠實的態度對人，固然是對人的侮辱，其實又是對自己的侮辱。

我們相信，倘大家沒有這樣誠實的態度，民主就不可

能存在。民主講究討論商量。但假如開會時大家說了一大套，卻不全是心裡所想的，會後各人仍舊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麼民主的世界豈不成欺騙的世界了嗎？

要發揚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誠實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並不是舶來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說一是一，這原是民間向來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3年7月16日



強大而民主

郁敏

以國土和人口來說，中國都是一個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強國。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就因為不是一個強國而吃了很大的虧，雖然我們也因為是大國而佔了很多的便宜。

由於抗戰的刺激，使人們深感到中國必須努力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有人主張中國建設的方針是「富國強兵」。有人提倡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國防文化」。

但這樣主張的人常常忘記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本來都是世界強國，然而結果怎樣呢？意大利已經一敗塗地了，德國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台了。這些法西斯國家未嘗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國防上，然而富國強兵對於他們，到頭來仍只是一個幻夢。

問題的關鍵在甚麼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倫敦援華大會上說：「中國在最短期間內應當成為遠東的強大民主國家」。——這話，我們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國朋友對中國的企望，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要求。

這就是說，中國不僅要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要成為民主的國家。這要求是從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來的，也是抗戰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阿 Q，才會一夢醒來，說中國是一個最民主的國家，想根本掩沒人民的要求。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和那不民主的強大是必須嚴格地區別開來的。這就因為：不民主是會把抗戰弄垮、國家弄糟的，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採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沒法強大。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民主與國情

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提倡洋務運動很堅決的薛福成在當時就曾如此說過：

或曰：以堂堂中國而做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這個道理。到了現在看來，自然更誰也不能發生疑問的了。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科學，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科學。外國的水是氫二氧一，中國的水也還是氫二氧一；外國的大砲是那樣造成的，中國的大砲也同樣是那樣造成的；外國在「聲光化電」之學上已經研究出了許多道理，這些道理移到中國來也還是有用。——既然外國已經先發展了這些科學，而中國還沒有，那就沒有辦法，只好「用夷變夏」一下，從頭學起來。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

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本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所以，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原標題《民主即科學》



團結與民主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這是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合併了七個關於鞏固團結集中人材增強抗戰力量的提案，加以審查後，曾經過相當劇烈的爭辯，可見全國憂時之士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與關切。

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華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那麼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這條治標辦法的重大意義，也就在這裡。

無論甚麼條文，它的價值要看它的實行程度怎樣，否則它的作用將等於廢紙。全體參政員是懷無限的忠忱與熱誠，全國人民是那樣焦急地渴望這一個足以轉移我們祖國命運的辦法能夠快些實現，過去一切足以妨礙團結與民主的設施應早日絕跡。我們的政府不應漠視廣大人民的要求與希望，也只有依靠精誠的團結與廣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夠強大進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偉大任務。

為了實行「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

律平等」，就應該在嚴重的民族壓迫橫加在我們身上的今天，消滅內部妨礙團結的現象，因為一個對內不能團結的民族，就不能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勝利。波蘭亡國的慘痛教訓，就是擺在眼前的明顯的事實，雖然它軍事慘敗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壓迫政策，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民族自衛的革命戰爭中，脫離了廣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是對抗戰不利的。僅是在消極方面停止對抗日的人民、團體、黨派的各種限制、取締是不夠的，雖然切實做到這一步已經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努力，政府要更進一步的造成全國人民能夠在法律上獲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條件，才能真正保證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甚麼是「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體內容呢？

這就是說，全國抗日的人民要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的自由，召集動員民眾來抗日的各種會議的自由，研究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種政治理想並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的自由。全國抗日人民要有參加抗戰工作的權利，保持自己職業獨立的權利，督促政府幫助政府的權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們的權利不能被剝奪。除了有真實證據證實了是犯了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來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權利，是違反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黨派應有合法存在活動的權利，

共同發展互相幫助的權利。抗日的各黨派可以發表他們關於抗戰建國的言論，公佈他們的政綱，出版他們的報紙雜誌，招收他們的黨員。一切抗日黨派及它的黨員同樣可以參加抗戰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虛心研究別人所信仰的東西，選舉自己的代表到各級的民意機關中去。因此如果組織對於任何抗日黨派的陰謀破壞、暗殺、囚禁、逮捕抗日黨派的人員，暗中限制取締抗日黨派的活動，不僅在政治上是決不應有的行為，而且應受到全國人民嚴厲的制裁。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軍隊和地方政府都是我們整個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們應該一樣的被珍視愛護，受同樣的待遇。不能夠因為某些歷史的原因，而對一些抗日的軍隊與地方政府加以歧視，或給予許多困難和牽制。這種情形今後是不應該存在的。

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夠團結一切的抗日力量，準備在適當時機來到時對敵反攻，爭取最後的勝利。團結與民主，這是我們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戰勝強大敵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華日報》1939年10月5日

諸葛亮與阿斗

魯山

現在和古代封建專制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從未敢做夢當皇帝，雖然孟軻先生曾經說過「民為貴、君為輕」一類話，但小百姓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高過皇帝，而且歷史上也從來就沒有過這樣一回事。然而現在確實不同了，我們居然成了皇帝了，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要封我們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們很謙虛地自稱為諸葛亮，不然怎麼能叫做「民主」呢？不過，太「民主」了也不成，因為咱們做阿斗的沒有本事，還得萬能的諸葛亮老爺來加以管束。說來也可憐，阿斗這稱呼固然很榮耀，但是我們常常還要被諸葛亮打屁股，有時又被拉去砍頭示眾，或被踢進集中營，或被綁去當壯丁，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對外國人說：他們是受了「託孤」之重，不能不「訓」我們一下，因國家「法統」要求這樣做，阿斗真要當政，那不是自亂「法統」了麼？

自稱為諸葛亮的法西斯獨裁者，是甚麼人呢？正是那些賣國求榮的秦檜張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禍國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輩！他們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們曾假「聖」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災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國民黨反動派又以一黨訓政的所謂「約法」，企圖推翻政協決議，繼續做他們專制獨裁的諸葛亮，把餓得飢黃面瘦的老百姓仍舊當做他們的阿斗。算盤打得雖妙，可惜今天

阿斗不再那麼容易受愚弄！

先生們，你們的「法統」還是趁早收起吧，人民並非阿斗，你們的諸葛亮終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況你們本來並非諸葛亮，硬裝面子，騙哪些呢？豈不是自欺欺人？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8日



民主的真義

項軼

翻讀《中山全書》，在《中國革命史》中讀到這樣的話：「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在這段話裡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因為夠得上說是民主制度的，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這本是常識，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說明的。在封建專制政治的壓迫下面，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因而產生某些接近於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統的民主政治的理論也還是找不出來的。這種民主思想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也有時會發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根本上改變了專制政治，而只是使專制政治的表現溫和一點而已。所以過去的專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絕對不是民主政治。「愛民如子」是過去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眾看成了兒子，那還有甚麼民主的氣味！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現在有些人把中國的舊思想都解釋成民主思想，甚至以為中國過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實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國歷史去學習好了。這實在是違背中山先生的遺訓的。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妨背誦一下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

——祝第二屆聯合國日

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去年宣佈以六月十四日為聯合國日以來，到現在已經一年。去年有二十八個國家慶祝這一個節日。紐約曾有五十萬人的空前大遊行。今年聯合國勝利在望，全世界對於這個節日的慶祝，必定更加熱烈，更加盛大。

人類的命運，現在處在決定的時機。決定人類的命運的，乃是此次大戰的結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此次全世界人類反對法西斯野蠻侵略者的神聖戰爭中，我們中國進行了對日抗戰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勢武器在敵後堅持至今的游擊戰爭，乃是我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偉大奇跡。我國六年的抗戰，誠如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樣，一改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由於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把持國柄，勾結軸心，對外屈辱，對內反共，我中華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無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經過了六年的團結抗戰，我國卻已經被列入世界四大強國之林了。這種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起就主張的對日抗戰乃是完全正確的，也證明了當時主張屈辱投降的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是何等可恥。我們慶祝聯合國日，我們慶祝聯合國的勝利，慶祝人類正義之勝利，也慶祝中華民族的強盛，慶祝抗戰的勝利。

反對法西斯，不僅為了人類的現在，而且也是為人類的將來。現在所進行的世界戰爭，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者贊成最廣大的民主，這是無庸多說的了。而此次世界戰爭爆發後美總統與英首相同擬的大西洋憲章，也規定了人類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聯合國日發起人羅斯福總統在去年今日的演說中，再一次強調了維護人類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說：「信仰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與敵人之主要分野。」又說：「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類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氣、日光、麵包與食鹽之不可須臾或離，剝奪人類所有此等自由，則彼等必將無法生存，剝奪其一部分自由，則其另一部分必將枯萎。」我們慶祝聯合國日，就要維護民主。我們慶祝聯合國日，乃是為了擁護民主，為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原則，它對外則主張「亞利安種族至上」或「八紘一字」的併吞，對內則主張「盲從領袖」、「全民政治」、「全民經濟」的獨裁，反對共產黨，壓迫人民大眾，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毀無遺。不剿滅法西斯主義，不確立民主主義於全世界上，即使這次戰爭勝利，還不能奠定人類永久和平。現在與將來不能分離，抗戰與民主亦不能分離，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民一樣，完全贊成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在他的黨員所參加的地方政權中，遵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並把

民主政治的原則具體化，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中國共產黨並堅決主張：民主的政治原則應在全國實現，這不僅對於現在的抗戰有很大好處，而且對於全人類也有很大好處，因為我們中華民族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為我國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我國的一切設施會對全人類發生極大的影響，對於將來的世界和平發生極大的影響。

可是，正在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時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時候，在我抗戰陣營之內居然有人提倡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怪論，這豈不是奇怪之極麼？

這些人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以「中國文化至上」來代替希特勒的「亞利安種族至上」。對中國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衛的「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說。對中國國內，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全民戰爭」和「盲從領袖」的濫調。這個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義一樣，公開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它也同希特勒主義採用同樣的排外手法，自稱「繼承民族傳統，排斥一切外來思想。」在實際上，它對於中國的傳統，只繼承了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等奸賊之特務政策的傳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反對太平天國媚事反動清朝的反革命之傳統，繼承了一切唯心論的反動學術傳統，它所拋棄的，卻是民主精神的傳統，卻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傳統，以及中國五千年來學術史上唯物論的優良傳統。對於「外來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等進步的思想。而它

在「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面具之下，偷運進來的，乃是大量最醜惡的法西斯主義的私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貨。中國法西斯主義者之所謂「繼承民族傳統，排斥外來思想」，實際上就是繼承中外文化中一切醜惡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優良的成份。這就是現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代表們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之內容。這種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居然自稱為「三民主義」，實在可笑之至，實在是誣蔑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學說的民主精神，實在是誣蔑了中華民族。

我們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我們心中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憧憬，對人類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心中也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掃清這個毒素，當然也決不容許它在中國猖獗起來，以致將來再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的政治代表們企圖提倡法西斯主義以毒害我民族的時候，為了使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我國文化界就有一個極其嚴重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要加緊進行反法西斯的教育。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樣設想，以為當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反封建，就會走上另一極端，犯另一種錯誤。當前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乃是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時一刻忽視或忘卻了這個現實，就是不對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民主教育，乃是具體的、適合中國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今後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需要的那種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

應知這種民主教育，不應成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應為了抗日的目的成為一般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特殊地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否則，我們的教育就脫離現實，脫離當前的戰鬥任務。其次，應該把這種教育，安放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應把這種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詞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愛、文化與科學的發展等）的基礎上。在這裡，我們也應緊緊地記住：民主與抗戰是不可分離的，將來與現在是不可分離的。

正確的進行抗戰與民主的教育，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這就會大大的增強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這就會促進人類正義的勝利，促進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就會幫助奠定將來的世界和平，和獨立的新中國之建成，這才會更加提高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對全人類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貢獻。

——《解放日報》社論 1943年3月14日



戰時必須實行民主

中國抗戰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和動員全民族的人民，參加抗戰是不可分離的。這就是說，它決定了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民主權利，就失去了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抗戰的必要條件，就使這全民族全面的抗戰，失去了偌大的力量。總括一句話，人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武裝抗敵的權利，就不能動員全國的人民參加抗戰，就不能使民主政治逐步的全部實現。

抗戰以來，我國政治生活已向民主制度進了一步，國民參政會的成立顯然是其初步的開端。但是，我們如果問，在這一初步開端之後，繼續進展的程度怎樣？全國上下一定會不自隱諱地說：在某些地方，顯然沒有繼續努力將政治生活推向進一步的民主的道路上去。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事。

毛澤東、陳紹禹等七同志，在「我們對於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的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務，中心目的，正在於實行戰時民主。從這一意見中，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根本主張，是一貫的堅決的把全國政治生活逐步的推向民主政治。共產黨反對一切政治上向後倒退的言行。因為這是對抗戰有害的，對民族不利的。同時，我們必須了解，共產黨在抗戰這一個歷史時期，所主張所堅持的民主政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完滿的民主，而是民族解

放戰爭中所必須的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全民族的命運，決定於全民族的每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與力量集中，又必須以發動和堅強每個人的堅持抗戰的意志、培養和組織每個人的堅決抗戰的力量為前提的。而這些一切，都以民主權利為起點、民主政治為歸宿。

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民主是不必要的，並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政府為例。這是根本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戰爭，亦即為人民所反對的戰爭時，它們是不願意有民主的，是要大大的限制民主的。而在中國進行全民族的反侵略的戰爭，這一戰爭為全民所擁護，更非有全民參加，不能獲得勝利，因此，在抗戰時期我們就應該實施民主政治。

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無談民主憲政的必要，盡有約法可遵循，有抗戰建國綱領可遵循。但是，抗戰所需要的民主，應隨抗戰之堅持而充實其內容，在保障民權（就是這一項，也還需要最大的努力去切實實行）外，還要注意到整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使政治有認真的進步，才能適應抗戰的發展。

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在於「加強戰時政府，統一軍政領導，容納各黨各派人才，提高戰時行政機構效能」；在於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的保證。

在抗戰的現階段，敵寇正盡全力進行政治誘降，挑撥離間，破壞我國抗戰。我們一定要加緊團結，加強抗戰力量，為了這個目的，捨實施民主政治，力求政治進步，反

對一切倒退，別無他徑可循！汪逆精衛正在高喊「虛偽的民主政治」，「在日寇刺刀下的民主政治」，我們正要實現戰時的民主以揭破汪逆的虛偽面孔。這時候，既不是空談無民主政治之必要所可逃避，也不是斤斤於參加政府所可解決。唯一的道路，就是集中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將政治認真的推向民主。

——《新華日報》社論 1939 年 9 月 16 日
標題為編者所加



民主國家的武器——民主（節選）

目前，太平洋戰爭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而希特勒又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春季攻勢。在此形勢下，民主國家用甚麼力量去抵抗敵人的進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民主國家偉大的物質力量，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甚麼方法才能充分發揮和盡量利用這些力量呢？

「政治重於軍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指導戰爭的是政治，發動戰爭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戰爭是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與反侵略的民主主義兩大陣線間的鬥爭。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後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進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發動戰爭力量的推進機，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民主國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根據在哪裡呢？

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上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與民主政治不可分離的。因為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業，如果不動員全民族就不能抗戰，更不用說勝利；而要動員全民族就非給民眾以民主權利不可，所謂「民主動員」就是這個意思。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全民族的命運，決定於全民族每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須以啟發和堅定每個人的戰鬥意志與發動和組織

每個人的戰鬥力量為前提的。而要做到這些，卻是以民主權利為起點，以民主政治為推動機，而最後則以民主政治為歸宿。

其次，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世界政治發展史而言，正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與進步的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陣線與民主陣線早已壁壘分明，尖銳對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明白指示：「現在是甚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的戰爭。」（見《民權主義》第一第二講）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戰爭之進行及其勝利，必須以民族團結為最基本的條件，而民族團結又必須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以我國抗戰，而言團結與民主的關係，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國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

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的力量，那麼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都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

就國際的反權利的團結而言，也以民主政治為它的基礎和前提。今日反權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不管其民主的內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顯明的。

然而最複雜和最困難的還是宗主國與屬領地間的團結問題。無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下，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可以而且應當團結。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存在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發展雙方的團結，就必須以減輕和適當調整這些矛盾為前提。而要作到這點，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宗主國必須改善其舊的殖民地政策，採取開明的新政策，就是說給殖民地以民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羅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條是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而民族自決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戰爭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只有經過民主的動員才有可能。所以民主與動員，民主與加強戰爭力量是分不開的。去年我國國民參政會通過之重要決議案「促進

民治加強抗戰力量」，就清楚地說明了民主政治與動員和加強抗戰力量的有機聯繫。大家知道，我國抗戰的基本方針是「自力更生」，然而甚麼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實意義和內容是甚麼呢？「中國抗戰，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麼，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

（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談話）「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

有人以為國家在對外抗戰之際就要縮小民主(被略)，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這不僅從理論上言，正如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而且在事實上，我們還可找到許多實例來加以證明的。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說，遠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專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正是因為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最急進的民主派，給予了民眾以民主自由，因而發動了廣大民眾參加革命鬥爭，所以獲得了勝利與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列強的武裝干涉，這也是因為俄國的革命領導者與革命政府真正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因而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民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與戰

爭，所以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實來說，當太平洋戰局形勢嚴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軍事失利，於是在英國國會中和輿論方面引起了英國政府關於遠東戰時措置的種種疑慮和責難，特別對於英政府某部分閣員及遠東負責者表示了極大不滿。英下院一場舌戰，因而展開。在一部分人看來，英下院這種民主的對於戰爭問題的公開辯論是不適當的，或將因而引起英國內政上的軒然大波，渙散了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減輕了戰時內閣的威信。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丘吉爾首相以英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坦白地發表了辯論演說，並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於丘吉爾公開地指出了過去的錯誤——如云「此等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災禍非錯誤與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責任——如云「苟余對處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處，則負咎最大者為余個人。苟吾人未遣派大軍至緬甸或遠東其他地點，亦應由余負責」；積極地要求國會公開辯論並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之投票，則下院即系怠忽職務」等等。正由於丘吉爾首相這種尊重民主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負責態度，於是獲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說是得到了全體的擁護。（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這一生動的現實，充分說明了民主政治的偉大意義與作用。

——《新華日報》1943年3月6日

民主精神

戰時能夠實行民主，民主才能團結，團結才能爭取勝利，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實證明了的。單以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來說，最近就有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說遠一點，在美國，羅斯福三度當選大總統後，就以政治家的風度，發揮美國的民主傳統，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親密合作。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威爾基曾代表美國訪問英國，最近更決定以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訪問近東、蘇聯及中國。而且，為了動員及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加強反法西斯力量，釋放了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同志。在英國，三年前被禁閉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亦已解禁。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執政政黨，從來沒有因為他們的地位，就排斥別人、壓制別人，稱他人為「異類」，相反的，他們為了戰爭的勝利、民族的安全，總盡量集思廣益，使人人有為國效勞的機會、珍貴別的黨派及各個階層的努力。好的，有成績的，就讚揚；壞的，不妥當的，就批評。譬如，英國自由黨的《曼哲斯特導報》就讚揚「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並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實使我等為之慚

愧。」同時，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做法的。

各個政黨派別的存在，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已經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種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之下努力，更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這樣，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斷增強。這是英美當局及一切呼籲民主團結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標之下，不論黨派間，以至於個人間，都會有關於具體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張和辦法。但是，這是能夠獲得一致的。這裡，主要的就要靠前所舉例的民主精神了。這裡，就要靠相互間的經常接觸商討、互忍互讓(被略一段)。真能做到這點，就能夠互泯猜嫌，和衷共濟，而不會手足自殘了。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做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社論



民主原則

張申府

差不多很像桃樂娣·湯普孫女史新近所說「有一種絕對的邏輯在歷史上」，幾年之前我曾深深地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為堯存，不為舜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當然在這些道理是甚麼，有多少。一切學問，自哲學以致科學，所從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這些道理發掘出來，而且弄個清楚，說個明白。

同樣，也像尤裡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說的「達爾文拿他不多的幾條原理把人與所有別的生物都聯絡在一個必然與變化的共同之綱中」一樣，世界隨時都有個大勢所趨，為任誰所不能逃。

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是甚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

這些年來，對於民主雖然有種種看法，種種論調，但現在聯合國方面卻公認為這次之戰爭是爭自由與民主之戰。所謂法西斯，前前後後，裡裡外外，都是與自由於民主整整敵對的，都是與自由與民主勢不兩立的。而且凡是壓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講理性的東西，不管有多少樣的方式，都可歸入法西斯的疇類。

法西斯不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同時是極端封建的、落後的、倒退的。這也是今日所有進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認。

但是現在還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麼？

這也不是的。

現在所求的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進步，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發展。

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了：要想安全，必須進步；要想穩定，必須向前發展。

叮衡全局，觀察世論，很可以看出，有好幾點是現在世界許多人都同意的了，或認為無可如何的了：

第一、現在是正過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人民的革命的時代。或者甚至說，這種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個階級的。

第二、民主必須擴張，必須由僅僅政治民主擴張到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如經濟上社會上不民主，所謂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說，非整個民主即無民主。民主決不等於代議制或放任主義的經濟。

第三、「經濟人」要代以「社會人」，經濟人的時代要繼以社會人的時代。社會必須是有機的；必須不是各自為富，而是共同謀福的。因此有人還說，今日的民主必須是「有機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為人類關係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為界說，那麼，道路不管還要怎樣曲折遼遠崎嶇，人類社會究已在向之而趨。這一層是與前層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種情形。

第四、社會各方面，特別像經濟方面，科學方面，設計或計劃化 *Pranuing* 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這也可說是與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設計或計劃化其實並不違反

自由民主，寧可說是自由民主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或更好說，設計或計劃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圓滿地具體實現。當然，要圓滿作到民主的設計或計劃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條件。

第五．戰後必要有一種國際組織。有的且說，最好即以今日的聯合國為基礎。關於戰後永久和平的計劃，近年真是甚囂塵上。連帶地，為從一種根本克服過份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傳統間的精神連鎖的國際大學，也正為世人所注意。只是關於那種國際組織的如何構成，如何產生，尚是眾說紛紜，難衷一是。與我最同心而非開玩笑的羅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邏輯切實遇到的大文《戰後世界的若干問題》裡曾鄭重地說：「開始的國際權力機關應由合眾國，大英共和國，蘇聯，與中國而成。它們四國應結成一個隨時可以邀請別的國家加入的聯盟。」讀來最足令人興奮。總之，仍沿舊日的此疆彼界，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為戰。各自為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須兼是國際的。

凡此種種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勢所趨的一種意義的根本方面。

本來，縱然今日全世界真覺悟的人還不太多，就是許多覺悟的人覺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數人都已覺悟到了幾千年前已經揭穿的一種情實。那就是：人與人差不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長的高一些，看得遠一點，早一點。有的看得早一點，也就說得早一點，因此常會招出橫禍來。有的

則有知也有養，雖看到了也不說。

現在許多人都覺悟到了：將相本無種，舜時任，予也是人。在這種情形下你還得限定某些人祇得被治，只許「由」不許「知」麼？

而且人與人雖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國的古調，尤其具有現代科學的事實根據。在這種情形下誰竟還要我智自雄、唯我獨尊？致落得枉費心機，徒勞無補。

法西斯的種族論固久已被世界的人類學者與生物學者駁得體無完膚了。

舉一個絕重大的東西，當然是眾擎易舉。對一個明非個力所能勝任的東西，也一定不會有人偏偏要獨力支撐，而不虞舉鼎折臏……

眾力成城，眾口鑠金；耕常問「奴」，織當問「婢」，本也是流傳至今猶可記取的中國古訓。

說到中國，民主幾乎成了今日的萬應方。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致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中國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會別的許多方面，實在無一不需要民主，無一樣沒有民主能夠解決其困難。

國家有困難，當然應有全體國民來擔當。但如使其與聞一切有關情形，使其對一切有關事情都有置喙之機遇，都有盡力之機會，縱令擔當困難，忍受痛苦，也當可以心甘情願。

人總是對於自己有權過問的事才最起勁。而且是本來

應該屬於自己的事。

民主決不會就妨礙集中領導。反過來說，也一樣。

在大多數人的內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應實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緣由，本是為的民族，本是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難。本是為的實現最圓滿的民族統一。而具體言之，實在尤在為的動員，尤在為的發動一切人力以及物力。

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對症藥，也就是主要因為這個。

實際上，今日國內有些地方試行民主，傳說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戰上、經濟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會關係、人民生活上，據傳都有不少的成績，至少大部分也當是由於這個。

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動員了民力；弄機會使大多數人民都自覺了的緣故。

去年十一月英倫名流、學算習律出身的經濟學家、牛津大學院長貝維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安全計劃，所謂關於社會保險的報告。他本認為應該祛除或攻擊的巨惡共有五項：窮、病、愚、髒、閑。這五惡在中國豈不更要用大力來掃除。

以貝維里治博士特認為根本的末項，閑，而論，試問在中國今日這樣需要人力的時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當，以致許多時間精神，都白費了！

汰太（或汰汰）與廢費（或說廢廢），實在同屬人類最重要的問題。

不要閑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經濟！

但這決不是一般所謂做官或出仕的問題，且也不僅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問題。實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發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

使一切人潛藏的才幹可能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實現——這就是今日所謂民主的根本精義之所在。

用另一個說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兩字）。

假使，根本上，沒有言論、自由、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講習的自由，是必說不上民主的。

但所謂自由並不只是讓人人隨便，解脫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貝維里治的五巨惡，以及憂愁，危險，或如羅斯福所說的匱乏與恐懼，等等。而且更要給人人以機會，使得人人都能盡量地發展、發揮、發皇其才、其力、其業——推到極處，兩層本也並無二致。

也可以說，民主的出發點就是集體，就是與人為善，也就是認人人都可以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養，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於身，一貨委棄於地，一賢一能不見選，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

那麼，在今日中國，誰，甚麼黨派，怎樣作法，在原則上，最有使中國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備三個根本的條件。

第一，必須是中國的。——這些年來，許多方面都有「中國化」的呼聲。似乎直到今日為止，在這方面並沒有很走上軌道。但是如果在中國，對中國事，而不由中國人

以中國為第一位；所採取的辦法不紮根在中國的本土，對於大多數中國人必不免多少隔閡。如此，要想把中國整好？究竟是事實上難以置信的事。文明猶如釀得好的酒，文化則如多年的陳釀。一種文明幾千年蘊集下來的氣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殺。不過，中國的優良處究竟是些甚麼？雖還不無有待於董理，有待於表揚，但關根本總目，倘有雖流行而實不倫不類、不合中國真正傳統與時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矯而正之。消納世界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屬絕對的必要而分當。

第二．必須是獨立的。要想國家（民族）獨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與全世界進步的人類攜手而作自己應作的獨立貢獻，那就中國三四百年來先有異族竊國繼有帝國主義侵略所強迫鑄成一切奴性或依賴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的，都須立即廓而清之。中國的民主必須以中國為本位而行之；中國的民主也必須不依賴它國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罷）。

第三．必須是民主的。——這就是說，號召民主的必須在自己可能範圍之內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辦法。庶幾可收以身作則，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縱然不是教猱生木，卻等於緣木求魚，等於抱薪救火。

中國今日是處處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關人都得過問有關事，人人都有貢獻其知識能力的機會，並有看見其貢獻被採納實行的自由；也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以為一種進

行事情的途術。但是，當然，在一個意義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國，也可以說，尤為根本。必須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徑，然後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後的情形，才有肅清的希望。

不過，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嘗不需要別的方面配合。如必由別的區處多培養些有益民主的精神習慣，也未嘗不可以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進行。

這，特別就在哲學與科學上。

哲學是講可能的學問，是根本原則的學問，本以體與辯為方法，而以通為歸宿。因此，哲學對於人生特別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處遠處，使人養成大量的習慣，而不拘於狹隘的小圈，強作物我之別。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夠有理性：能夠由前提推到結論，由結論回溯前提；能分別，有分寸，重分明，於異見同，更於同察異；能夠作面面觀，如實觀，平等觀，也能容納多方面，重視種種不同的它方面。這都是充實民主所必需。

至於科學，更是實在的學問，是樸實實驗踏實認真的學問，更可以幫人養成踏實認真、實事求是、正視事實、注重證據的習慣。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貨真價實，冒充一定不行。尤其型式科學中的算學，常弄乃可以培養人的謹嚴精審周密不苟的作風。有了這種風氣，實也大有助於真實民主的實踐。

今日要想實踐民主，發展民主，是必須變得有了理性，是必須與哲學的大量精神，與科學的踏實習慣，與算學的謹嚴精審的作風，密切結合的。

是的，實踐民主，發展民主，使民主進步，實現社會一切方面的民主設計，以便全人類適應生物進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實實的坦蕩大道，這乃是今日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任何人不能違抗之，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辦法，如是因此大勢而利導之，必會成功，不這樣子，必都失敗。以上所說，不過原則。至那有關今日全世界的、進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體的辦法，那就尤願合全世界有心有腦的人共同商討，分別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實現。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8日



蔣夫人論民主精神

根據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定，憲政將在抗戰勝利一年以後再實施。也就是說，至少今後數年中，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人民還是時時刻刻關切和需要民主的。

蔣夫人前晚在蔣主席招待國民參政員的讌會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國的民主精神，帶給了國民參政員，並且也提到中國需要的民主精神。報紙上登載的雖然很簡單，但是，已經很值得注意了。

的確「今日世界有兩種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思想，一種是軸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這兩種制度和思想是對立的，尖銳地在鬥爭，而且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二者之間是沒有中間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會逐漸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戲，是對法西斯的掩飾，是對民主共和的諷刺，那還是法西斯，同盟國也是一樣反對它的。我們中國既然列入民主國家的陣線，就要認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我們反對軸心，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

關於民主精神，要說和可說的話很多。我們在這裡，只是簡單的講幾點意思。蔣夫人在報告中說到「民主國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後，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時，她還提到對政府事務要常加批評，這種批評，要負責任，也就是說，「必須於批評之後附以改正的具體意見」，

「使政府接受意見而有所遵循」。這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要這樣，就須關聯到幾個問題：

首先，人民要有意見。這是不必多加討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政府事務的各個方面，因此總是有意見的。好的，它們也會稱讚和鼓勵，壞的，它們也會批評和指責，而且，也會提出意見來。

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這點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要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意思來，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沒有地方說，或者沒有辦法說，那就誰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無從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思，不管他說得出說不出，還要政府中人願意知道才行，否則雖然人民的意思到處都是，應知道的人卻還是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於說話，政府鼓勵人民說話，熱誠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後，人民敢說，政府願聽之後，還要政府積極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實現蔣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見，這些問題，是應予注意和解決的。

總括以上各點，我們著重的提出以前曾經提過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從善如流，過勿憚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對政府事務的批評和具體建議，同時，也要願意不摻雜些毫成見的容許別人發表他們的意見，不應該固執錯誤的措置。應該勇於改過，不能一誤再誤。而正確與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後的依據。

蔣夫人提倡負責的批評和負責的接受批評，確是切中時弊的意見。我們願和全國輿論界一道，歡迎和支持這個意見，並盡力協助政府採取具體步驟，使之實現，培養起民主的風氣來。

——《新華日報》社論 1943年9月22日



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七十七誕辰。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他奮鬥一生，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他首創的三民主義，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的人民能夠過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國父是最能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夠根據實際的情形，不斷的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這種充實和發展，都有一條明顯的線索可尋，那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並決定於人民。

國父為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堅決的反對過陳廉伯的法西斯黨和一切叛逆，反對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反對過一切軍閥專橫，也反對過段祺瑞做了執政後召開的善後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不是他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軍隊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民主的選舉出來的。

國父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斷的採取了很好的政策，從對內到對外，從國民黨的改組和與人民特別是勞動大眾的結合，以及與革命政黨的聯合，到確立對外政策，重中、蘇親密邦交。國父為了他的這些主張曾經以他的偉大辯才折服那些懷疑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認識不清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鬥爭精神，責斥了一部分反對的人。國父的主張終於是勝利了！事實也證明了國父是完全正確的。

國父是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是中國認真走上民主政

治的大道的明燈。現在，我們應再對國父的遺教，作進一步的研究。國父對人民在中華民國的地位，曾經不憚煩的說了又說，解釋了又解釋。他問：「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為基礎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為基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副其實，必要這個國家是以人民為主。」這就是說，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不談建設則已，要談建設，就一定要「以人民為基礎」。尤其是在政治上，國父曾經這樣尖銳的提出人民為主的問題：「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見國父演講《釋自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樣的民主思想，是貫徹在國父的每次演講和手擬的每個文件中的。解釋甚麼是政治時是如此，闡明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為一切平民所公有時，也是如此。所以，國父對民主政治總說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總千叮萬囑的說：「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實。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銘記和求其實現的。

國父對民主政治有這樣明確的定義，所以他對人民參加中華民國的建設具有莫大的熱烈的希望。國父不怕人民，不疏遠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動員人民。而國父在對政黨問題上，也有其民主的獨到的見解。國父說：「政黨之作用在提攜國民，求進步也。甲黨執政，則甲黨所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時，則立於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國父主張多黨並存，並

確定了在野黨的監督地位和糾正的義務，協助的責任。同時，更對甚麼是「良政治」「良政黨」有這樣的指示：「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者乃為良政治。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之政黨乃為良政黨」。而國父對政黨間的競爭，是非常重視的。當然，這裡說的競爭又是以謀國家之進步國民之幸福為唯一中心。國父說：「謀以國家進步國民幸福而生之主張，是謂黨見。」其他則為私見，「因此而生之競爭，是謂黨爭。」其他則為私爭。「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以上均見國父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國父在這裡，用極簡單的話，把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運用，闡述得很具體而深刻了。在這個原則之下，國父還曾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這樣具體的問題，提出了指示。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體系之不同時很明白的。然而兩者對今天中國的任務是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認識，又是一致的。國父看到這點，才肯定的說，共產主義對三民主義是「一個好朋友」。這些問題，在今天來重新恭讀國父遺教，是更有實際意義了。

我們的抗戰，正處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局勢中，同時卻也還有一段極艱苦的路要走。只有團結，才能渡過這段路程，在紀念國父七七誕辰的日子，全國一致來重讀國父關於民主團結的遺教，並努力實行，實為加強團結，克服困難，走上勝利的頂好的辦法。

——《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2日
原題《國父誕辰紀念》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

現在如果再問民主國家同盟和法西斯主義集團的不同處在哪裡？簡直是一個笑話。可是，原則容易談，道理容易說，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現出民主國家是在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戰，是在為消滅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戰。

最近報紙上登載的兩條新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條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西西里居民的廣播。他說：「……但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以肅清佔領區內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傳將被禁止」。「盟方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中止西西里島一切歧視種族與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則將維持，在無礙於軍事行動範圍內，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將恢復，盟國又將採取步驟，以迅速釋放政治犯。」另一條是法國議會議員龐德氏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略）「壓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國人民黨』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號，這顯著的在人民之中樹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眾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肅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

為甚麼盟國要採取上述各項辦法？艾森豪威爾將軍回答說：「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明證。這些原則都是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

很顯然的，法西斯主義集團是反對自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同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制

度和思想)的，是堅持自由主義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既然這樣，就要在行動上以此為準繩。凡是民主國家，都要以最堅決徹底的抗戰，來消滅侵略，消滅淪陷區內的法西斯制度和宣傳，並從根本上消滅法西斯主義，都要團結國內反法西斯的團體和個人，徹底消滅敵人的第五縱隊，肅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傳。

蔣委員長常說我國要精誠團結，他又曾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主持的廣播中，說到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正是發揮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不同。

(被略)

我們應時刻記住「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原則，時刻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認真實現而鬥爭！

——《新華日報》943年7月26日



建立憲政規模

這一次國民參政會的偉大收穫，除了更堅決的確定抗戰到底的國策，粉碎敵人汪派漢奸的鬼蜮陰謀之外，對於抗戰建國最具有意義的，莫過於實行憲政之決議。這一問題，在本屆大會中，受到大部分參政員的關心注意。我們可以看出全國民眾的提高民權加強國本的要求，是如何熱烈地在第四次參政會中反映出來了。因此，詳加討論之結果，便有「(一) 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 有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的決議，而在大會的閉幕詞中，更正確地指出：「敵閥正百計進攻，我自不絲毫自滿。一切力量，皆須發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本會同人詳加審議之結果，以為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為最要之務。用是決議，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

二年來的抗戰，處處證明要打退敵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個國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為國家來貢獻。」更具體地說，只有容納各黨各派人材，提高戰時行政機構的效能；只有嚴令禁止對共產黨及其他抗戰黨派之歧視壓迫行為；只有走上這條實行戰時民主的道路，中國的廣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動員起來。中國共產黨一向為這種主張而努力，這一屆參政會閉幕前夕，毛陳等七參政員，就在他們的意見書中，歷歷提出這幾端了。

誠如論者所說，憲政之性質，不在乎條文，而是在乎事實。但是，我們要曉得：有利於抗戰建國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規定起來，則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種種名義，進行破壞。張一馨參政員在其對議長的答詞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黨政軍各級人員，對於民眾運動，往往有所歧視。道路傳聞，尚有假借取締與指導名義，摧殘合法組織，鉗制正當言論，拘捕熱血青年」的事實，是使人不得不慄然的。制定憲法的目的是要使這種現象能夠根本消滅。但是為召集國民大會來制定憲法，必須在現在就給各黨派合法保證，以便在國民大會前各種黨派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

有一些人，以為戰時軍事高於一切，不應有民主；以為戰時全國上下之經歷，應完全集中於對外，而不當轉移其目標於製憲問題，這些意見，通通被這一次參政會的決議，打得粉碎了。實施憲政可以發揚一切力量；可以加強軍事之勝利，可以提高對外的力量。上面所舉的一些說法，都不以發揮抗戰力量為出發點的。

我們誠懇地擁護國民參政會這一決議，但同時，我們更希望政府要切實地執行參政會這一決議，要不然，決議只成為紙上的東西，對於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大業，是不能有實際的貢獻的。

——《新華日報》1939年9月21日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義是克里米亞會議決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它解決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的矛盾。

本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應當是一致的，因為國家一切的法都應當是經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議決的，所謂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決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經由民主所決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義少數獨裁者所決定的時候，民主主義與合法主義才會發生矛盾。波蘭問題就是一個明白的例子。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拼命詆譟今天真正在國內領導波蘭人民抗戰、真正由人民選出得到人民擁護的臨時政府為不合法，彷彿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蘭人民及各同盟國應當承認與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蘭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據的一九三五年的憲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少數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的「法」。是人民大眾所堅決不能承認的法。而流亡政府過去一貫的政策是消極抗戰、積極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蘭人民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犧牲與損失。他對於波蘭國家民族沒有功勞，只有罪惡，所以他被波蘭人民遺棄了，同時也不能不被同盟國家遺棄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擊詆譟的在波蘭國內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從事實上證明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動搖的政府；所以克里米亞會議上也不能不承認這個

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蘭合法的政府了。

克里米亞會議對解決這個爭論問題的原則，是將「法」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使「法」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決不是只問合乎舊法統或不合乎舊法統，而不問這箇舊法統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為，戰爭目的是為了民主主義，戰爭勝利依靠民主主義，戰後和平的建立，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這是從戰爭勝利、從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解決問題。

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說：「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這正是以民主主義來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堅持的「合法」主義。而且用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有權利參與解決。和敵人用各種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協合作的反民主的人們，是應該被摒棄的。《宣言》中說：「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眾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中，也說到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應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建議，則說：「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和敵人合作妥協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議會的議員。」這正是羅丘斯三巨頭對准法西斯分子所叫囂的「合法」主義的回答。他們決沒有不顧人民的要求和戰爭的需要，離開人民、脫離戰爭，而無原則的支持

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使戰爭受到損害。他們堅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團結為基礎，用民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的最高原則。這的確是賢明的決定。倫敦的南國政府同意了克里米亞會議的建議，倫敦的波蘭人士如前總理米洛拉茲柯和農民黨、大多數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和半數社會黨黨員，都不贊成流亡政府反對克里米亞會議決定的頑固聲明。證明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頑固的「合法」主義已受到廣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的摒棄，只有自趨滅亡的一條路了。

我們完全同意克里米亞會議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而確立民主主義為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的決定。今天中國內部的統一問題，如何動員與統一全國人民抗戰力量的問題，也只有實行民主主義、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徑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比如：有些人極力詆譏敵後解放區人民抗日武裝及民選抗日政府為不合法的，他們曾努力想法取消這些抗日力量。然而這是鞏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廣大人民擁護的敵後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產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違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為。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顯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內部統一問題，也必須循民主途徑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決。希望國民政府與全國人民都朝這個方向努力。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7日 社論

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報的第五版，刊登了一個工業問題的特輯。在這裡，談到鋼鐵和機器，談到後方和敵後，談到了廠家的意見，亦談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斷。我們的能力是有限，我們的條件很困難，因之，我們所能告訴讀者的，真不及真相的萬分之一。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這一個小小的報導，就足夠大家吟味了。

看看國際大勢，德國法西斯很快就會倒下去的；中國抗戰的勝利亦是一定屬於我們的，然而，經濟的困難，卻沉重地壓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物價是怎樣一種狀況？產業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只要平常留意報上的新聞，是用不看詳細的數字就可知道的。

為甚麼有這種困難呢？有些人把它解釋為「充分就業」的結果。如果從形式去了解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說吧！？就業既然充分，過了充分的一定界限，產業便就會像杯中的清水一般，從邊緣溢出來。那麼，溢出來的東西是不足惜的。因為杯中所盛的，已經夠量了；亦就是說，我們的產業之發展，已是達到飽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並不如此。形式邏輯的結論與事實的真正內容，並不能一致。說一句乾脆的話，我們的產業是可憐的很的，我們的工業生產還遠遠落在需要之後，更遠遠的落在我們的盟邦之後，只有不夠，哪裡談得到過剩？

然而，事實上，卻顯得我們的生產，在鬧過剩的危機

了。這是本質上的生產不夠與現象上的生產過剩之矛盾。解釋這個問題的途徑，應當全面地去尋找矛盾的癥結，而不是在現象的面前楞住，把縮小生產作為辦法。還有些人，認為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能力不夠的產業單位之沒落，乃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則。讓他們沒落，不但沒有壞處，而且有促進大生產發展的功用。因此，面對目前這種形勢，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們的重點主義將會在中小生產的廢墟上長大起來?!其實，這亦是不合事實的想頭。阻礙工業生產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則伴中小工業衰落的，將不是大工業的發展，而是囤積居奇的商業資本和充滿寄生性腐爛性的特種資本之發展。

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事。中國的工業必須大大的加以發展，它並沒有飽和，它並沒有滿到邊緣，目前溢出來的那些水，乃是由於杯中投下一些石塊。投下石塊，不但水會溢出來，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險。

我們很同意一位工業家的談話：「民主和科學不可分，工業本身就是科學的體現。離開了民主政治，科學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離開了民主，工業亦只是為了絕少的人的利益而耗盡了工人的勞力」（見元旦本報第五版）。

我們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話：「工人與生產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結合起來，生產的積極性固然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無法改進；如果工業生產者和政府管理機構，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濟以求進步，工業生產亦無由改善」（同上）。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經濟上的民主是解決當前這

個紐結最基本的途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上述的種種困難，才能使提高生產再不至遇到種種制約，才能逐漸克服這一個本質是生產不足而現象是生產過剩的矛盾。

——《新華日報》1944年1月4日 社論



「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

大會演說詞，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周恩來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十九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七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那反攻的準備，才能真正進行。

.....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

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制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

關於時間問題，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為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科學、民主，繼續前進

——魯迅先生逝世六週年紀念

距今四十幾年之前，一個青年的海軍學生跑到日本去改習醫學。在當時「科學救國」和「富國強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當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見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劊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台的是中國人，圍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憬然有感，覺得改革「已經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醫學更重要的事了。從此之後，他「常常提筆」，「在寂寞和艱難中」，「喊幾聲助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的中國新文化奠基者，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戰士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窮畢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從事的工作，擇要地說，是在為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因為他確信「中國的改革，第一自然要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的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他所祈求的新生命是甚麼？用他畢生的言行來說明，也正就是孫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來爭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而要使這樣的一個新中國能夠誕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樣熱心，同樣執拗地主張：中國要有科學、民主！

科學與民主，已經不是新的口號了，但，半世紀來，

賽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國，正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樣，「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這種阻礙新中國誕生的主要障礙了，他自己選擇了的正是在沙漠為肥田的工作，開荒、疏濬，做「革命的馬前卒」。槍斃中國人民心裡的阿Q，肅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文明。——也許，中山先生不曾和魯迅謀面，但是從真實的意義上說，魯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協力者，最有力的發言人。

到今天，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經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擊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經繼續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國的團結，由於千萬健兒的英勇抗戰，由於國際情勢的不變，中國已經走上了否泰交替的關頭；科學與民主，又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了。但，在這黎明將要到來的時機，我們需要更大的戒慎與恐懼！在國際形勢日見好轉的時候，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精神勝利法」，不又在我們民族裡的少數人心頭開始蠢動了嗎？用魯迅的戰鬥精神來徹底的肅清「中國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最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們在今天更應該迎頭趕上，更響亮地提出：中國要的是科學與民主！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9日 社論

中國需要「變」

——摘自某報社論

「『現在交通迅速之奇跡，已使此世界為之縮小』，這是羅斯福總統自克里米亞會議返歸美國時的名言之一。我們要知道正為了『世界為之縮小』，世界才在那裡急劇地轉變。」

「世界縮小了，時代轉變了。政治、經濟、制度、習俗、藝術，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轉變了。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裡急劇的轉變，若有人焉，偏要固執己見，堅持所故而不變，試想這個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後果的悲慘，是否還可以想像？」

「因為如此，我們敢明白主張要『應變』。要隨歷史的法輪去實時轉變。因為固執而不變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必要的。唯有應茲時所需以轉變，方不失為俊杰，才能在今後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勞績可稱述的人物。」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及政策，是應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義，是針

對問題的，如果問題改了，世界變了，那麼，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隨之改變了。」「所以世界上的聰明人，沒有不因時代轉變而轉變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都是傻子，所以現在我們敢明白主張要『轉變』。」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李普

有人說：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議論紛紛，所以必然會減低行政效率，甚至毫無效率可言；因此，特別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之中，民主是絕對不適宜的。

解放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胡說。

共產黨員對民主作風的學習中，黨的領導機關的堅決的領導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同時，民主作風本身所發揮的驚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它本身的那種驚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風的普遍風行便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同時，如果實行民主反而必然減低效率，削弱力量，那麼「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甚麼意思呢？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對民主卻又不得不偽裝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襲一套刀筆吏「欲抑先揚」的惡劣手法嗎？

我們還是來談點實際的事情。首先，讓我們介紹河北臨城西峪村村長、共產黨員郭秋根轉變作風的故事。

郭秋根轉變作風以前，這個村莊事事沒有生氣，抗敵工作做不好，生產運動搞不起來，全村仍舊過貧窮的生活，年年不夠吃的。以後，由於他「使喚了民主」，才動員和組織了全村的力氣，領導了全村從貧窮走到了富足。縣上開

勞動英雄大會時，這個村子被選為生產模範村，他自己也被選為模範村長。下面是他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們看他怎樣一點一滴，慢慢地嘗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戰以來的老村長，自己過去的作風是『下馬三聲炮』，叫別人幹甚麼，不幹就不沾。我常常說，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裡裝，我啥事情不能夠做主？去年麥收前上級調我到縣裡受訓，講的全是『樹立群眾觀念、克服行政命令』，並讓我們反省。我當時發言說：

『如果和群眾商量，啥事也辦不成。老百姓是奴隸性，不壓迫就不沾』。上級又給我解釋三次，我說：『就比如我們村幹部吧，區裡不硬逼還不幹哩。老百姓不逼還能沾？』後來上級又說：『光強迫在群眾間樹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級對你光強迫，你心裡能高興嗎？如果你能好好說服群眾，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樣群眾一定很滿意，你在群眾中，就有威信了』。這句話把我提醒了，我發覺就是這樣，如果上級光強迫我，我也是不高興。如果我光強迫群眾，同樣群眾會不信仰我。這樣子對上對下都不落好，何苦來？在心裡總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和群眾商量說服，到底沾不沾還不保險。一個是自己命令勁頭已形成了老習慣，還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來才行。」

「受訓回來以後，我心裡的想法是試試吧，看到底哪樣辦法沾。後來我就開始試驗了，起初我想先和群眾商量商量，如打開腦筋就算了，打不開還是強迫。試驗了一下沒試成功，我就逐漸不信上級所說的話了。」

「到冬天，上級佈置了擴兵工作，全村幹部都忙起來。

這個去說服，那個去動員，總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參軍，但是誰也怕走後家裡沒人照管。幹部說保證優待，他們不信。我那時候沒有學會民主，在群眾當中毫沒有威信哩，這事情可真是假哩。『後來我們想出個辦法，就是讓群眾大家討論，大家動員，大家保證優抗。這樣一試驗，就弄成了。我一想：原來是人多話大，大家保證優抗，就使想參軍的人安了心。這就使我感到群眾還是沾，動員大家做，比光是幹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級號召打洞備戰。幹部看了一個地方，群眾都說：幹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頭。打了一下，果然被石頭擋住了，群眾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這又給我一個經驗，就是群眾大家的辦法比我們的辦法沾。」

從此之後，他就遇事採取了和群眾商量的辦法，比如，全村割麥時幹部會計劃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緊七慢八），又派群眾討論了一頓，大家都說四天保險能完，可是幹了兩天半就收割、打場、藏糧都鬧好了，這說明群眾自己討論決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幹』。再如動員群眾打蝗、開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為和群眾商量討論所以鬧的很好。」

這給我們說明了一個真理：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當然，這首先必須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十分明白，無用乎多加解釋。唯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才利於實行民主，反對人民的人誰敢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願意讓自己壓迫之下的人民

起來談話、願意把自己壓迫和剝削人民的企圖和設施給人民來討論，天下沒有這樣的傻瓜。

山東沂蒙區在幾年以前開始推行民主文化運動的時候，個別的幹部唧咕說：「實行民主就壞了，辦公不好辦，不大離兒硬一點才行」。有的說：「民主，還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莊莊東頭的老百姓要向莊長提意見，莊長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還有啥壞處？」

但是現在，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們已在普遍地歌頌民主了。

讓我們再引一個行政村主任的話：

「這幾天的會，開的我腦筋有了些開化，越想越不對。像年冬時，要集軍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給我村計劃跟老百姓自動一千塊，我回去就按戶每家攤了五十元。款是集起來了，可是下層有了反映，說我主任辦事不公道，『棗圪桃一類數』，為甚麼不論窮富一律五十塊？我那時心裡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見多」。

「所以，過年時，要慰勞部隊和抗屬，我沒有動員，又怕下層反映，就自己訂了個數目，都給上層的攤開。好面、菜飯雖然也都起齊了，可是上層又有了反映，借口說為甚麼我不讓人家下層撫軍，說我壓迫。我心裡還是不舒意」。

「這一次開會，我可想開了。前天隊伍打開方山圪洞，我想我應該發動勞軍，這次我再沒用攤派的辦法。我民主了一下，讓眾人們自動，想不動人家都自動的嘩嘩報上來，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擔蘿蔔，不論窮富都出的乾脆，比

上回還慰勞的多。比我心裡事先估的也多。」

「你們看，不民主，群眾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發揚民主，事情就辦的比你想像的還好」。

「咳，我索性徹底吧。我做工作，老實說，甚麼都是應付。給老百姓謀利益，我不往那上頭想。過去我一點也不積極」(這時有人發問，以後你是還要應付，還是要積極?)。「以後我當然要積極。你看，方山圪洞都打開了，我們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有了民主什事還怕鬧不好?」

對於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主帶給他以無比的信心!

勞動英雄溫像栓說得好:

「我們要把壞思想丟到河灘裡，明年開春，解了凍，給水推走，裝上好思想好作風去工作，大家翻身發財……。」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第二輯

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英) 普里斯萊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眾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明白了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了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眾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像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裡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為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眾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

甚麼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麼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裡胡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為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台上一具可憐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霉，權柄必定為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眾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做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佔吧，而他們必定憑借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為然，

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他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竟是民眾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眾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

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為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產生效力的意志是群眾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責，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甚麼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產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為他們組織精密。……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為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為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麼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甚麼時候消失了，男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女人為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

文字略有改動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大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予。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

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

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甚麼、反對甚麼，要做甚麼、要不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為民主拚命

黃炎培先生^①在復旦大學關於憲政與民主的一篇泛談，讀來使人擊節興奮。這是黃先生最熱烈坦白的一次言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足見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高潮，激蕩人心。黃先生說得好：「民主是不成問題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說：「我們是為民主而戰，為自由而戰，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別人是不是有誠意實行憲政，「我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憲政的禮物送上門。」所以他主張「為民主拚命」。最重要的一點，是黃先生痛切地大聲疾呼：「民族的苦難日益嚴重，希望我們大家以後做人要改革作風。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難怕阻礙，今後要說就說，要幹就幹，良心以為該做的便做，認為不當做的便不做，絕對不做。要做民主國家的人民，這是起碼的條件。」

這是完全正確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爭取民主的作風。要爭取民主，就是要從改變這種怕困難怕阻礙的作風做起，要取於拚命。

黃先生的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日 短評

^①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四九年後曾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

工程師和民主

韋華

離開大學我便在黔桂鐵路服務，到這一次狼狽逃難止，恰恰三年半。在這三年半中，我測量過路線，監造過橋涵隧道，最後我主管一個軍用車站，赤腳在水田裡看經緯機，修了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幾所房子。可是曾幾何時，這些都崩塌了，破壞了。

修這條鐵路為的甚麼呢？為的運輸物資、軍隊，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廠機器運不出來，而只是替特殊階級運輸桌椅沙發，那麼又何必修它呢？！假如……

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這鐵路多保存幾時，能使橋涵隧道車站多保存幾日，為甚麼不去做呢？！工程師就專為的是修路和破壞路嗎？多少人都認為科學技術與政治無關，工程師不必去管政治，現在應該看出關係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這鐵路，去保護這些鐵路上的員工，要是軍民關係搞好了，民眾組織起來了，軍隊生活改善了，鐵路員工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我相信我們的鐵路是可以多用幾日的，我們的工作意義當更大些，要做到上面這幾點，單單局部改革沒有用……；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關心政治 • 改良政治

—— 一位工程師的話

我們機關裡新近來了一個同事，是工程師，我們是個文化機關，和他所學的風馬牛不相及。再打聽一下，他在國內大學畢業，又在日本、德國留學多年，專攻航空工程，因為不善逢迎，先後被幾家工廠和某機關趕跑了。有一次，他對我們發感慨道：

「我過去以為切切實實學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不用關心甚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來影響你。一種不良的政治，它到處會排擠你，壓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報效談不上，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為人家講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到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甚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後決心跟隨大家多多研究政治。」

沒有良好的政治，學甚麼技術，也還是沒有保障。

—— 《新華日報》1945年3月7日

第三輯

民主主義的利刃

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昨前兩天有兩件新聞一定會引起我們中國人民的興趣和重視，也值得我們借鏡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見報的王雲五先生^①訪英回國後關於《實施憲政先決條件》的演講中對英國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加以闡揚；一件是讀見報的美國國務卿赫爾的關於言論自由的聲明，他駁復了紐約州長杜威百分之百的誤解之後，鄭重表示「有生以來，不僅倡導言論自由，而且為這個目標而鬥爭。」

王雲五先生說，英國憲政基礎的鞏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有自治權力，「英國的城市自治遠在實施憲政前，在撒克遜時代，倫敦已具有一種獨立的地位，迄於今日」。這說明了民主國家的民主基礎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權參與政事然後鞏固起來的。因此可知，離開人民的民權，不從下做起，是不能造出鞏固的憲政基礎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過是造些空中樓閣而已。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講的第二第三兩點。這兩點把民主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自由與平等的含義說得很明白。關於「平等」，他說：「一則武斷的權力絕對不允許存在。換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續、經普通法院的審判

後，不得受罰。二則……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無論以私人資格或執行公務之資格，苟有違法越權的行為，將一律與人民受同樣的普通法院之管轄，與同樣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關於「自由」，王雲五先生說：「人民的基本自由極受尊重。英國人的普遍見解，以為民治的憲政能否達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權選舉其欲選舉之人以組織政府，並得以和平手段變更其所反對的政府。然欲達上述之目的，則人民須能自由批評其政府，自由集會討論政治，並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與拘禁。因此他們視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為憲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沒有這些自由，民治的憲政是不能成功的。」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如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

「平等」與「自由」為甚麼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演講）。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我們從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沒有平等，若是與王雲五先生所說英國人民的見

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麼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權利，所以永遠不能成為民主國家。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們想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人類的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應該決沒有一個人會把這些精華連根毀損而加以唾棄的。

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① 王雲五（1888—1979）生於上海。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1949年赴台灣。編有《萬有文庫》、《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大辭典》等。

民主頌

——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裡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惻隱，杰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徵。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馬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裡，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

人感謝「美麥」，感謝「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杰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分。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嚮往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裡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美國國慶日

——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杰佛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佈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於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務，同時還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杰佛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了美國為甚麼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民主世界的雙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些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對於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從來都是給予高度的評價的。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鬥爭中完成的。

列寧說，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正因為如此，美國的民主派領袖杰佛遜和杰克遜，美國民主黨的這兩個創造者，在他們鬥爭中甚至被他們的政敵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美國窮木工的兒子林肯，他所領導的黑奴解放戰爭被馬克思稱為「開始了勞動階級興起的新時期」。而在實際上，他與馬克思所領導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和歐洲共產主義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擔任他的軍官。這樣，他就更有理由被當時的反動派指為「共產主義」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後這些頑固分子竟然暗殺了他。

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毫無疑問的，今天美國以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盡人皆知，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在國際關係上是竭力主張迅速開闢第二戰場、堅決打擊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聯合蘇聯、援助中國，要求中國團結民主，把大西洋憲章的自由民主原則推行於全世界的；在國內關係上是竭力主張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與士兵權利、反對大資本家的壟斷的。因此，和他們的先驅者一樣，他們也受到國內的反動派、孤立派、頑固派及其國際應聲蟲所攻擊。但是也因此，他們卻得到了美國從開明資產階級直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擁護，得到了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當然，今天的時代異於華盛頓、林肯的時代，但是恰

是這一點，格外加重了美國民主主義的意義和使命。如果華盛頓、杰佛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這一次全人類的英勇戰鬥中，美國在作為民主世界的兵工廠上，在作為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和太平洋戰爭的最大擔負者上，已經建立了不朽的偉績。而在戰後，為了確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國顯然也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後團結，是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政策，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於美國利益、也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

今天中國為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鬥爭，正和 1776 年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戰鬥民主派的已故領袖、就是美國人民所熟悉的孫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號就是林肯的口號：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國民黨今天的一部分統治人士竟十分厭惡這個口號，如同他們在抗日戰爭的事業上怠工一樣，他們直到美國民主共和國出現的一百六十八年後，還拒絕實行民主制度，並且學希特勒的腔調，指斥這是已經落伍的「十八世紀的學說」。

他們的民族理論也是希特勒式的，他們否認中國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們的術語，美國不但是英國的一個「宗族」，簡直也可以是德國的一個「宗族」。這些都使中國各階層各民族的團結受到嚴重的妨害。這種情況，使中國的「獨立戰爭」，遇到遠過於美國的困難。美國的獨立戰爭在第八年上勝利了，而今天的中國，雖然得到了美國寶貴的援助，卻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反對民主，在抗戰第八年的前夜還失去了幾乎整個河南和大半個湖南，並且更大的危機還在前面。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杰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杰佛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我們一定能團結中國一切抗日與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社論

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徵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國家之一。

「七月四日」，這日子代表一個甚麼意義，包含一種甚麼內容，美國人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正在以血肉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來說，也同樣是值得體驗、值得認識而且學習的。因為不管時代是怎樣的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樣的相異，人類的任何進步事業和改革運動，尤其是人民的解放鬥爭，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經過艱難困苦的鬥爭，迂迴曲折的進展，以底於成功。其中發展的規律差不多總是一樣的。

七月四日，在美國有雙重的紀念意義：一是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正式宣佈獨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費城舉行大遊行，慶祝接受新政府形式，準備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從獨立宣言的公佈到美國聯邦共和國政府的成立，其間經過的時間達十二年之久，這十二年的時間，是美國人民與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鬥的時間，華盛頓率領了一批「衣衫襤褸而生蟲」的烏合之眾，屢進屢退，艱苦掙扎，瀕於崩潰的有多少次。然而華盛頓終於勝利了，勝利的原因在甚

麼地方呢？在於華盛頓的部隊是爭取人民解放的部隊，是人民的部隊。華盛頓所進行的戰爭是一種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爭是不可抗拒的。美國的革命軍當時雖也得到法國的援助和鼓勵，但是主要的勝利仍舊是革命軍的，仍舊是美國人民的。

美國的革命軍不過是些「古怪的農民軍」，然而他們勝利了，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數量上和武器上都佔絕對優勢的軍隊，理由很簡單，只是在他們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獨立的軍隊，是代表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違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達到的。當時的殖民政府不了解這一點，以為這不過是少數人的「叛亂」，是可以武力撲滅的。當一六七六年柏康領導的第一次反殖民政府的暴動失敗以後，總督柏加利向他捉來的俘虜鞠了一躬，譏諷道：「杜魯門先生，我很歡迎你，在半小時之內，你就要被縊死了。」可是他雖然得意洋洋的縊死了一個俘虜，而曾幾何時，美國人民卻起來縊殺了整個殖民政府。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違背的，這兩點在美國的獨立革命歷史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美國人民也應該永遠相信這個真理。就因為這個基本的真理，產生出一個獨立自由而民主強大的美國，這國家，直到今天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國家之一。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杰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

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社論 1945年7月4日



祝賀美國國慶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日——獨立紀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國人民發表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文獻——《獨立宣言》，從此展開了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獨立戰爭。

為《獨立宣言》中「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國人民，歷盡困難挫折，奮戰八年，終於贏得了民族革命戰爭，如列寧所說的，是「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獨立宣言並昭示我們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不可分離的真理。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獨立宣言》、消滅大地竹筏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遜，黑奴解放者、窮木工的兒子林肯，領導美國反法西斯戰爭、倡導四大自由的羅斯福，就是代表這一獨立宣言歷史傳統的美國人民的領袖。

中國人民歆羨美國人民的光榮歷史傳統。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不折不撓地為自己的獨立民主自由英勇奮鬥，並經歷了自己的「獨立戰爭」——抗日戰爭。由於今天中國的環境與一百七十年前美國的環境不同，在中國人前面，不僅有封建勢力，而且還有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中國人民在百年艱苦鬥爭和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沒有能夠向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之後，迅速實現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今天大半個中國的人民正在呻吟與國民黨獨裁政府的虐政之下。這個政府，正如美時代雜誌記

者所稱呼的，是一個「惡政府」。引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它「一貫地追求同一目標的一連串的虐政和篡竊，證明有把人民置於絕對專制之下的陰謀」。《獨立宣言》中說：「推翻這樣的惡政府，並為人民的日後安全設立新的保障，就成為人民的權利和天職。」可是我們中國人民向來是最寬大的。今天中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惡政府」，並不運用美國獨立宣言所說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權利和天職」，而只是要求它放棄「絕對專制」，經過和平的政治協商方式，把現政府改組為民主的聯合政府。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人民這樣仁至義盡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採取了甚麼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發動大規模內戰，就是加強特務恐怖，就是血腥鎮壓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運動，就是不惜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利益來維持它的「絕對專制」。

對於中國這樣的「惡政府」，美國當局方面採取了甚麼政策呢？誰都知道，美國當局今天的政策，是無條件地以強力支持蔣介石政府，使它有恃無恐地堅持獨裁內戰，陷中國於內戰、恐怖和貧困的慘境。美國當局，除了已經進行的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如以大量物資供給、裝備、訓練、運輸蔣軍，替蔣軍護路、築路、保護港口、長期在華駐軍等方式助蔣內戰）以外，還向美國國會提出軍事援蔣法案。這個法案，不僅將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而且將使蔣軍完全成為外國的附庸，將使中國變為菲律賓第二。這就是說，美國帝國主義分子，通過中國的獨裁者蔣介石，企圖使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還要嘗受

殖民地奴隸的滋味。這是中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美國人民是不難了解中國人民這一正義的立場的。他們一定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還要受另外一個外國的統治，繼續殖民地的生活，那麼美國人民能不能忍受呢？顯而易見的，美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忍受的。林肯有言：「我既不願做奴隸，也不願當做奴隸主。」但是在今天美國，卻有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正在妄圖做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奴隸主」。無疑的，曾經飽嘗過殖民地壓迫並從這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美國人民，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對於中國人民的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的鬥爭，是一向具有熱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惡政府」所統治，那麼中國不會有和平，世界也不會有和平，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災難，也是對美國人民的災難。因此，美國人民對於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想做「奴隸主」的企圖是痛恨的。美國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對當局干涉中國內政的運動正在增長；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宣言、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紐約分會的反對使美國陸軍訓練中國軍隊的決議和德拉西議員在眾議院的發言僅僅是幾個例子而已。際茲美國國慶，我們除向美國人民致熱烈的慶賀外，並號召他們發揚獨立宣言的光榮傳統，一致起來制止當局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軍火，要求當局立即撤回在中國領土上的海路空軍，要求政府和國會撤銷軍事援華法案，迅速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這樣使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兩國人民

的傳統友誼能夠不斷增進，中國兩國的經濟文化關係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日益發展。

我們中國人民堅信：我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鬥爭，必然獲得美國人民及其他各國人民的有力的聲援，正如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獲得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戰爭中獲得歐洲大陸各國人民特別是英國人民的聲援而阻止了英國當局的干涉一樣。中國人民一定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國家，不達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國人民運動的聲援下，不管還有許多巨大的困難和阻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們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7 月 4 日



紀念杰斐遜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國開國元勳杰斐遜先生的誕生二百零二年的紀念日。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他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他畢生為平民的利益而奮鬥，特別是堅信農民是美國文化的基礎，所以他就畢生為農民生活的改善與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他堅信人類不分膚色、宗教、國籍、男女，都應該平等自由，所以他在有名的給馬迪遜的信札中，強調地指出了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法案明確地列入美國憲章裡面。很明白，因為人民沒有這種權利，就不足以「明確規定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與不受威脅。」「上帝給我人以生命，同時即給我人以自由」，這是他早年就懷抱了的思想。這種思想發展而成為《獨立宣言》，而成為《權利法案》，而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洶湧奔流的時候，也就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

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杰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民主是不可分割的，這正和和平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一樣的真实。我們要在戰後創造一個普遍的世界和平，我們就必須根絕世界上任何一地任何一國的干涉人民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思想與體制，忽略乃至縱容法西斯殘餘及其變形擬態，是有害而有罪的。杰斐遜先生寫過：「權利法案為人民所有，可以對待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論其為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公正的政府不應拒絕或加以干涉。」在戰後和平方案正要在舊金山會議中籌議的今天，我們認為重新提出杰斐遜先生的這句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義的。

杰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杰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在戰爭沒有波及美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說過：「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且為此權利而奮鬥，」現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全體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蘭宣言)

——《新華日報》社論 1945 年 4 月 13 日

真實的民主戰士

羅泊

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國家，但是要從美國開國史中去找尋關於民主主義的完全的理論，我們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為民主主義的經典的《獨立宣言》，內容是何等單純，所謂「天賦人權」的說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會覺得太幼稚了。

但是我們若真正的用歷史的眼光，把自己也好像置身於十八世紀中葉的時代中間，那麼我們一定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像的罷？我們可以看到一批真實的民主戰士，他們是何等堅決，何等勇敢！他們的信念雖然單純，但他們是何等頑強地堅守他們的信念，而且大聲地說出他們的信念，毫不含糊，毫無顧忌，而且在行動中貫徹他們的信念，再不掉頭回顧一下。他們雖然說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論，但一切學究的理論在他們的偉大作為之前豈不都是蒼白可憐的存在了麼？

假如歷史的運行究竟不是在紙面上，而是在實踐中；假如民主主義並不只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的信念、硬是非這樣幹不可的生活態度，那麼我們不能不景仰這些在一百六十年前的從新大陸的「賤民」中站起來的民主戰士。他們建造了新的天地，開創了新的歷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類為反對法西斯、保衛民主而戰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從他們所言所行中得到無限的鼓舞。

美國的開國英雄共同持有一個信念，就是：人與人是生來平等的。關於這點，他們並沒有引經據典，寫出有系統的理論，而或許在他們看來也不必要做甚麼理論的說明，因為他們覺得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們演講，就講這個信念；他們寫小冊子，寫論文，就寫這個信念；他們行動，就要在行動中貫徹這個信念；他們流血戰鬥，仍只是為了實現這個信念。脫離這個信念而生活，那就是說，不把旁人看作是跟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作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對於他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試摘錄點當時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雄的話來，就可看出他們的信念是何等單純而又何等執著。像年青的哈密爾頓(A • Hamilton)說：

「人的神聖權利，絕不是從陳舊的字紙堆裡找得出來的，而是用神聖的大手筆，好像用太陽的光輝一樣，寫錄在人類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遠不能被人間的權威所塗抹或者遮蔽掉的」。這是何等的堅信啊！

霍布金(S • Hopkings)又說：

「一個人倘若有服從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隸！他有個惡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隸；他的主人，縱然善良，他也仍舊還是個奴隸」。這又是何等鮮明的昭告啊！美國革命時代的民主戰士們就是這樣地尊重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這樣地判然劃分奴隸與自由人的道路，絕沒有徘徊中間的餘地。因此，當時還有一個人說：

「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執役作卑賤的奴隸的時候，誰又能不去拿起卜魯特斯(Brutus)的無情的刀，克林威爾

(Cromwell)的鮮紅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亨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於是當時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遲疑地拿起他們的刀斧，打了七年仗，爭得了他們不做奴隸、而做自由人的地位。

這一切看來真是再平易不過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誠意地承認並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權利，那還有甚麼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國獨立戰爭發動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發表了一本宣揚民主觀念最有力、對革命的發生有直接影響的小書，這本書的題目不過是《常識》二字(Common Sence)。歐洲的王公貴族所視為毒蛇猛獸的民主主義，對他們不過是常識，因為那已浸透在他們的全部生命中了。在這小冊中有這樣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裡，一個誠實真摯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冠冕的惡漢，對於社會還有價值些。」

真正的民主戰士，就不過是最誠實最真摯的人。獨立戰爭的領袖，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小學教科書上的斫櫻桃的故事是已經使我們知道的了。

解放黑奴隸固然還是在獨立戰爭後數十年的事，但獨立戰爭中的人物如華盛頓和起草獨立宣言的杰弗遜是已反對奴隸制度的了。因為這種制度顯然和他們的信念不和。領導反對奴隸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據了獨立宣言的精神而說：

「方今是一個交換的世界，凡不願給旁人做奴隸的人，就應當不願以旁人做奴隸。凡拒絕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應該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這

樣的人縱然有了自由也絕無久享之理」。這正是說，壓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這是何等輝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於木匠的職業，和華盛頓同樣是最「真誠懇」不過的人。

就從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真實的民主精神和真實的民主的戰士。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美國的民主傳統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從華盛頓總統直到林肯總統，美國曆次的戰爭，都是為民主而打的；美國目前所參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為民主，應當是為民主。

這原因一半是美國的立國是由於人民要求民主而來（獨立戰爭）；一半是從這個立國基礎，使美國人得到一種體念，就是羅斯福總統對杰斐遜所下的評語：「杰斐遜對於人類之所相信者與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與吾人同信人類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這信念是美國兩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結論，不但是教訓美國人民，而且應當是全世界人類的教訓。

「任何帝王暴君與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旨哉斯言，這正是打破一切法西斯侵略統治者任何借口的一把利刃，一個鋼錘。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短評

為了人類

史綱

為了人類! 為了人類!
於是年輕的美國，昇起了旗，
吹起了號角，擊響了戰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結集了世界愛自由的人，
開始實驗新政體，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歐洲，
早他六年就說了「自由、平等、博愛」，
年輕的美國卻從出世嬰兒
那時就實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沒有高高的巴斯蒂爾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種歷史——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結合——不是分離——的歷史，
年輕的美國一章又一章的寫
喬治·華盛頓寫，杰弗遜寫，
林肯寫，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羅斯福在爐旁著述。
我們該如何羨慕年輕的美國，
像一個圓球的民主國家，
能平滑地滾動，富於彈性的蹦跳，

不像多邊多角的法西斯統治。
年輕的美國沒有對人類失望，
將來人要知道世界本是個圓球。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每一個在華美國兵都應當成為 民主的活廣告」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①等人的談話

美國已經干涉了有它的軍隊和物資運入的每一個國家。這種干涉不一定是有意，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國的影響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因為它使國民黨有可能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澤東指出，他對這個詞是有異議的，因為這個詞用在下面這種情況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將為中國廣大群眾所歡迎，因為他們需要民主，只有國民黨才反對它。

美國現有的地位完全不同於珍珠港事變剛發生的時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撫慰蔣介石。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戰爭計，他應當做些甚麼。美國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幫助他。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的其他方法是多談論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在美國，每一個美國官員和任何中國官員談話時，可以談論民主。類似華萊士的訪問就提供了良好的機會，這種機會應當更多一些，不要錯過孔祥熙在美國的機會。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像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於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於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分佈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製造麻煩就更加困難。

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美國刊物對國民黨提出批評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馬上就看得出來。甚至看來常常會暫時地產生不良反應。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話，國民黨就會辨別出來)，就會引起國民黨猶豫考慮，因為國民黨

需要美國的支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
《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

① 謝偉思（1909—）美國人，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1944 年 7 月陪同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主張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職。本文選自謝偉思訪問延安後給美國政府寫的一篇報告。



中美兩國是天然的盟友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存在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關的緊密聯繫。雙方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本質上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麼低，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美中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她不希望在高級的特制產品上與美國競爭。而美國為了它的重工業和這一類產品，需要出口市場，它同時還需要為投資尋找出路。

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並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最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產品。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農產品，可以作為外貿和外國投資的補償。

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

由於上述原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產生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
我們歡迎它」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即使對國民黨來說，事實也很清楚，中國的政治潮流是傾向於我們的。我們堅持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個真正偉大而又民主的文獻。孫中山不是共產黨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會很快過時。即使國民黨崩潰，我們也會堅持這個宣言，因為它的總政策是好的和適用於中國的。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綱領的每一項條款，都可以從這個文獻中找到。

當然，我們並不假裝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我們也面臨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視它們，我們正在克服它們。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監督和批評。我們經常自我批評和修訂政策，朝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甚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裡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

(我對他強調美國的重要性而忽視蘇聯，提出了疑問。)

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戰後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於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忙於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

(我開玩笑地說，「共產主義者」的名稱可能使某些美國實業家不放心。毛澤東笑起來，他說他們考慮過換一換名稱，但是如果人們了解他們，就不會感到害怕。)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是沒有偏見的。我們的減租是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據未付實施的一項國民黨法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使這樣，我們也不過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為我們不需要趕走地主。我們對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慮到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並不是絕對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實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我們既沒有只吸收西方機械技術的天真想法，也不對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感興趣。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

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請看我們這兒以有限的資源已經做了些甚麼)。其次，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像蔣介石在他《中國之命運》中所談論的。我們將關心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華萊士先生的偉論：

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華萊士副總統到重慶，今天是第五天。這幾天裡，他發表了三次演說，一次和中外記者談話。他的言論，有其一貫的精神：堅決消滅法西斯，國際國內的民主主義，對中國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並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對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堅持抗戰，真是讚揚不止的。他也曾叫學生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又說學生「都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力的人……這偉大的力量，用去打擊和消滅法西斯……法西斯是人類的禍根！法西斯不能鏟草除根，人類是沒有和平幸福的」。他認為勝利和平，安定幸福，決定於科學和民主。這又「實以教育理工方面之專門訓練，及民主主義之自治為最善方法」。有人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他卻認為中國人民早就有了這個準備了。他更強調的說，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對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華萊士副總統說這些話，我們確信決不是「捧場」，這正是既賦有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紀」的意義和中國人民實際情況的政治家的衷心話。

這是「人民的世紀」，這是人民的戰爭，看到並信任人民的人們，都會得出同一的結論。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的話，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羅斯福總統年初致國會咨文中所

說的擴大民主的含義，和華萊士副總統常常說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義。

中國人民處在「人民的世紀」和人民的戰爭中，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更提高自信心和責任心，應該怎樣加倍努力呢？

華萊士副總統說，美國援華物資，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緬路打通之後，會增加得更多。這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希望這些援助能夠達到前線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同時，我們也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句直率話，不管美國運多少物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們相信這句話只有像華萊士副總統這樣了解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這樣坦白地說出來。這句話決不是表示美國不願意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困難，更不表示中國經濟困難沒法解決，而只是說中國有力量解決這種問題，這種力量在中國國內，在中國人民。其實，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莫不如此。

我們聽到華萊士副總統的一番話，就很容易了解為甚麼美國全國團結得那樣好，為甚麼艾森豪威爾將軍統率的盟軍能在法北勝利；為甚麼尼米茲海軍上將統率的海軍，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馬里亞納和菲島之間，獲得海陸空三方面的大勝；為甚麼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能夠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進展；為甚麼史迪威將軍在緬北，陳納德將軍在中國上空能夠發揮這樣大的陸空威力；為甚麼美國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我們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擴大民主。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固然是為了收集情報，供給羅斯

福總統，我們卻不能放過機會，從他那裡獲取可供借鏡的東西。中美兩國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紀」，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並肩作戰，應該像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勵相互規勸，相互學習，攜手向民主、更民主的勝利大道走去！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6 月 24 日



羅斯福的廣播演說：四大自由

一個強有力的攻勢，正在全世界展開。

這是同盟國在軍事攻勢之外的一個政治攻勢，向法西斯主義進擊的民主主義的攻勢！

這是雪球般的運動，越滾越快，越滾越大，越滾越有力。任你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它。這又像狂瀾決堤，無往不屆。任你是甚麼妖魔鬼怪，也經不住它，終歸是沖刷一空。

野獸橫行的世界，需要它；烏煙瘴氣的世界，需要它。它帶給人類以自由和平及幸福。它給人類帶來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終於要爆發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意大利這座火山，終於給法西斯主義第一個爆炸。

人民的呼聲，終於是人民的。丘吉爾在大西洋對岸一聲怒吼，太平洋上也發出了羅斯福的又一聲巨響。民主自由，震天地響遍幾大洋。

民主是呼聲，是力量，是勝利的保障。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國所一致崇奉的，讓我們試引一點他的話：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於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意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擔任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眾，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

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佔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擄掠和飢饉的方式。」

「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佔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決心為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的尊嚴，使為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和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已開始履行這一諾言了。」

只有徹底反法西斯的，堅決擁護民主的人物，才能這樣自信的提出這樣的民主主張。羅斯福說這些話，更可見其偉大處。

羅斯福的民主主張，正是意大利和一切法西斯國家內人民的主張。眼前的事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血」的口號嗎？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懲罰法西斯的組織和領袖嗎？是的！「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毀法西斯黨嗎？（被略）是的，意大利的人民是在為四大自由而鬥爭，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而做本身命運的主宰！

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應該受尊敬的，因為他們能夠代表民主主義的精神。

我們聽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民主呼聲，真是興奮。因為這是勝利的保障。我們聽到意大利人民的呼聲，也非常興奮，因為意大利就要見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曙光了。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被略）

我們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來，參加到

謳歌四大自由的大隊人群中去。

勝利在招手。(被略)讓我們大踏步的(被略)迎接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3 年 7 月 31 日



東西不同論（二則）

一、

渥太華雜誌說：「英國人民對於反對黨的討論、辯論和評論，非常重視，所以由國庫撥款成立反對黨，使之評論政府。」

看了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驚。理由不辨自明：讓人民來評論，這種辦法是不合於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習慣的。東西文化的不同之點，恐怕這倒是一例。

——《新華日報》短評 1944 年 10 月 25 日

二、

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

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

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短評 1944 年 10 月 3 日

延安印象記：

中共對美國的友誼是真誠的

(美)•白修德

共產黨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傾向美國的，因為他們認識了我們(美國)將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認識了我們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實行這個政策中，他們一切的宣言現在是向美國說明三種意見。第一是說明他的黨在抗日戰爭中擁有龐大的力量，一個可以直接配合美國作戰的力量。第二是說他們黨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軍隊，是以有作為的民主的制度為根據的。第三是說該黨願永遠和美國作朋友。

關於共產黨所能調遣的軍事力量，那是沒有問題的，其範圍，可以從日軍及其附庸軍隊在那些地區的配置上反映出來。

關於民主的辦法，現在也沒有問題。共產黨現在實行民主，是因為民主有利。你可以請一個曾經被踢打被欺負、而其父親傳給他過去受壓迫的記憶的農民來，然後，你拿他當人看待，徵求他的意見，讓他選舉當地的政府和治安機關，讓他自己去表決減租，讓他自己去選舉軍隊和民軍，假如你做了這些，你就給了他以社會的權利；這樣，他就願意為社會和給予他們權利的黨二者而戰。附和或者選舉另外任何人與另外任何黨，對於他將視為可笑的了。

這種共產黨的民主領導，是否可能在戰後，在那政治可能腐敗的大城市里以及有完整組織的富裕的善辯的反對黨派的地方實現，還得等將來決定。共產黨覺得，如果一切階級裡的成人都能有選舉權，那麼，黨就能夠掌握群眾；因此，民主便確實地成為中國本身、共產黨和群眾三者同時發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共產黨所宣佈的對美國的友誼，現在是真誠的，而如果他們的友誼能夠得到相同的友誼的話，可能成為一種長久的友誼。抗日戰爭是如此的艱苦，使共產主義者，成了民族主義者；而同時，日本的任何敵人，都變成了他們的知心好友。作為日本主要的敵人的美國，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更覺得美國能夠在產生和平與將來中國有秩序的發展中有最大的幫助。他們說中國經歷戰爭太多了，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來，這個國家一直在流血、破壞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夠受了。

中國共產黨由經驗中獲得理論，從其早年的鬥爭時起，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程了。現在，為將來的中國，它需要美國的友誼，比需要其他單獨的有條件的強國的友誼更多。雖然，它需要這種友誼，卻不像一個乞丐求乞，而是如一個朋友在進行一個共同的事業中求援。無論有沒有這種友誼，他們的抗日戰爭必將繼續勝利而後已。……

——《新華日報》1945年5月14日

加強中美人民的合作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在反對法西斯黑暗勢力的共同鬥爭中，是更加增進了，鞏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已經在戰爭中用血來凝固了。

從前的飛虎隊，現在的第十四航空隊，他們在中國的上空作戰，助功卓著，已博得兩國人民同聲的讚美。他們的血流在中國的大地上，已與我國人民的血膠固在一起。在中印緬戰區，我國遠征軍，從美國那裡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國軍事專家的訓練，已經變成了一支新的勁旅。現在，中美軍隊在印緬邊境並肩作戰，在野人山的叢林裡，在胡康河邊，獲到了不斷的勝利，他們的血流在了一起。

中國人民特別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這幾年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從美國那裡不斷得到軍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貸款。美國還派了許多技術專家來幫助我們，也派了許多學者來華講學。最近中美又合組東南訓練團，由美國軍事專家來訓練我國軍官，幫助我們編練新軍。我們的苦難和不幸，在美國引起了共鳴。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作戰努力，在美國引起了興趣和討論。所有這些，無疑的，都是貫注美國人民的那種民主思想和進步行動的崇高的信念。

事實證明：中美兩國友誼合作的增進，是關係兩國人民的生存攸關的利益，是關係他們的力量增長、他們的生活的幸福與繁榮的獲得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有理由

要求美國援助我國一切抗日部隊；我們歡迎尼米茲將軍的戰略，也贊成史迪威將軍的聲明；我們重視美國朋友對我們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我們這樣做，是從加強中美兩國人民在各方面作戰努力上的配合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認為沒有援助，就不能作戰，就不能改進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就不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中國人民是擁有無限的潛在力量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能夠發掘出來的。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華北敵後軍民，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打擊敵人，收復廣大的地區，從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的建設，就是一個雄辯的明證。我們應該在自己戰場上主動出擊，來在戰略範疇內取得廣泛的合作，爭取更多的幫助。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同樣，我們批評孤立主義，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的疑懼，認為我們有排外的傾向，而只有被美國人民所歡迎。最好的朋友是諍友，絕不僅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也適用於國家民族之間。

中美是太平洋的兩個大國，兩國人民的親密合作，並肩作戰，對擊潰日寇，有極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團結得更堅固，合作得更緊密，抗戰得更積極！

——《新華日報》社論 1944年3月15日

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鐘穎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
光輝……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裡時常成
為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
解決。

——莫洛亞

三百年以前，當英國的歷史還充滿迷妄的各式宗教和
君主威權的時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帶憂鬱的心情，懷
自己的信念，渡過大西洋，流徙到這塊沒有開墾過的荒地
上來了，幸福的陽光和暖地照射他們，他們在這裡坦開胸
懷，盡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
向了大自然。忠貞的墾荒者啊，你們的數不盡的血汗辛勞，
已給自由民主的理想開闢了一條廣袤的道路來了。

他們為了完全擺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鐵枷，1776年的獨
立戰爭爆發了，獨立宣言淋漓地發揮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的
信念，「一切人類生而平等」的誓言，永遠地鑄刻在每一個
美國人的心上，他們堅決地認為創造者給了他們若干不可
轉讓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了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幸
福的追求。為了自己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犧牲無數人的
生命來進行獨立戰爭；為了別人也能獲得這些權利，他們

才從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當作牛馬的黑奴，這就是美國追求人類自由人類幸福的可佩的精神。

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全國人民又挺身進到戰爭中來了，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許多火線上，都已有了美國健兒的身影，當你向他們發問對於戰爭的感想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一句：「該死的戰爭！」但他們為甚麼又是那麼急切地爭降低年齡而參加戰爭呢？這正是美國人的自由理想和羅斯福總統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他們，正如杰弗遜總統所說的一樣：「一百年或數百年之間，喪失幾條生命，又有甚麼關係呢？自由的樹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戰爭的黑手已暫時地掩隱了紐約港口自由女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殘嗎？

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他們認為：「政府皆由人民組織而成，從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他們的公正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變成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棄它。」杰弗遜告訴美國人，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於制止政府的壓迫，林肯更告訴美國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沒有一個人善良得足以統治另一個人。」

因此，統治美國人的政府必須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政府或政黨要想存在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權益。

美國人民當然更有對於（政府）進行批評的權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關係及國家防禦等問題的發

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面或反面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面吧」（杰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為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對於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產生很遲，但當決定產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

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

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於行政措施，但政府對於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採取行動的時候是有決定的意義的。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外交問題，國務院也要聽取報紙評論及新聞、雜誌記事及無線電廣播等的個人意見或團體意見。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採納。

為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又恢復了招待新聞記者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復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用

是在為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

美國還是充沛青春力的國家，青年人正在毫無阻攔掘發對於民主的將來，實驗自己將來的民主生活。這些青年政治家們還在1934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蒙脫查馬學校舉行了一次「美國理想青年會議，」隨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年4月他們更聯合教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開過一次憲法會議，此後曾一年舉行兩次立法會議。

在大學校園裡的美國青年，他們對於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同樣的訓練。一個社會觀察家，某次隨意的選擇了幾個學生，問他們美國的民主主義已有了甚麼成就和具有怎樣的潛神力，一個學生回答這一個問題說：「美國的民主主義已在世界歷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無畏精神給予他的人民了。」另一個學生說：「學校的訓導使我們開了眼界，使我們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樣具有不可數計的價值，使我們對這種制度發生了最深的信念。並鼓勵了我們在探討怎樣才是保持和擴充這種制度的最好方法。」這些回答，不過是許多答案中的兩個例子罷了。

美國還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他們不怕困難，他們更不怕新的事物，須要和平的時候，他們會在和平中努力於開拓幸福的生活；須要戰爭的時候，他們也會談笑自若的從三十層的高樓，從千百的小城鎮上夾在丁香叢裡的大街，從草原上的褐色磚房中走出來，回頭向自己的家門說聲「再會」，走上千萬哩以外的砲火連天的戰場，獻身於保

衛民主的戰爭。他們相互間有最純潔的友愛，他們見面時互相親切的招呼「老兄」，他們的友愛不僅及於所有的美國人，而是如林肯所說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他自己死去，
他愛，他恨，他傳種接代，
無庸一個政府計劃的監察，
這就是一個美國人！

——（英）P. BENTMEY

「愛好自由，在今日的國內依舊洶湧而穩定」。

（羅斯福 1940 年 6 月演說）

——《新華日報》1943 年 9 月 12 日



第四輯

讓思想衝破牢籠

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李大釗

思想本身，沒有絲毫危險的性質。只有愚暗與虛偽，是頂危險的東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為。

近來——自古已然——有許多人聽見幾個未曾聽過、未能了解的名辭，便大驚小怪起來，說是危險思想。問他們這些思想有甚麼危險，為甚麼危險，他們認為危險思想的到底是些甚麼東西，他們都不能說出。像這樣的人，我們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險萬分。

我且舉一個近例，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不曉得他們也是和我們同在一個世界上『一樣生存』而且比我們進化的人類細胞，卻說他們是「鬼子」，是「夷狄」。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一場義和拳的大禍。由此看來，到底是知識思想危險呢？還是愚暗無知危險？

聽說日本有個議長，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行托爾斯泰的學說，彼邦有識的人驚為奇談。現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說我國人鼓吹愛國是無政府主義。他自己果然是

這樣愚暗無知，這更是可憐可笑的話。有人說他這話不過是利用我們政府的愚暗無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來開玩笑。唉呀！那更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原來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關係，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邊走路，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為都不含危險的性質。若是「盲人瞎馬，夜半深池」，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見危險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來的，都是黑暗造出來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實，甚麼東西甚麼境界都不危險。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愚暗是達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障礙，也就是人生發展的障礙。

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甚麼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而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說某種主義學說是異端邪說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義學說是甚麼東西，然後把這種主義學說的真相盡量傳波使人人都能認識他是異端學說，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於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認清，只是強行禁止，就犯了泯沒真實的罪惡。假使一種學說確與情理相合，我們硬要禁止他，不許公然傳步，那是絕對無效。因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滅，這種學說也終不滅。假使一種學說確與情理相背，我以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為大背情理的學說，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隱藏起來，很有容易被人誤信的危險。禁止人研

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益也終不減。世間本來沒有「天經地義」與「異端邪說」這種東西。就說是有，也要聽人去自由知識，自由信仰。就是錯知識了、錯信仰了所謂邪說異端，只要他的知識與信仰，是本於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實，一則得了自信，二則免了欺人，都是有益於人生的，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還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們，超越他們。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有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

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然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因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我奉勸禁扼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

——1919年6月1日《每週評論》第24號

駁「灌輸」理論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託在青年身上。這是不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游擊區裡，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捨身為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

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

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為求其穩固起見，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為求其普遍起見，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氛圍，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氛圍；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前一種主張認為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歷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

啟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覺的自願的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眾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系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定對於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經過說服、引導，只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於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征逐、聲色狗馬，佔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純潔身心。於是讀死

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結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脫了節。於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繫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產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兼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於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的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裡面，關起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喂養得出來的，而是在複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正像棟樑之材不是在暖室裡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社論
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

奴隸的語言

蘆蕪

在暴君的眼裡，奴隸們不過是「能夠說話的工具」。然而，說話畢竟是危險的事情，憑說話，奴隸們不僅會傾訴出對暴君的憤恨，而且會使同命運的奴隸們由散沙變成凝聚的力量。於是，依賴皮鞭和槍刺，暴君更使奴隸們變成了無聲的羊群。……

錘打堅強的石塊，一定會迸裂出火花；敲鑽結實的木頭，一定會騰冒起煙氣。除非是擊打散沙碎石，才會迎手碎落，無聲無臭。皮鞭、槍刺下雖然會產生一些歌頌「主上天威、天王聖明」的大小奴才們；但更重要的是奴隸們必定生長出憎惡和憤恨。皮鞭可以敲擊得奴隸們無聲，但它決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長。淫虐使得大多數奴隸們學會了「衷悲而疾視」。皮鞭、槍刺暫時鞏固了暴君的統治，但它又得到「教聰明了奴隸們」的結果。

雖然是「工具」，奴隸們畢竟還能夠言語；槍刺下固然不允許大聲疾呼，但奴隸們卻學會了囁嚅而道。雖然，聲音是那樣的低沉，那樣的微弱，但奴隸們畢竟不甘於忍受無聲的恥辱了。這聲音將會慰藉受難者的創傷，吐露出對喝血者的嫉惡，激勵起復仇的願望的。

正像岩石下的種籽，雖然被阻塞，被壓抑，但它終於彎彎曲曲，從石縫裡成長起來，從岩石的重壓、荊棘的軋斃中間，讓幼芽迎向陽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

但它會盤根錯節地生長得更結實，更茁壯，能夠忍耐嚴霜，承受風雨，儘管它沒有溫室裡的花草那樣艷麗引人、逗人憐愛，然而它是值得誇耀的，因為它曾經和岩石和荊棘戰鬥過來。岩石雖然帶要壓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潰和風化的將不是盤根錯節的樹枝，而是專橫頑固的岩石。

雖然是彎彎曲曲，樹木終於會從岩石的重壓下生長起來；雖然是微弱、低沉，奴隸們終於吐出了心中的憤恨；當奴隸們由囁嚅而出變成了大聲疾呼，由低徊的估傾到群眾的呼嘯，槍刺將阻止不住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們的命運也就是終結的時候了。

征高盧、滅龐培，愷撒該就算啞鳴叱吒的「英雄」吧！但獨夫之旁畢竟還有勃魯脫司那樣的人物；梟雄如愷撒，始終還繼續不了他的統治，在他的屍體旁邊，奴隸們早已就發出過鋼鐵的巨響了：

「我們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耽誤，趕快把這公佈到全羅馬的各處！」

——《新華日報》1944年2月1日



讀書與自由

幾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無須說明這是一個純潔的熱血青年，他對現在的某些不大開明的學校，很發了一陣感慨(我不敢名之為牢騷)，原因是他們的生活越過越難了。青年的路子越過越窄了，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這且不說，青年人吃點苦原算不得甚麼；但最苦惱的是：住在學校裡沒有讀書的自由，懷一腔熱血，滿心想愛國，希望替國家民族真正做點事情，然而卻又無行動的自由，到這裡青年們似乎實在失去了最後的忍耐力了。可是現在正是抗戰呀，不忍一口氣又能怎麼樣呢？於是乎苦悶，苦悶之餘，便覺感慨橫生了。

說到這裡，似乎應該發點議論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們，素以「讀書救國」論者自居的，竟不准學生有讀書的自由，某某報看不得呀，某某書包含「危險思想」呀，學生應該坐在教室裡老老實實呀，真是囉嗦得夠噲。試問學生在學校裡不能夠自由讀書，他還來進學校幹嗎？難道單是曉得了課本上的那點知識就夠了嗎？學生進學校不是為了來求知的麼？

不特此也。尤甚於此者的，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固然不能讀；即使連看文藝小說也覺有些「不穩」了。真是白晝見鬼，豈不令人笑掉牙齒！

讀書固可貴，自由尤為可貴。我們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學校裡有自由讀書的自由。難道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嗎

(所謂讀書，當然要把漢奸書報除外，凡系抗戰書報均有自由閱讀的權利)?噫歟!今之世，難矣哉!

——《新華日報》 1940年4月7日



論「天真無邪」

李普

有人這樣說：「據說倉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都戰慄了。」蒼頡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單說現在吧。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這倒是確確實實的；否則，不會有人這樣害怕。

但是，據說「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是最自由國家之一」。這句話卻很費解。幸而隨即就發現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給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據說，有一個軍營，「他們的言論是很自由的。」何以見得呢？「在牆報上，他們和軍官開玩笑，互相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好了，秘密就在這裡。

「天真無邪」是好字眼，年紀大的人常用這幾個字來稱讚無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於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就帶了開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輕人對於長者，下屬對於上司，那就更不能用了。有哪個奴才敢對他的主子說「你的言論是天真無邪的」嗎？沒有，沒有這樣大膽的奴才。由此可見，這四個字和「言論自由」或「批評政府」之類連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無邪」者於我無損也。惟其幼稚，所以於我無礙，那麼你說吧，我給你這個自由。

這位先生恐怕我們不相信，特地從那些牆報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資證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覺，其腳臭氣熏天。連床者問曰：為何老不洗腳？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現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腳？」

事實上上面並沒有這種命令，用這位先生的話來說，「這是對軍營命令服從之類的輕微嘲諷，並非真正三月一洗腳。」於是某先生贊曰：「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為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髮都不准碰；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鴨！

嗚呼，這真是「最自由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沙漠化的願望

田家英^①

法蘭西滅亡以後，我們曾讀到 I·愛倫堡的幾篇通訊。去年《文摘》譯載過《法國怎樣滅亡的》，其中有一段記述戰後法國文化統制的情形：國際作家協會會刊《和平與自由》被禁止了；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由於作品缺乏而停止審評；報章文藝副刊均明令取消；書店多停了業，剩下的只能出幾冊《歷史》之類的東西；「法國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這末後兩句，真說了歷來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幹」。聖君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看來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的了。最適於被牽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是必須使下民們存在在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幾年來努力實現的「沙漠化」的願望，也已經有了它的政績。今年一月八號的《新蜀報》，記載重慶書業的情形：

新書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原來的形像之外，其餘的都改變了面目，原是充滿了有關於抗戰的讀物的書架，而今卻都是《家》，《春》，《戀愛三部曲》，《胡適文存》等戰前的文學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數偵探小說、恐怖小說了，明顯地含抗戰意義的刊物或成本的書籍，則寥寥無幾，

至於舊書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書，出租的舊書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等舊小說（志淵：《文化的墮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見的了。荒涼，冷落，這說明大後方的文化界還剩了些甚麼。

不過，中國的官家比之法國，卻也有些不同，不那樣直率，講方式，多奇謀，所以同樣是沙漠化的願望，同一是焚圖書，禁刊物，封書店，逼作者，但我們這裡就還有許多排場，言行也極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過「建設文化」，宣佈要改善作家生活。雖然提高了稿費，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則根本沒有寫處；加給小學教員幾元津貼，偏要說得和人類文化前進如何有關。拆穿看來，這終於不免是一場笑話。

也還有移屍詐騙的方法。對於文化荒涼，我們還不時能夠聽到一點「憤憤不平」的聲音。譬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來，據說：「國家養『士』，而『士』何曾對得住國家？……戰前作家們叫過『國防文學』，民族戰爭，抗戰後那裡去了……唉，哀莫大於心死！」這真令人拍案叫絕的。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污，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嘆裡，註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

但奚落的對像，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蟲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鶴的君子，還做定可以飛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們就還有不少指定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這些人之成為名流，並非有文，大多是

因為開會。文協有他，文化界動員大會有他，一切文化活動莫不有他。人們也就不能不公認此文人也，實則多是掛了招牌，並無貨色，不過出賣人頭的探子而已。當然也有幾個能文的貴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時發一點匡時之論。這是一種偷進花園和小姐相會的，化為小生的丑腳，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裝接吻，看久了，不過使人連真接吻也厭惡罷了。此外，那些說今天是「戰國時代」，寫藝術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們，也都還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作品是談「夢的現象」，既不包藏政治陰謀，也無關於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其實是連毛孔裡都滿藏毒箭，正在向凌遲之際而尚未氣絕的人放射過去。

自然不易射死，於是還需要嘩啦一番。種種專事造謠的小報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蘇」；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魯迅陳年老帳；或罵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聞》的一篇《週末閑談》。作者說：「提起那些自命為『前進』的文人，就使我們咬定牙根。」從這些中間真使我們聽到了切齒的聲音。

然而，咬牙並非解決問題。「自命為『前進』的文人」還擁有大量讀者，壓迫到不能用筆，也還是留一張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務日報》上就發表過《籌設中國文化銀行計劃書》，說是要「放款」了，只要來是不愁豐衣足食的，但以後就不再聽到了下落。這是很自然的，箠食壺漿弗得即死，而「嗟來」與之猶且不受，何況恩威並

濟，盛氣凌人，去領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勞而獲的寒士。證據是：去年「文化獎助金」據稱已經發了，但我們至今沒有讀到受獎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獵犬的狺狺，並不為看客歡迎。書刊已經不少，指定派訂也已經用盡方法。有教授作文，黨部推銷，照理可以風行天下了吧，但事實並不如此。人語是被抑殺了，而魑魍的嗥嘯也不見得就能夠傳播開去。

一方面沒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壇的雕萎這就成了必然。有骨氣的出版家多停了業，存在的則無書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戰前的作品。官辦的書店掛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義文學體系」，但就連這一類作品也沒有寫出來。這使得一種以介紹新書為主的《讀書通訊》，到今年就不能不變為談英語、論詩詞的刊物。因為文壇乾淨到幾乎一本新書都沒有了，無從評起。

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卻絕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甚麼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曾經被「戰國」派教授們讚賞過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詩」，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可以焚燬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國就還有用結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戰的作品在，這些作品為大量青年所愛戴，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從吞吐含蓄中間傳達中國人民正如何受難、如何掙扎又如

何成長——這就是反沙漠化的願望。

儘管迫害，儘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去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時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員。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只有民主才能保障創作自由

(中大通訊)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國文學系請楊晦教授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民主》。來聽講的同學相當多。楊先生先解釋了這個題目的意義和講的動機後接說：「文藝本來便是民主的。在人類的童年原始時代，沒有個別的藝術家，大家都可以參加藝術活動，人人都有表現藝術才能的機會，這段時間的藝術作品極豐富，和近代的藝術水準比起來，毫無遜色，這為甚麼？因為這時的藝術是完全在民主的條件下產生的」。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縱然有，也是病態的東西。「一般認為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文藝活動特別高漲；但其實，以中國面積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這點文學成果和俄國法國短期間比較起來，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時唐朝是個開明的時代，情形就會更好些了。」文藝不只是民主的產物，並且應該民主。這裡楊先生從表現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說明：「文藝注重形像、注重表現的本領，然而，不民主的社會環境偏偏處處破壞人的表現才幹，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藝應該爭取民主，爭取人人有創作的權利」。楊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藝像一面鏡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藝也是爭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最近報紙上載救濟院內虐殺幼童的事實，

這是想像不到的殘酷；如果這些黑暗的現象，用文藝寫出來，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聞消息要深刻得多！

俄國文學能夠這樣普及的原因就由於它不是茶餘飯後的閑談，緊緊地接連生活中的悲慘事件，所以文藝應該爭取美好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要爭取民主」。最後楊先生更特別強調人人都必須知道和了解民主的關係，他引述了希臘盜火者普羅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聲調說：「普羅米修士的意義就是『預先知道』，這位英雄預先知道了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敢於做盜火的舉動。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毀滅人類，其次他知道人類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曉得了偷了火之後一定要遭受殘酷的懲罰。然而單是這三點還不夠，他敢於這樣做，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楊晦教授的講演，就在這裡結束。同學們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覺興奮。星光從天空灑下來，沙坪壩的沉悶環境是不會再長久地維持下去了。

——《新華日報》1944年6月12日



言論自由與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注)的報紙，因為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版發行被干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遊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懇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用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用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

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

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人類的命運支配於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像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

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相，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裡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甚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於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

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於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三十四四年二月二日同報)。

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

「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

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儘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
（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不許人民說話和欺騙人民的歪風

陸定一

一位新民報記者問我：「有人以為，中國記者不如英美記者，你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我不以為然。中國記者是並不遜於別國記者的。英美記者固然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記者，能在重重壓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實消息透露給人民，這種經驗，這種本領，則遠非英美記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樹，生在平坦的地上，長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頭縫裡彎彎曲曲生長起來，雖然樣子矮小，卻確是不容易。」我這裡所說的中國記者，是指大後方的大多數記者而言的。

世界上為甚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砲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甚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戰爭中，人民是誰？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以及一切愛國分子。他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主人。專制主義者，則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使人民求生無路。

《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

八年過去了。今後怎樣辦？

這樣辦：（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力求真實，絲毫不苟。

我希望《新華日報》這樣做，希望大後方一切為民主而奮鬥的記者這樣做，並且希望給《新華日報》以經常的指教批評，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聞界裡創造出一種新的作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力求真實的作風。以此作風，來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創刊
八週年紀念文章

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對於戴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志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為這種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姦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責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

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歐美報章報導抨擊中國檢查制度的文章，不絕於書，而我們卻受之坦然，怡然自稱我們是爭自由的「民主」強國！

戰爭結束了，英美可不必說，連法西斯的阿根廷、戰敗了的日本都已經取消檢查制度了，大家說阿根廷和日本在偽裝民主，而我們呢，好像連這一點偽裝的勇氣也沒有，「即將」取消、「決定」取消，話也聽得很久了，實施何日？好像這個「國情不同」的地方，對於這把扣緊人民咽喉的枷鎖還不勝其眷戀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甚麼日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已經在播音機前面死掉了？

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新華日報》時評 1945 年 9 月 1 日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護)，一面無時或忘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致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的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了解，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丘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併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

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在羅斯福親自出席參加之下，曾通過議案，已預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起草提議，以便日後或由美國政府主持與其他列強談商，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國際間的言論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又通過決議，認為全世界新聞和通訊自由對避免未來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請由國際協議形式，保障此項自由。《聖彼得斯堡時報》的編輯鮑恩特，且提議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宣佈美國的國策，「拒絕承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任何政府和個人。」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

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9月1日社論 原題《祝記者節》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首先就應舉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於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也不只是垂諸竹帛，留諸後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並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個光榮的稱號，就得像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或在前面誘惑，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

檢討一下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松過乃至放棄過？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於抗戰事業既忠既勇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後方，都曾為之報導消息、發揚光輝；對於抗戰不利的事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於真理、忠於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得糾正空氣」一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此種於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正的觀念，即對於宣傳一詞的了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眾宣傳，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聽到像「這是宣傳，儘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誌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記事

不實來了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個絕大危機。

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誇不實。要知道，「墨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於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你的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污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只表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們願意在今天紀念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
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



反對反動的新聞政策

——為紀念第十屆記者節而作

今天是第十屆記者節。回溯這個節日誕生的歷史，這個節日適合全國人民輿論界爭取抗日自由、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分離不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繼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激起了洶湧澎湃的全國救亡怒潮；當時各地新聞記者亦都爭先恐後，捲入這一怒潮，並紛紛向國民黨當局要求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壓制輿論、保障記者抗日權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國民黨當局乃發佈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此表示（雖然在這一命令發佈後，國民黨當局仍繼續壓迫和摧殘抗日的記者和輿論機關，如史量才的被暗殺、杜重遠的被判處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個抗日刊物的橫遭封閉等），這乃是全國抗日人民和輿論界艱苦鬥爭的初步結果。嗣後「九一」這個日子，便由全國新聞界定為記者節。每年此日，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的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因此「九一」不僅是記者的節日，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節日。

在抗戰初期，政治比較進步，國民黨當局對於輿論界

的壓制曾一時減輕；各地新聞事業，特別是在武漢，曾呈現了一番蓬勃的氣像，對於發揚民意、動員民眾，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幾何時，在武漢失守以後，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隨之而來。幾年來國民黨內反動派鉗制輿論、摧殘民意的行為，日甚一日。到了現在，大後方輿論界已經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氣消沉、邪氣高漲的可痛現象。在今年紀念九一節的時候，我國的新聞事業正經歷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制政策，口口聲聲強調「戰士統制」之必要，又把這種統制描寫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在「戰時」，是在抗戰的進程中，而抗戰正是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照國民黨的說法，它的新聞統制，似乎應當符合於抗戰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然而事實上怎樣呢？

孫龐等逆率部投敵，吳逆開先奉日寇之命回渝進行誘降活動，逆跡昭彰，鐵證如山，國民黨宣傳機關卻不特隱匿其賣國罪行，反而曲加辯護，稱之為「剛強堅貞」、「矢忠矢勇」。第五縱隊托匪張滌非等九個人開會十分鐘，假借名義，狂吠反共，挑撥內戰，破壞抗戰，為全國正義人士所不齒，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竟將張逆通電廣為傳播，勒令各報照樣登載。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後，抗擊在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偽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的戰報是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領樂聞的，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顯而易見的，這樣的新

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種新聞統制的方針，倒很像是為了準備投降日寇哩！

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據民國廿六年政府統計，當時全國報館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大後方報紙獲得核准者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尤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務混入新聞界胡作妄為，另一方面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起使他們俯首帖耳，供其驅使。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後方的新聞事業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這種現象，又正是實行獨裁、摧殘民主的標誌。這樣的新聞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倒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

就民生問題而言，讓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河南災荒，來再次說明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是怎樣執行的。河南災況的嚴重為近百年來所未有；凡有人心，聞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當局正應督促各報據實披露，向海內外大聲呼籲，庶幾可以籌集巨款，救濟三千萬災黎的生命，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氣。奈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粉飾太平和掩蓋其救災不力的責任，竟令國民黨報紙拒絕登載遇災的消息，同時卻大吹大擂，發表宋美齡宋子文等在美國和英倫不負責任的言論，說「中國沒有災荒」，一直欲蓋彌彰，騰笑中外。而國內報紙竟有因發表為豫省難胞呼籲的文字而遭處罰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報發表這樣的社論而被處罰停刊三天）。這樣的蔑視難胞痛苦，大喪民族元氣的行為，誠不知國民黨反動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積居奇的頭子不准揭發，貪贓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還有抗戰力量，所以亟亟於惡化民生、摧殘民力呢！

綜上以後，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之點，這種反動的新聞統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行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制輿論，壟斷輿論，是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希魔這種

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的藍本。

和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完全相反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正確新聞政策。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漢奸和法西斯第五縱隊則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遭受嚴厲的鎮壓。各種報章雜誌及其他宣傳品，只登載有利於抗戰、有利於民主、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論，而破壞抗戰、破壞民主、擁護法西斯的文字則絕對不准發表。報紙和人民大眾維持密切的聯繫；除了職業的新聞記者深入民間採訪以外，還有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紙投稿；記者們在前線一面工作，一面戰鬥（如何雲同志即為其中英勇犧牲者之一），在後方則於業務之暇，積極參加生產。這樣的新聞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聞政策。在大後方，亦應當實行這樣的新聞政策，但是這有甚麼希望呢？

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其手段之毒，為害之烈，有過於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袁張等屠殺少數異己記者，已經鬧得全國騷動，而國民黨反動派則更進一步，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此種政策，若讓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則不特全國新聞事業有毀滅之危險，而且民族正氣將被損傷無餘，抗戰大業亦將遭受不堪設想的損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大後方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提出紛紛抗議！在今年紀念九一記者節的時候，全國熱心抗

日、愛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

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臨了！墨索里尼已經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讓我們加倍努力，為抗戰和民主而奮鬥吧！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解放日報》社論 1943 年 9 月 1 日



要為真理而鬥爭

小亞

人民喉舌須尊重
我輩頭顱要看清

——王鰲溪遺詩

今天是記者節。

讓我首先為言論自由而犧牲在屠刀下的前輩同業致哀！

據我個人所知的，有：

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斃的邵飄萍。

一二八後在南京雨花台黑夜槍斃的王鰲溪。

就在那前後，在鎮江被顧祝同槍斃的王××（姓名一時想不起）。

抗戰後在成都被槍斃的朱亞帆。

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獄中的羊棗，在南通被特務挖眼割鼻、沉屍江底的孫平天。

但，這只限於在報紙上公開過的，其餘暗中被害者，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

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為記者職業而犧牲則一。個人敬致衷心的哀悼和紀念！

記者被稱為「自由職業」，甚至有人尊為「無冕之王」，

而有些從事新聞工作者，也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認為自己「超然」。其實這完全是與事實不符的。

在現社會中，從事新聞工作，首先你就得確定自己真正為人民服務、抑是為統治者服務。所謂「喉舌」，本質上就有兩種：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統治者的喉舌。

作人民的喉舌，當然你就沒有自由可言，隨時可以被打、入集中營、上斷頭台，或者「失蹤」！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換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準備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換。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僕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你儘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論說得好：「關於一連串的打、殺，誰的心裡也明白，就是辯護者的心裡也明白，不過奉命不得不辯護」。……

選擇是項「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選擇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於人民喉舌的記者們，要自由，還須得付出很多的代價去爭取。因為四項諾言，已經被狼吃掉了！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原題《記者節》

民主主義的劍

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發表了一篇《歐洲的地下報紙》，在上面冠了一行標題道：「在那裡(歐洲)，筆就是民主主義的劍」。

自然，這是說現在歐洲淪陷區的地下報紙正在百折不撓地為自由與民主而戰鬥，一支筆的威力等於一把劍，甚至等於無數的劍。然而廣泛地說起來，使用於報紙的筆等於民主的劍，這個比喻又何止是適用於歐洲的淪陷區？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的報紙，用在這些報紙上的筆，何嘗不應當是「民主主義的劍」呢？

而且報紙的筆不僅應當是「民主的劍」，也應當是民主的測量器、試金石。在這個劍鋒上，民主與非民主、正義與非正義應當是黑白分明、不能夠絲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陽光下，這支劍光芒四射、森然凜然；在非民主的氛圍中，這支劍光彩盡斂毫無生色。民主與否，就以這劍光的顯與隱為斷。

我們報人掌握這樣一把光華萬丈的「民主之劍」，這是一種光榮。怎樣來發揚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陽光下能夠及鋒而試，這又是一種責任。我們請以此自勉，亦以此與同業自勉。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2日短評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自由的保障書

何思敬

有兩種出版法：一、保障以及發揚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殘以及毀滅文明之出版法。我們中國需要哪一種？我們中國要不要走上文明國之大道，與其他文明國一起，在世界舞台上並駕齊驅？

文明國之道路就在於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針，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眾多而自豪。英國如此，美國如此，法國如此，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檢查制度或禁止採用檢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成為文明的母胎。

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

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甚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近代文明的創造需要每一個民族都能貢獻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國人民的個性才智得到啟蒙與解放，得到自由發展，使各國人民都睜開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與內心，注意自然與精神，注意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這樣一條道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我們能希望一個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發展嗎？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專論 《出版法之修正》



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政府為了統治思想，報紙已經成了清一色，對於出版業也要來這一套。貼補政策下的黨營書業，政府予以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免除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價的原料，可以飛機「復員」，可以到收復區「接收」房產、印刷廠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書，當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頌德；虧完了本，當然可以報銷。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異己；正當的出版業，還有甚麼活路？可惜不爭氣的強項作家，雖然用盡威脅利誘的方法，不肯與他們合伙；明眼的讀者，不要看他們的書，於是乎放寬尺度，凡屬低級趣味的荒誕無稽的，甚而至於淫穢無恥的書，隨便可以流行市上；無聊的文人和書賈，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只好走這條路了。一方面把學生的功課加緊、管束嚴密，沒有工夫看別的書。教科書要部編的，當然不會含有「不正」的思想。窮人根本不必想讀書、識字，大學生用公費來籠絡，還得加進特務來監視。思想不穩的教師隨時可以失蹤。青年人還讀甚麼書？夠了，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當的出版業和讀書人，都被一網打盡在黑暗的地獄中，沒有人敢喊一聲冤。趁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時候，我們要戳穿這一套戲法。自然，每個人每個事業都有他的黑暗面，而為他人所不知的。我們希望盡量的發表出來，讓有心人來救救我們。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日

出版自由：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凡是常到各書店的門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報紙上的書業廣告的人，都能發現，目前出版業中表現極不正常的現象。無數的讀者正渴望讀到能夠幫助人認識現實解決問題的出版物，可是新書新雜誌都顯著地減少。許多曾經每日出版若干本書的書店，現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幾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書了。在這出版業衰頹的情形下，大量地繼續不斷地印出來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報」式的書刊。前者以迎合低級趣味和痲痺讀者為目的而到處氾濫；後者的出版對他們自己是「報銷」，對讀者是蒙蔽欺騙，雖然並沒有人歡迎，也源源不斷地向市場傾銷。於是出現了很多賣弄風情、搔首弄姿的所謂「作品」，甚至《玉梨魂》《情書一束》也翻印重版；於是甚至有些官方的雜誌書籍大量印出來後，卻堆在棧房裡，任其霉爛。這些書本來只是糟蹋紙張油墨，並無甚麼人閱讀。——透過這種種反常的現象，我們可以聽到讀者的嘆氣、民營出版的訴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讀者在艱難生活中本已對書價搖頭，但縱然出高價，也有無書可購之苦。正當的民營出版業已奄奄一息，陷於絕境。許多作家能夠也願意供給為多數讀者所歡迎的新作，然而終於只能擱筆或寫些不關痛癢的東西。

看了這種種現象，怎能不使人憂怨、使人憤慨？一個國家的出版業情況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情況、民主程度的最正確的測驗器。目前出版業中的反常現象實在是嚴重的危

機。中國人民在精神食糧上也如在物質食糧上同樣有匱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接受腐爛不堪的精神食糧，或甚至以砒霜來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勝利，要使中國不再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這種現象絕不能繼續存在。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人民一定能夠自由地得到合於他們需要的讀物，也就是一定有一個自由的繁榮發展的出版業。或者說，以繁榮的出版業來供養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糧是自由的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幟。——由這裡我們就可以解釋目前民營出版業困窘、出版物在質與量上都顯著衰頹的現象產生的原因。

抗戰打開了人民的頭腦。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各種書籍。抗戰開始的一年內出版業繁榮的現象即由此而來。假如出版家能夠不受任何障礙，繼續自由地供應合於需要的書籍，廣大讀者自然會全力支持他們。縱然物價高漲、百業艱難，但只要出版物銷數多，定價仍可不至狂漲過甚，自由的出版業也決不至於不能維持。

同時，在自由的市場上，不合現實需要、不受讀者歡迎的出版物自然會淘汰，出版物在質上也就一定能不斷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或仍有一部分人傾向於低級趣味、喜歡無聊色情作品，這其實是在過去任何時期都有的，不過當正當的出版業繁榮之時，投機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數，它們的讀者也有可能被引導向正當讀物。只是因為現實的苦惱既助長了人們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當的出版業又萎縮不堪，才使色情書籍能夠氾濫一時，幾乎成為出版業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為此扼腕嘆息，但未始沒有人在暗中竊

笑，以為得計。正本清源，要克服這種危機，也非使正當出版業自由發展、正當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還必須在紙張、印刷、交通運輸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後方紙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如何發展紙業生產，而不是統制紙張。在紙的統制下，平價紙的不均等的供應更加速了民營出版業的末運。再加上多數印刷所被控制、郵寄運輸上的重重限制，書刊未出之前先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既出後仍有被停止發賣的危險，把民營出版業逼得一籌莫展。這許多實際情況不改變，出版業衰頹的現象是絕對無法挽回的。

最近有三十家出版業聯名發表緊急呼籲，他們沉痛地說，他們將「被迫從出版崗位上總撤退」，要求當局給以紙張、印刷、郵寄、資金週轉上的便利。我們以為他們的要求是極端正當的。這些出版業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崗位至今，是值得讚揚的。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堅持，全國作家和廣大讀者，一定都會支持他們的主張，來要求解除對於出版業的一切束縛，要求給出版業以自由和繁榮發展的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原題《出版業的危機》

論學術自由

莊沙音

學術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受非法干涉。反對學術自由的人，常把學術自由看做是「隨便」說話，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獸。這還了得？然而這是最流行的看法，不值一駁。學術自由是有益國家民族的，特別是對於現在的中國。歐美民主國家的學者也一向是維護學術自由的，他們的這種鬥爭是和反法西斯的戰爭相互聯繫的。

只有在法西斯的國家才會把學術自由當做是洪水猛獸！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權以後，首先便焚燬了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僅在柏林一地，就消滅了一萬擔科學書籍和古典文藝書籍。一切知名的學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殺。過去的德國在科學上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現在卻只剩下了一輩假借「遺傳學」、「優生學」、「人種改良學」的偽科學家。從此，德國便陷入反科學的黑暗時代。

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文化的意義上，就是要維護學術自由，反對摧殘人類的精神遺產——文化。中國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中國需要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極豐富的內容，如選舉，如黜官，如結社，如演講。而學術自由就是民主精神與民主習慣中的最要緊的東西。我已經讀過張申府先生的

《友聲與民主》，他說：「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兩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習慣或民主精神。一狹一廣。二者當然相關，是互相制約、互為因果的。沒有民主政治，民主習慣大概不能普遍；沒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實現。因此才所以特別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團體儘可能的培養些民主精神，養成些民主習慣，以開創風氣，以為天下先，以為後世訓」（《新華日報》1942年9月27日）。這話我完全同意。我還要說：在大學裡提倡學術自由，就是為了培養民主精神或民主習慣，而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

干涉學術自由是不當的。自古以來，凡能提倡自由的時代，其學術必能昌盛。周秦時代學術最發達；到宋朝，私人講學之風甚盛，天下學子，聞風景從。到了清初，幹嘉諸老不聞政治，於是脫離現實，專門從事古代經典之訓釋與考證；自由講學風氣，不復得見。

民初的北京大學，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時提倡學術自由，蔚為風氣，影響全國，收效後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裡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而近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發育在此了」。有這種精神，文化才能發展、國家才能進步。

我們再說說外國的情形。譬如英國的牛津大學，一向以古老著稱，學生教授還穿著中世紀僧侶式的黑袍，並且還保持了許多過時的習俗與環境。然而牛津當局對於學生

的求學，卻是採取極端放任主義的。幾年前曾來中國的世界學聯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畢業生。他曾對我說：「牛津的風氣已經變了，甚麼思想都有，甚麼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競爭，但絕不超越一定的範圍。」這是很好的。牛津絕沒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學生當做政爭的工具，教授更不問學生的黨派。提倡教育獨立，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

歐美民主國家尚且如此，我們中國是要超越歐美的民主政治的。國父考察了歐美民主政治以後，認為還有很多缺點，所以才創造了國父的民權主義。那麼，在中國，要有更大限度的學術自由，是絕對應該的。

.....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1日



獎勵自由研究

人類歷史上的前進運動，常常和思想自由的開展是分不開的。因為如果思想運動不能自由開展，如果讓陳腐的、不合理的獨斷教義支配人們的意識，如果不容許人們擺脫既成的死的教條的束縛，而依據社會發展之新的要求，來從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於在現實前面把人們的眼睛矇上一層黑幕，使他們不可能看清當前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不可能辨別甚麼是應該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甚麼是應該打倒的黑暗勢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對黑暗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不可能正確地推動革命運動。不論中外古今，每當革命轉變的偉大時代，常常隨伴一個文化上的啟蒙運動，開展自由研究的風氣，打倒不合時代的因襲權威，剝斥現實中的黑暗事物，啟發新的時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識……。

在今天的抗日戰爭過程裡，我們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革命運動。在這偉大的鬥爭洪流中，我們需要對於客觀現實的各方面的正確知識，作為前進的引路明燈。我們需要關於自己本國的社會歷史的知識，也需要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世界各國的社會歷史知識。在我們決定鬥爭的戰略策略的時候，這一切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對我們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們也需要關於自然界的各種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在我們進行經濟建設以克服長期戰爭中的物質困難時，也是不可少的。我們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學術上理論

上的知識，以便從各方面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但要能掌握這些知識，就必須一方面積極地號召各種專家及知識分子，幫助和鼓勵他們從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提倡勇於追求真理而不顧忌一切因襲教條的作風，就必須提倡自由獨立的研究作風。

抗戰初期，全國的文化界曾表現出一時的蓬勃高漲的氣象。隨政治的進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論的自由，得到了開展的機會。然而不久以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策動了投降反共的陰謀，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動也就隨伴投降分裂危機的發展，在大後方許多地區抬起頭來。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論遭受禁止，而讀經誦古的運動卻強迫推行……。

但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在的各抗日根據地區，卻一直沿抗戰、團結、進步的路線向前邁進。在政治經濟方面，固然有了飛躍的發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時在不斷進步。當大後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於工作，甚至於不能工作的今天，在邊區，特別是延安，卻聚集了很多的全國有名的藝術家、理論家、科學家，以及大批的知識分子；學術研究的空氣，一天比一天高漲。

中共邊區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綱領裡，特別明白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一項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只

要他們能認真地進行自己的研究，本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能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這些貢獻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

必須把自由研究的風氣大大的開展起來，不但在陝甘寧邊區要這樣，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據地也要這樣，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必須號召全國人士，特別是文化界以及知識分子，起來反對大後方束縛言論思想自由的倒退現象。這是與反對妥協投降危機分不開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報》社論 1941 年 6 月 7 日



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潘梓年^①

關於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近來各方人士頗多論列。一般的講，大家是認為學術思想應當自由，大都認為這種自由是民主國家重要表徵之一。間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論調的，但已甚少從正面來加以反對，他們只能從側面來反對，說這種自由不能是絕對的，總或多或少地應當加以某些限制。這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沒有人能夠過份違逆它。

我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須弄清楚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要從政治上來提出，來討論；要把它當做具體問題來處理，不能把它當做抽象的東西看。

就是說，主張學術思想應有自由，是說學術思想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不是說學術思想應像野馬行雲那樣，漫無規律地亂闖亂撞。例如有些反對思想自由的人說，若思想絕無規矩准繩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殺，說，某一種限制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發展。他問：思想若不受邏輯的限制，則不合邏輯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則不道德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國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等等。這種反對論就是有意把問題弄混亂了，好來混水摸魚，就是先把別人所提的具體問題拖到玄虛之中去，再對它鞭打一陣的辦法。目前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誰也不會認為不合邏輯的

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們只是認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邏輯，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學術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應讓學術思想自己來解決，不應由外力來干涉，由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就拿邏輯來講吧，沒有了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這種思想來，也不能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棄，更不要說這種思想能否算是一種學術了。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憤怒，一經發現，大家就要起來加以猛烈的攻擊。試問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衛之流妥協投降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思想推薦到大後方來嗎？

果然有人這樣來推薦的話，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的嗎？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更是如此。在抗戰建國時期，妥協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發點國難財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這些思想，儘管會在有些人的腦子內縈迴奔騰，卻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提到論壇上來；儘管會有些人不聲不響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樣做，卻沒有人敢於公然提出那樣的主張來。為甚麼？就是因為思想界斷然不會容許這種思想出頭露面的緣故。所以我們說，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主張思想自由的人，是認為思想的是非曲直，應讓它在自由發展中自己來解決，不要用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來主張思想自由，把思想當做漫無規律的東西。這一點，是談思想自由問題時，首先就要

弄清楚的。

進一步來討論，所以要主張思想自由，正是為的要來加強思想自身的規律，要讓這個規律在思想的自由開展、自由發展之中壯健起來，堅強起來。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

譬如，上述那種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於公然提到論壇上來的固然不會有，但很可能穿著偽裝來出現，或彎彎曲曲來偷運，或強詞奪理地來武斷，或甚至憑借某種優越的勢位來欺凌。遇有這樣的情形時，在思想自由的社會裡就自然會有人出來加以剖析，揭露，勾微，發隱，使它鬚眉畢現，無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強難逞。否則趙高指鹿為馬，也無人敢加指斥，那就連是非曲直也不會有，還講甚麼道德，講甚麼國家民族的利益呢？至於邏輯，更要明顯，真理因愈辯而愈明，邏輯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規律是蘊藏於思想自身，正如身體的康強蘊藏於身體自身一樣。要求得身體的康強，必須首先解除有礙於身體的自由生長的一切束縛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規律的壯健與堅強，必須首先解脫障礙思想自由發展的一切束縛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

從這一點上來看，目前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可以說就是要來把人類的思想自由從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來，民主國家所以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它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兇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層，蒙

巴頓將軍就曾指點得異常明確，他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台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又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這樣說話的確是非常明智的，卻也是非常平凡的。我們所以對法西斯誓不兩立，所以對於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生死以之，對這戰爭看做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是因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佔我領土，掠奪我財產，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靈，而且也是因為它還要剝奪我自由，窒息我思想，破滅我文化，毀壞我文明。那麼，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沒有的事嗎？

也有人這樣說，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戰時又當別論，因為戰爭須要力量集中，從而須要意志集中，從而須要思想集中，從而思想就不能講自由。這種說法，真所謂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這一問題上，美副總統華萊士曾提供我們一個很賢明的意見。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週年時向中國廣播，其中有一段說：

「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殷鑑，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我共同福利的良

法，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華萊士這話還說得不明白嗎？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不但沒有戰後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連目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也沒有勝利可言。

華萊士這一段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要以為不過是那麼說說而已，事實上並不見得是如此，那麼就請看看事實吧。試問我們到底憑甚麼來和法西斯強盜作戰呢？我們憑甚麼能夠確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軍事工業發達嗎？是的，這一些自然在必要條件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這些條件遠比敵人差，為甚麼我們竟敢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且堅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呢？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這些條件上仍然還是劣勢，為甚麼我們的勝利信心仍然還是屹立不搖？蘇聯在這些條件上，至少在對德抗戰之初並不見得比德國為優，為甚麼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蘇聯必勝，而且現在蘇聯確已大捷頻傳，快把敵人完全逐出國境了呢？沒有別的，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民主，蘇聯的人民向來保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民主國家所以要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統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國家的戰鬥力是要從人民身上獲得的。只有廣大的人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時，國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則就算你僥倖取得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高度現代化的軍事工業，也終於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則是蘇聯。後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國。蘇聯就因為他每一個公民都

已有了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權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能夠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餘年之中，把貧窮愚昧的帝俄一變而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蘇聯，所以能在抗德戰爭之中生產突飛猛揚，戰術精進，兵源泉涌，戰士的英勇和犧牲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誠，使全世界都為之驚嘆不置。因此，我們可以明了，華萊士那種說法，確乎完全是從事實中探究出來的真理，絲毫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華萊士所指出的這個真理，對於我們中國，特別值得珍視。我們所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正多，需要人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評的思想正殷，需要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能戰勝法西斯日寇，為了要能和同盟諸民主國家並駕齊驅，也同樣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在武裝、戰術、軍事工業等等條件上，使我們的對敵劣勢有所改進，更是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學術思想的自由，決不是和作戰不兼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於作戰能力的提高的。

還有一層，學術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學來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哲學等一切學術思想來說的。目前一般人士，對自然科學可說已開始重視。不過實際上的重視的還是偏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對於自然科學理論，科學思想，科學態度等等，還未免重視得

很不夠，還是讓少數自然科學家在四向呼籲。至於社會科學，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這實在是莫大的缺陷。這兩種科學實是同樣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說對目前中國不能不有個輕重緩急的話，那麼，社會科學暫時有比自然科學更值得被人重視的理由。因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必須首先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能夠找到解決的途徑——正確的解決途徑，作為基礎才行。

同樣的自然科學，在有些先進國家就發展得遲慢以至於停滯，在蘇聯等民主國家就發展得非常之快；同樣的自然科學，在蘇聯等民主國家發展起來就真正成為國利民福，在法西斯國家發展起來就適足以禍國殃民；這裡的差別，正就在於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都能正確地解決了，另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則還沒有能夠解決，或沒有能夠正確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需乎社會科學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科學，對於目前的中國是迫切需要的。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社會科學也比對自然科學更為重要。

在目前，尤其在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爭論，要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繁複得多。爭論愈多，愈複雜，它所需要的自由發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為是非是愈爭愈分明，真理是愈辯愈深透，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

學術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講，是指一切學術來說的，特殊一點來講，尤其要指社會科學來說。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3月26日

① 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就是從思想上徹底打垮和消滅法西斯主義。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戰勝、侵略我國的日本法西斯強盜，使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貫徹到底，取得最後勝利。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分清敵我，不容絲毫含糊，不容在我們的抗戰陣營之內還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不但這樣，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為了將來的建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國。或類似法西斯的中國。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反對一種誤國害民的思想毒素，這種毒素就是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要與這種誤國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絲毫含糊。只有在思想界肅清了這種毒素，才能達到「抗戰必勝，抗戰必成」的目的。因此，這個任務，是中國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務。

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同盟各國現在正與法西斯進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戰鬥，中國是進行這個戰鬥的最早一國。六年來的鬥爭，證明法西斯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徹底消滅這個敵人的。

為了徹底消滅這個敵人，不但需要武裝鬥爭，而且需要思想的鬥爭，這就是對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鬥爭。

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核心，就是假裝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都向他們國內的人民宣傳他們的所謂民族主義，但是這與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是毫無相同之點的。

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愛他們的民族。

希特勒毀滅了德國，墨索里尼毀滅了意大利，日本軍閥毀滅了日本——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使大多數的德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陷於貧窮、破產、飢餓，剝奪他們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後又把他們拋入反動的戰爭的深淵——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在他們的人民中間宣傳復古、倒退、迷信、盲從、墮落、野蠻、無理性、神秘主義，破壞了德國、意大利、日本原有的進步和文明——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法西斯的所謂民主主義，就是摧殘民族、掠奪民族、強姦民族的主義。

法西斯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一伙強盜，他們強姦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頭，並且繼續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這伙強盜說，他們是最愛這個民族，他們是為這個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如果這個被蹂躪的民族起來要求自己的生路，他們就說她是「叛逆」，說她是「分裂」了國家的「統一」。

法西斯主義者所代表的，乃是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他們公開壟斷了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這種壟斷比十八九

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壞百倍。但是他們卻假仁假義地攻擊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不要臉地宣佈他們所代表的乃是「全體」，他們的經濟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

一百個人裡面，九十九個人的利益不代表全體的利益，一個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體的利益，這就是法西斯的數學。一百個人裡面，九十九個人向一個人要求生存的權利，叫做「煽動階級鬥爭」，一個人剝削迫害九十九個人，反而叫做「階級合作」，這就是法西斯的邏輯。

法西斯最後只有不要邏輯，用極端的唯心論和唯心史觀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直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他引到個人的提高，是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對旁的民族的蹂躪就更不用說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宣揚的「王道」，我們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忘記。

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已經來了。我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現在所進行的戰爭，就是滅絕法西斯的戰爭。我們叫做民主陣線，因為我們不但現在反對法西斯，將來更反對法西斯，我們流了這麼多的血，就是為要實現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將來的中國和將來的世界，一定不允許有無論甚麼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絲毫存在。

這個思想，在大西洋憲章裡已經有了確定的表現。大西洋憲章第六條規定「待納粹的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

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享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以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又都再三發揮了這個論點。

我們中國不但在擁護大西洋憲章的華盛頓公約上簽了字，並且還有孫中山先生全部反對法西斯的遺教。

法西斯主義是否認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公開發傳非亞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並且公開侮辱了中國：「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和中國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個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做德國人。這就是我們的種族開始不純正。」但是孫中山先生卻再三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破民族間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國「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

做到「中國境內民族一律平等」。

法西斯主義是冒民族之名來壓迫剝削本國人民的。墨索里尼說：「法西斯革命（？）創造力的根源就是組合的國家，即經濟力量完全劃一於調和（？）的國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其中是根絕了的。」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卻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孫中山先生批評辛亥革命的根本失敗，「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

法西斯主義既然要「根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也就是要「根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西斯主義認為民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認為人民不應該有甚麼自由和權利。希特勒說：「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

可以決定。」但是孫中山先生卻主張少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大多數可以決定，主張「以人民為主人，以官吏為奴隸」；主張「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孫先生不但堅持現在是「民權時代」，並且預言民權主義「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發達」；中國只應該比法美更進步，造成俄國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國」。在經濟上希特勒黨的政策大綱明白規定「國家統治一切社會化的企業，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齊亞諾等也就在這樣的「統制」「劃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財閥。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卻是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論上反對法西斯，而且在行動上反對法西斯。中國這樣的民族，本是只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但是還在民國十三年，居然就有個買辦資本家陳廉伯，為了破壞孫先生在廣東的革命根據地，陰謀要求廣州成立甚麼「法西斯蒂的政府」，孫先生不顧某些外國人的壓力，毅然決然地反對了陳廉伯，這就是有名的商團事件。孫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國和全世界反對法西斯的急先鋒之一。

為了反對法西斯，為了貫徹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中國一切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來加強抗日戰爭的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的力量。加強全國人民為光明的將來而鬥爭的信心和熱情。

在這個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中，三民主義者、共產主

義者、自由主義者應該是親密的戰友，因為無論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是與法西斯主義不能並存的。

「五四」和「五五」是中國民主思想的二十四週年紀念日，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根據地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二十二週年紀念日。這三個紀念日這樣巧妙地聯合在一起，應該是思想界反對法西斯大聯合的一個象徵吧。

中國抗日戰爭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萬歲！

中國思想界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及其勝利萬歲！

——《解放日報》社論 1943 年 5 月 5 日



第五輯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力民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借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裡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蔑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會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

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荳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晒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荳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荳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荳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荳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裡，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放的，那個碗裡已有的荳子多，那個碗裡已有的荳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

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荳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荳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荳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荳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裡，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蔑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4日



論選舉權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像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

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裡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奸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只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於哪個黨派、

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只是漢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漢奸，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假使我們對漢奸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托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

「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2 月 2 日

競選

街頭的議論界熱鬧起來了，大選在村民們的心裡，好像坡裡黃黃的麥穗一樣，一天一天成熟了。

六月一日婦女會召開了會員大會，討論後提出婦女的候選人。「咱婦女會員要當選村長，張大媽做公事認真、負責任，真正擋上擋下的人才。保證每月開個檢討會，拉一回清單，保證減租交息……」。會員都喊道：「對呀！咱去宣傳，公民小組開會，咱一定要提出來對大伙說說」。

各種團體開會完畢之後，競賽開始了！大會嚴肅、緊張。上任村長報告一年村政工作並檢討了自己，當他報告檢討完了徵求大家意見的時候，人叢中幾個人自言自語：「你都檢討出來了，咱沒的說了」。

接著討論通過候選人，會場頓時寂靜了。青年李××說：「××前年大掃蕩，他歡迎了鬼子，不夠候選人資格」，張大嫂也說：「我也看見他歡迎鬼子來，俺娘兒躲在小溝裡，看見他打小白旗，迎大路走去……」會場立刻應和起來：「對呀！沒有資格」。舉手表決後，選委會從黑板上擦去了××的名字！牆腳兩個老大娘在議論：「活這麼大年紀還才看到村長是自己選呢！」「是呀！這二十一個人是從大伙中用篩子篩出來的，像蘿面似的，越蘿越細，你看張大媽多能幹呀！咱們的代表」。這時，又有人站起來發言：「我介紹李大嫂做候選人，今年春荒，人家滿鍋清水，還是一天到晚東跑西奔的辦公事」。

二十一個候選人通過了。馬上就要投票，張大娘嚷：

「慢點，你再多念幾遍，我記不得。」大家挑選對像，一邊挑一邊批評。會場熱鬧極了。監票人李××，最後把票包起來，很重的用指頭蘸上封了包。他對人說：「咱活了這麼一把年紀，第一次嘗嘗民主的味道。」

在開票前，村民們在坡裡互相詢問：「你投了誰的票呵？」「又不大離兒，還是張大媽幹吧！」

晚飯後，公民們急忙走向會場去，當票開完，被選人各階層人數相等，會場異常靜肅了。

第二天，公民們都說：「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這些才是當家人呢」！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6日



第六輯

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斥「人格教育」

舒蕪

士氣怎樣敗壞，「人格教育」怎樣重要，這些呼聲，不知由於甚麼一種觸發，近來又常常出現在時論中了。人們引證「經商易得、人師難求」的古訓，對於今之教員，深致其不滿，責備他們只作知識的販賣，而不會建樹人格的儀型。似乎有一種企圖，要從這些呼叫中把整個教育引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這裡面包含了一種陰謀，而這「新的」方向其實是舊的，完全陳舊的。

教育，是社會的、階級的武器。沒有一個社會、一個階級，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國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數到現在，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餘年古國」，倘要說清末以前就沒有教育，那可說不通。我們這些習慣於新式教育的人，對於以前的教育，總覺得格格不納，總覺得那彷彿是全然相異的別一回事。不客氣的說，就簡直覺得那並非教育。太學、國學以及州郡府縣學之類，不必說了，就是常為論史者所嘖嘖稱羨的書院，倘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過去，也會感到陰森窒息，一點也沒有所謂「春風化雨」

的風光。好在眼前就還有甚麼「復性書院」之類，只要去參觀參觀，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這是本質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從的；民主教育則是建基於理智主義之上，要啟發自由的思考，鼓勵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於受教者的實踐，但在怎樣使之實踐的關鍵上，就有了決定的分歧。

柏拉圖說：知識即道德。實在的，凡與知識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來闡明、經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說，沒有理智主義的基礎的「道德」，都不過是僵死的教義的武斷，陳腐的習俗的盲從，統治者打造出來的精神的桎梏。反過來，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聖。因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鬥爭之路，這個路必需深湛剛強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現在說，新式教育錯在注重智育，應該轉而注重德育了。這話就表明了那所謂道德，是在理智之外，與理智不兼容，就證明了那「道德」其實是甚麼東西。

不過，空言不如實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應當有一個能實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體的儀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許會這樣解釋的吧。只要不是機械論者，當然不會否認，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這人格也應當是一個合理的存在，也應當能被理智所闡明；第二、做法這儀型，也應當通過深徹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習慣的跟從；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體的儀型，究竟還是社會生活，不是這個或那個的

個別的人。而社會生活又就並非不要理智所能認識清楚的。

今天的社會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不必在這裡說。姑且借用一句老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大體上還是如此。據說這種荒淫無恥，大大的引誘了青年人，他們看到這條穩當便捷的路，覺得平日接受的知識、所指示的路都迂遠艱難，就紛紛的就彼而捨此。於是，陰謀者也就趁機站出來，說道：由此可見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識無用了，有些知識也適足以濟惡了。

就這個情形來說，知識可以說是無用的。但絕對不是說一切的知識，而是說今天一般學校裡所傳授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僵死的，脫離了社會生活；不但不能說明社會生活的真相，反而會掩蔽它的。社會生活的全面，是莊嚴與荒淫、光明與黑暗、新生與沒落的交織。今天學校裡所傳授的知識，當然不會公開歌頌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無意的，卻嚴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這個時代的通向光明，為了光明的努力、爭戰、進行，新生的東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視作洪水猛獸，不許在黑板上或講義上透露分毫。新生的東西又究竟比較的不甚顯著，不如荒淫無恥之彰彰在人耳目。這樣，青年人之易於被荒淫無恥所引誘，當然就是當然之勢；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於「智育」的加強，以有用的知識代替無用的知識，以現實的知識代替迂遠的知識，以知識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輸，以社會生活的全面說明代替歪曲的描繪；絕不在於廢棄知識、絕滅文化——

這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我們的民主主義的、理智主義的教育傳統，是可珍貴的；儘管它曾經被封建主義的殘餘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滯，更曾被東方法西斯主義所強姦，卻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貴的，在青年的啟導、鬥爭的組織、文化的促進這些巨大的任務上，我們的教育起過甚麼樣的無可估價的作用，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加以抹煞。別有用心的，拚命的誇張「教育破產」，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靜坐觀心、踱方步、記功過、灑掃應時進退：這些，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知識即道德，愚蠢即罪惡。人格，決不是反理智的東西。

——《新華日報》1946年7月30日



學校要成為民主的堡壘

近年來，很多大中學校中有「民主牆」的設置，這是一個好現象。但假如只有在這一堵牆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牆的精神應該發揚，使整個學校，每一個學校都成為民主的堡壘。

說學校要成為民主的堡壘，這就牽涉到學校是否要和政治牽連，學生是否要過問政治的老問題。但這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並不是要把學校捲進政治的漩渦，讓學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動。恰恰相反，假如辦學校的人及教師和學生不一起努力來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結果就使得學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壞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學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學。

這幾年大後方學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證明。據說，有一個大學的負責人自負為「以辦黨的精神辦學，以招兵的辦法招生」。又有人說，有的學校拿了國庫的經費，卻只在培養「陞官、發財、造謠、生事」的人才。這話也許言之過份，然有這種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並不是沒有認真辦學的人，但是他們被當做教育官署的下屬，經常要應付各方面來的公函訓令，一會兒要注意那幾個教員，一會兒要嚴防那一些學生，試問如何能叫他安心辦學？也不是沒有認真教書的教師，更不是沒有認真讀書的學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惡狠狠的面孔高壓他們，監視他們，威脅他們，叫他們如何能安心的教書讀書？在這種情形下，不

學無術的官僚可以主持學校，靠面子有後台的人可以當教授，掛起手槍橫行不法的學生可以坐享公費。這簡直可以說是斯文掃地。假如不改變這種情形，恢復學府的尊嚴，後患何堪設想！

很多人慨嘆近年來學校國文程度的低落。其實何止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程度的低落。學生試卷上暴露出的對於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無知，那決不應該做為笑話來傳述。應該使人痛心地感到黨化教育的貽害。中國現在已進入和平建國時期，沒有千千萬萬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做中堅，談不到建國。學校的任務太重要。中等學校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初級人才，大學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高級人才。國家要建設，必須要安定；學校要培養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意思就是要使學校的內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擾亂和破壞，讓辦學的人能安心辦學，教書的人安心教書，學習的人安心學習。

和建國綱領中在教育項內規定「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又規定，「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教學內容」。這規定很切要，也就是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使學校能負起培養建國人才的辦法。能夠做到這樣，學校就成了莊嚴的民主堡壘。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後，學校應該讓真心從事教育事業的學者去辦，西南聯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長成

為委任職的官員，是極壞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此後，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在黨化精神下所訂的各級學校課程標準應該徵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學校內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現行的統一招考，教育官署審定教授教員資格等制度也是變相的干涉學校行政，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氣就能有安心教學的環境，就能促進科學和藝術的進步發展。學校內部情況的變革固有賴於外面的政治社會的進步，但學校是應該做移風易俗的先導的。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夠給中國帶來民主與科學的福音，首先使學校變成民主的堡壘。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2月6日



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運動，在反帝、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之下，曾經猛烈地反對舊政治、舊文化、舊禮教，實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開闢了民族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紀元。從「五四」以後，在中國表現得如此的明顯：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眾政治運動，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首，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在曲折崎嶇的道路上發展起來；另一方面，舊的政治與文化在被群眾強烈的打擊之後，買辦官僚的代表又從東西洋運進一些法西斯主義的貨物，在舊專制主義的基礎上，再加上那種法西斯主義，以繼續壓迫人民，戕害青年，並企圖從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能。自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國民黨右派舉行法西斯政變以來，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戰士及青年為之而捐軀的數目，在中外古今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八年抗戰，在國民黨一黨統治區域，為愛國與民主而奮鬥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殺，依然是無數的。在那裡一切講學、讀書、出版、發行的自由，被殘酷地摧殘。復古成為時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學校中，秘密偵探、欺詐迫害、武裝威脅、金錢收買的特務作風，盛極一時，教育與學術的尊嚴，掃地以盡。一切知識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無論在街上家內，好好的一個人會被突然抓去。集中營裡至今還關禁數萬無辜的青年。然而同時，中國的光明也畢竟在

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涌現出來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從敵人的魔手下奪回來，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保證了文化方面的徹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發展和大眾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沒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愛國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設的蓬勃發展，青年思想的活潑發展。這一個對照，已經最好地說明了一切。

它說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

它說明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科學，與自由思想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人。萬惡的納粹黨徒戈培爾說過一句法西斯主義的格言：「當誰在我的面前講起智力的問題，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槍來。」這句話，實際也正是為中國的法西斯派所從來信守的格言。因為法西斯主義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統治。所以它們在政治上、文化上極端仇恨思想與理智，而極端歌頌野蠻、獨斷與盲從。中國法西斯派有一條獨斷的根本教條，叫做「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規矩：大家一聽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個領袖」，就必須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表示願在這「一個領袖」的叱吒之下；只要是少數買辦官僚寡頭的利益，就要無條件服從，視之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來，中國法西斯派拼命把這種罪惡的教條灌輸給純潔的青年，

一切不接受這種法西斯主義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異端，都被認為該殺。拿槍桿對中國人民的腦袋，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的政治與所謂「文化」。

「五四」已過去二十七年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仍然是輝煌的。完全推翻中國法西斯派的壓迫，爭取全國的民主，打碎思想統制，使得中國完全新生，這是一切民主人士、進步人士的嚴重任務。

今天，中國人民為民主自由的鬥爭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也處在一個嚴重的歷史關頭。從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無所顧忌地犯下了一連串的血污罪行。這一連串的青年被殺被捕的事件，是和當前中國的和平與內戰、民主與獨裁之爭聯結在一起的。歷史證明：中國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來，他們反抗外來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國內的法西斯壓迫者，站在英勇鬥爭的最前線，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中國青年更要再接再勵起來。

中國青年紀念這「五四」的偉大歷史日子，應該更進一步地用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來武裝自己的思想，應該用毛澤東這個偉大的人生觀來充實「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口號，使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獲得更堅實的新內容，更明確的新目標。我們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們追求的科學，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科學。中國青年必須培養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才能真正成為民主與科學的戰士。

各解放區的青年要為人民服務，把中國和平民主堡壘

的解放區建設得更好!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要為人民服務，堅決打擊中國法西斯派的進攻!全國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在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下，消滅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向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的目標前進呵!

——《解放日報》社論 1946年5月4日



民主和自由新論

黃元真

某大學的一位院長在紀念周上公開講演「民主」，說「校長為政府之代表，有資格談民主；教授為校長所聘，可以稍談一點民主；至於學生則根本不能談民主。」

可惜無法親聆那位院長先生的「高論」，不知他所說的詳細理由是甚麼。但從這簡單的新聞報導中，我們也不難推論一些出來。能夠代表政府的校長（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長並沒算在內），當然「有資格談民主」，而且只要能夠代表政府而決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資格，某院長本人即為實例。因為他們這類的先生們所談的不過是括號內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政府主」或「××主」，與人民利不相關而害相連，大談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們的言論不一定都能夠代表政府，有的談到民主就要認真起來（這是每個愛好真理的學者所必有的態度），這樣會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過他們到底還是校長聘的，雙方都應該顧及到一點情面，只要在不妨礙校長以及校長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談一點民主」的。至於學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賦有特殊使命來掛名讀書的人們，都是年少氣盛，遇事更其認真，說起話來，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顧忌，若讓他們來談民主，就會要真正的徹底的來談一下，這是與校長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談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們就「根本不能談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訓青年的文章中，我們又看到這類的話，要我們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來貢獻給國家和革命。乍看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麼？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甚麼？頭一個問題暫且不去討論它，只就第二個來說。要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就來看如今的青年有些甚麼樣的自由可拿出來貢獻和犧牲的。今天青年有集會結社、讀書閱報的自由麼？完全沒有。有談話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麼？也完全沒有。也許可以說，青年不是還有失學、失業、飢餓和死亡的自由麼（目前這樣的「自由人」真太多了！）？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樂於「犧牲」而唯恐「犧牲」不掉的，試問教訓青年要犧牲的先生有辦法讓他們「犧牲」這些自由麼？否則叫青年貢獻甚麼和如何貢獻給國家和革命？說到平等，青年並沒有和一切別的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許多等級的不平等，沒有甚麼可以拿來做犧牲品的。至於所謂「個人的平等」，在我這個笨人看來真太難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對自己還有甚麼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發生，自然更想不到還有「個人的平等」是應該貢獻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裡可以轉回來，我們不要罵那位院長所說的都是屁話，而應該說他所說的正是實情；也不要以為這位名人對青年的要求太過份，其實這也不算甚麼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實」。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

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裡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雖然有時也要牽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們來唱唱「愛自由、愛民主」的歌調(但緊接在後面的總要露出那些甚麼第一甚麼集中之類的狐狸原腔來)，那不過是為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

—— 世界學生日獻辭

今天是第五屆世界學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殺布拉格大學學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學生也遭受到機槍掃射、毆辱和監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國學生代表在華盛頓集會追悼，並決定每年的今天為世界學生日，全世界學生應舉行紀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時激勵全世界學生，永遠不忘團結起來與反動勢力作鬥爭，共同為一個和平、民主、進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為甚麼要屠殺學生呢？這沒有別的，只是因為不甘做法西斯奴隸的學生是每個被侵略國家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鬥爭的先鋒。因此，學生總是法西斯的眼中釘，而法西斯也是學生和文化的死敵。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殺的殘暴手段，把學生的反抗鎮壓下去的。捷克學生終究保衛了他們的祖國，而德國法西斯匪徒卻被世界人民的聯合力量打敗了！

像反法西斯各國的學生一樣，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敵人投降之後，美國卻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內戰和獨裁的路線，中國學生又被擲入

沒有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們既過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學生天天有絕糧之虞，京滬及其他各地學生因為繳不起學費和物價過高而紛紛退學。在校學生多因營養不足而面黃飢瘦，精神頹唐。學校設備簡陋，教師待遇菲薄，致使教學無法順利進行。至於言論、集會、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殘。任何人都還記得：復旦大學學生因牆報言論觸犯忌諱，既被特務抓來罰跪毆打，又被學校當局加以處罰；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在校內集會，竟被關麟征指揮軍警開槍干涉，甚至又派兵士衝入學校，用手榴彈打死學生四人，重傷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慘案。此外，迫害學生思想自由、人身權利的事件，真是不勝枚舉。在解放區，學生們雖然沒有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直接摧殘，但，由於國民黨飛機到處轟炸，國民黨軍隊四出侵擾，使得他們不能安坐讀書。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擊敗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中國學生的報酬。

不僅這樣，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賣國，使抗日勝利後的中國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國憲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槍擊中國學生；比「二十一條」還要喪失權益的《中美商約》，更重重地打擊了中國學生對於民族獨立的願望！特別是在國民黨當局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扶助，而片面召開一黨國大製造分裂的局勢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機又尖銳地提出在中國學生面前了。

中國學生不能馴服他，做法西斯統治者的奴隸，也不

甘受帝國主義者的踐踏，儘管國民黨當局為了禁止學生反對他們的賣國、內戰、獨裁政策，用盡一切方法來愚弄、鎮壓、欺騙中國學生，但是中國學生的積極戰鬥性是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的，它是嚇不到壓不了的！壓力愈大，反抗愈大。

「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國民黨當局不但倒行逆施，壓迫人民，摧殘青年，還更狡猾地，喜歡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進步的脣膏，裝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動派似的。

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壞政協決議，大打內戰；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個御用國大來制定一部偽憲法，以使他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同樣，他一方面，殘害青年學生；另一方面，卻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視「世界學生日」，其實還要假裝說點愛護青年、反對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話，以把他打扮成為一個「進步」的「民主」戰士！這種兩面手法是反動派的慣技。但是在反動派摧殘青年、屠殺學生事實的對照之下，它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看已經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鐵蹄下得到徹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學生們，看全世界許多過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

學生們，中國學生應該再接再勵，擊退最後這一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爭取中國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11 月 17 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

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運動是促成抗日戰爭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先鋒，這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光榮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週年紀念日，新的學生運動又在蓬勃生長。雖然十年前和現在，各方情況都已不同，學生運動的內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中國青年抱清醒的頭腦和燃燒的熱情而參與愛國運動的表現。

這次昆明的學生運動遭受到有佈置的武力摧殘，和有計劃的誣陷和恐嚇，但他們始終是方針明確，態度堅定。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是他們的主張，並不因任何誣蔑刺激而有所動搖。在一切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陰謀下，他們始終保持內部的團結一致，保持行動步驟的穩重，為死者要求懲凶，為生者要求人權的保障。今日青年的這種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動，表現了他們無愧於「一二·九」的後繼者，的確是真誠愛國的青年。因此他們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和響應。雲大教授七十一人聯名聲明，對學生表示同情，聯大全體教授罷教一星期以響應，更是過去任何一次學生運動中所未曾有過的。這正是因為昆明學生們的呼聲與行動，不僅可以代表全國的愛國學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他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意；他們不畏強暴，堅持鬥爭的精神，

表現全國人民的力量。

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道路，還是一個艱難的鬥爭過程。從這次的昆明的學生運動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慘案已經過了一星期，當局對於學生、教授和社會各方面的呼籲還是置之不顧，他們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開審訊聯大手榴彈事件」的醜劇與捏造出荒誕離奇的人物和故事來遮掩他們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們又動員了純官方的輿論，向反對內戰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們的人進行無恥的誹謗和惡毒的中傷。照理，無論怎樣頑固的人，聽到千萬愛國青年一致的呼聲，至少總該有一點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鋒下，總該有一點心悸，但這些殺人的罪犯毫不動心，他們只是把帶血的刀暫時藏在懷裡，繼續用花言巧語來否認內戰存在的事實，又用殺氣騰騰的口氣來宣傳「武力戡亂」的必要。因為他們就是製造內戰的罪魁，所以他們不敢承認內戰；因為他們口頭所說的和平解決不過是個幌子，所以他們要用全力來壓迫愛國青年和愛國人民的反內戰運動。

在「一二•九」時，北平學生有一句痛語是：偌大一個華北，竟沒有一塊淨土擺上我們的書桌。十年前，國民黨當局的親日外交斷送了華北，使學生有書讀不成，現在，假如聽任內戰陰謀家繼續活動下去，那就無法使學生安心讀書，也會使全國同胞長期陷落在飢餓流離死亡的苦惱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隸狀態中。國民黨宣傳員竭力用捏造和附會的伎倆，想來證明這次學潮是由於共產黨的挑撥，這完全是徒勞無功的。既然你們自己所作所為和人民的意志不

相符合，既然你們對於和平與民主事業，還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繼續採取敷衍、延宕、欺騙的態度，繼續堅持反人民的內戰和反民主的政策，那麼廣大人民在超過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後，到底還會做出些甚麼事來，那不僅共產黨無法保證，誰也不能為你們保證的啊！

從來反動統治者都把學生運動說成是一群學生的搗亂。但實際上，學生運動總是反映一個時期的人民的政治鬥爭。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有教授參加，有廣大社會的響應，這固然不只是一個甚麼「手榴彈」案，也不只是一次罷課的「學潮」。政府對於這次屠殺學生的慘案，假如立即實行一些能令人民滿意的善後辦法，懲辦真正的兇手和負責當局，保證不再武力干涉學生自由，那麼我們相信，學生是可以而且也願意復課的。但是內戰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中國青年繼承了從「五·四」到「一二·九」的光榮傳統，一定要和廣大人民團結在一起，為和平民主的實現和鞏固而鬥爭到底。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睽睽眾目豈容狡辯 屠殺學生罪責難逃

(輿論輯要)

重慶輿論界，對昆明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一致同情學生。

當雲南省府改組後，就有人預言似的說：「人們卻更擔心作為民主運動的堡壘的昆明，怕也抵擋不了特務的恐怖手段」(見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週刊「重慶風雨」)。「一二·一」慘案，證實了人們的擔心。當局為了掩飾其罪過，已極盡其造謠誣蔑的能事，但所得結果，卻是更使正義人士憤慨。到目前為止，已經見於重慶報紙的公開聲援，已有八十餘個團體，個別捐款慰問的人更難統計。本市輿論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與純官方言論恰好成一鮮明的對照。

對學生運動的估價——反動者蔑視青年

對此次昆明學生反內戰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和平日報認為是青年的「盲目自殺」(見本月一日該報)；恰好相反，時事新報卻將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學生運動，並且問道：「假使沒有自五四以來的歷次青年運動，誰能說中國今日是個甚麼局面？八年的抗戰有沒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見四日該報)。七日大公報雖根據與事實不符的報告來說明這件事情，但也從歷史上的學生運動來說明「學生的愛國運動，都有其光榮的功績」。商

務日報(六日)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歷史的推動力量」，認為在「某種政治條件存在」之下，「則這一性質的運動」，今日固可產生於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煥發和蔓延於全國各個地方。」新蜀報(五日)說：「每一次學生運動，都是為了國事，實際上都是一種政潮，……昆明慘劇正是一種以學生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當局「應重溫過去學生運動的歷史教訓」，這就是說：歷史上哪一次學生運動是被武力壓得了的!?

「一二·一」慘案的責任——反動者誘過共產黨

反動者企圖以「共黨煽動」(見中央社電及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社論)，輕輕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是七日的新民報說：「學生罷課反對內戰，當地軍警出動鎮壓……，在這情形中誰是誰非，幾乎不待判斷」，「看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政府當局亟須反省」。國民公報在七日社論中，也指出：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以殘殺，「雲南省地方當局之未能慎為處理應該負責」。

青年有發表政見的自由，反動者卻怕青年過問國事

青年應不應過問國事，應不應反對內戰呢?大公報七日社論說：「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其中就有學聯會的代

表，可見學生是可以對國事發言的」。只有從來就蔑視中山先生主張的人，才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無意義的，不正確的」（見五日中央日報社論）。內戰是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也只有想以內戰「統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內戰」，才有「反對內戰」便是「助長內亂」的奇妙邏輯（見一日和平日報）。新民報（六日）說：「學生們只不過是『不要內戰』，而陰謀分子卻『不許』學生『不要內戰，豈不是證明這些人要內戰的麼』？」七日該報又說：「僅僅反對內戰就受到這樣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夠過問國事？……這是測驗政府究竟願否讓國民關心國事批評政治，也可以測驗政府對於人民所作的諾言，有沒有兌現的勇氣」。這些話不知那些自稱為最「保障青年們讀書、討論、開會、講演、學術研究上的自由」（見六日和平日報）的人們聽見沒有？商務日報簡捷的說：要人民不反對內戰，只有事實上不從事內戰，就是老老實實的「實現民主憲政」（見該報六日社論）。如果「國事紛亂，民不聊生，而青年學生猶漠然無動於中，依舊渾渾噩噩，這可說教育已根本失敗，而這個國家的生機也幾乎絕矣」（四日時事新報）。「何必惶惶然如臨大敵，以致引起更多的糾紛？」（同前）七日的國民公報指出這次昆明學生運動，「正是今日青年對國內政治煩悶的部分暴露」，「試問世界勝利了，我們的勝利在那裡？國際和平了，國內的和平又在那裡？」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為了國家的生存與青年的前途，還不該多說幾句話麼？不當提出自己的意見麼？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動者才不敢正視青年的苦痛與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誘惑」，說

那「不是代表大多數學生的運動」(五日中央日報社論)，他們把昆明學生反對內戰運動歪曲為「反美」(見中央報五日，和平日報一日)，欲以離間中美人民之間的友情。這種陰謀詭計是騙不了人的。「我們相信同學們反對內戰是出乎忠誠，決非一二流言所能誣蔑」(見雲大教授告各界書)。名教授張東蓀先生也說：「對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學生難免要鬧起來，但這種鬧，是出於愛國同胞的赤誠，結果竟發生慘劇，是十分遺憾的」(見七日國民公報)。「近日官方電訊，對學潮事實，竟存扭曲，顛倒黑白，似在擴大政治糾紛，使問題無法解決」(見民主同盟發言人談話)。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謊言與滑稽「把戲」，也掩不了血寫的醜行！

對青年應有民主態度——不可強加誣蔑，動用武力

統治者於屠殺青年之餘，還沒有悔過的表示，但輿論界幾乎一致(除極少官報)主張政治應民主，特別對青年，千萬不應以武力對付，併當保障其身體、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報說：「今天是民主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治，正應該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數人民關心國事，參與國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壓制人民關心國事」。時事新報也認為，對待青年「不當心存忌怕」；「不可強行壓制」，更「不可強加誣蔑……指為某黨某派」。新民報(四日)說：「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實在無動用武力之必要」，「我們主張在學校

以內應當讓我們的學生盡量自由，……我們以為青年們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不應躲避隔絕，而應多研究，多辯論，以期真正了解，我們政府正在實施『民主』，我們以為這一點思想學術的自由是應當有保證的」。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1日



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茅盾

「一二·九」的劊子手用大刀水龍頭對付青年學生，現在昆明慘案的劊子手卻用機槍和手榴彈了。這難道就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麼？「一二·九」的北平學生為了「救國」在大街上慘遭屠殺，現在的昆明學生為了「反對內戰」卻在校內被「進攻」而「圍殲」了。這大概也正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吧？

劊子手們混賴罪名的方法，最早為掩耳盜鈴的扯謊，例如「碰傷」，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後則為誣賴，為含血噴人，例如「受人利用」，「別有背景」；但這次昆明慘案除了這兩套老調以外，竟還跳出三個自承如何被「收買」的兇手來了。

這不用說也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了！

我雖然不曾親自看見昆明街上以及聯大校舍內血肉橫飛的慘狀，然而讀了昆明各校罷聯及教職員的各項文告，我對於劊子手的按語是殘酷而又卑劣。這樣的殘酷和卑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不但禽獸中絕無僅有，即在人類中也是少見的，更不用說「民主」的假面具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學生的血，自來是不能白流的，讓我們後死者嚥住熱淚，沉著地踏著死者的鮮血前進吧！

——選自《昆明「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編，原題為《為「一二·一」慘案而作》

為死難學生呼籲

昆明大中學學生為反對內戰，竟遭軍警便衣屠殺毆打，死傷達數十人之多，這件事情本身的嚴重已不容我們來多贅一辭了。誰無子女，誰無兄弟，當有良心的人看到手無寸鐵的一群純潔愛國的青年，遭受當局用如此野蠻殘暴手段對付的時候，心裡會是多麼沉痛與憤慨！

昆明的學生們喊出了反對內戰，這是全國廣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學生們這一爭取和平民主的行動正是表現他們的赤誠愛國，除非是別具肺肝的人，誰能忍心加以污衊？誰更忍心用炸彈槍枝來加以摧殘屠殺？！但是很不幸，昆明學生們這種爭取和平民主的愛國運動竟遭到軍警的屠殺，不能不令人非常憤慨！慘案發生後，那些屠殺青年的兇手們，又企圖諉罪別人，想含血噴人的把責任加在中共的頭上，但事實俱在，絕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

我們謹對昆明學生這次純潔愛國的行動，表示極大的崇敬，對他們今天所遭受的摧殘，表示極大的關懷，希望全國正義人士給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當局迅速懲辦造成慘案的兇手，並立即停止內戰，使昆明學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國能早日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4日
原題為《為昆明死難學生呼籲》

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黨徒為了消滅德國人民的力量，樹立法西斯獨裁，玩了一個毒辣的陰謀，就是縱火把德國國會燒了，而把縱火的責任推在德國共產黨身上。好了，現在紐倫堡的戰犯法庭，證明了主使這個陰謀的就是納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國國會縱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現在，戈林自己在盟國審判之下也沒有話說了。

其實，「嫁禍」的陰謀詭計，在我們中國，幾乎成了反動派的家常便飯。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慘案。明明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鎮壓昆明學生的愛國運動而一手造成的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武裝屠殺，卻妄想抄襲嫁禍慣技；自己屠殺了青年學生，毆打了教授之後，硬把責任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以為這樣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殘罪行，偽飾自己的猙獰面目了。

讓反動派聽聽紐倫堡的聲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沒國會縱火案的真實案情，難道任何捏造的謊話，能夠掩蔽用血寫成的昆明慘劇的事實嗎？！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騙不了的

昆明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不感到無限的悲憤，連日各界捐款慰問，寫信聲援，有如潮涌。足以證明昆明學生的愛國行為和他們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國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時也反襯出國民黨反動派嘴臉的醜惡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本來，這件慘案的事理至為清楚，責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學生只不過激於愛國熱忱，憑了赤手空拳，起來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究有何罪？而國民黨反動派竟採取殘暴手段，慘加屠戮，並在屠戮之後，為了「嫁禍」起見，還不惜含血噴人，肆意誣蔑，居心惡毒以至於此，真是史無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國民黨反動派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徒見其日益心勞力拙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7日

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任憑你有怎樣偷天換日的本領，任憑你有怎樣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終究敵不過血寫的事實，血寫的歷史。

真的，這些年來，人民的眼睛已經給萬重的苦難磨煉得異常尖銳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間引起了深刻而廣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間引起了悲痛的回憶：他們想起了「劉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時代，想起了民國以來一連串黑暗的日子。

當人民能夠回憶歷史的時候，也就能夠從歷史中取得教訓，更能夠從教訓中生長起力量和信心，人民豈是可以輕侮的麼？

反動派也應該想一想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成都各大學學生為聲援昆明愛國學生運動，於九日召開追悼昆明遇難師生大會，並在會後舉行遊行，經過情形，已見昨日本報成都通訊。

這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反對人民的任何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在昆明，採取了「嫁禍」陰謀，製造出一個莫須有的「姜凱」，把屠殺學生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說共產黨「指示暴動和學潮」，又說民主同盟如何如何，這樣地把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擴展其摧殘壓迫一切為爭民主的黨派和人民的「根據」。

這種陰謀的一演再演，這種陰謀的毒辣陰狠，對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萬分！這種陰謀，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兇惡面目。

我們曾經一再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有一套荒謬的邏輯，就是把所有反內戰爭取民主的人士都指為共產黨，而把反內戰爭取民主的任何行動都誣為共產黨的「陰謀」。他們企圖造成「合法」借口，來實現自己假「戡亂」之名進行內戰之實的反動政策。他們不惜用流血的手段來對付昆明手無寸鐵的學生，就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套邏輯完全揭穿了。現在為了準備又一次用流血手段來對付成都的學生和一切主張民主的人士，所以，他們就又祭起這套從希特勒那裡學來的法寶了。真是卑劣無恥到了極點！

奉勸國民黨反動派們：希特勒是學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贓嫁禍」的法寶，已經到了收起來的時候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4日



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節錄)

編者按：我們訪問了好幾位青年的前輩，提出幾個關於青年教育的問題，請他們發表一點意見。但因為時間和交通的困難，有許多受我國青年敬愛的前輩，還未來得及去訪問。現在就我們所採訪到手的，發表出來作青年讀者和國際青年友人的參考(本期文章編者以收到先後為序)。

一、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起碼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統一，因而決定實行嚴厲的思想統制(如像法西斯國家那樣的)，他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嗎？

三、領導青年的思想，最好是應該採取甚麼樣的辦法？

郭沫若：

對於國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認為至少必須具備這幾個特點：

1. 人民本位。為最大多數謀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變相的帝王本位，犧牲大多數人的幸福以謀少數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後者是訓練奴隸。

2. 國民教育普及。作為一個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識，即初中以下的教育，應使全民享受。

3. 高級教育保護。高級教育應因材施教，杜絕一切

特權，不使貧苦者被拒、而富者濫竽。

4. 學術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盡量闡發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盡力打擊的自由。以真善美為目標，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虛偽、歪曲、變態的箝束。

5. 尊重學者，保衛師資。

6. 國際協調。與進步的民主國家保持協調的步驟，肅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類的和平」。

郭先生更認為法西斯的思想統制政策是可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德國和日本便是絕好的證明。但這並不是「統一思想」，而是「消滅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為害於人民，更為害於世界。」「使這一次的世界大戰，為爭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幾千萬人的血，而且在戰爭結束後，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肅清，還要費很長遠的歲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滿清入關後統制思想，使中國退化了三百年，現在卻還在受它的餘痛」。

談到青年思想的領導問題，郭先生說：

「青年思想的領導，最好是啟發式的、感應式的、培養式的。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都要顧到。有健全的身體，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目的在使每一個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則，養成自由研究的習慣，發揮自由創造的精神。給以豐富的養料、美好的環境、高尚的師資。廢除剪削繩束的盆栽主義。廢除腳帶腰纏的畸形主義。廢除髯首閹割的奴才主義。一句話歸宗，讓青年自由自在的發展便是最好的領導」。

陶行知：

(一) 民主政治下的教育，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甲．天下為公，教育為公，不以教育為一黨一派及任何小集團謀利益。

乙．尊師重道，不以偵探作教員，不使教員兼偵探。

丙．使師生之間，沒有隔閡。

丁．使學生打開眼睛看事實。

戊．關於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學生有閱讀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

己．學校內團體生活，要有民主的組織使學生在民主生活中學習更進步之民主。

庚．動員廣大群眾，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學習民主。

(二) 三民主義一開始就說：「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發生思想，思想貫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統制」與「思想貫通」是不能兼容的。其次可以分兩方面說。那不得已而受統制的人是越弄越沒有追求真理的興趣，結果不是思想統一而是思想消滅、智能消滅，統一於愚；那不甘心受統制的敵人，一部分倒會突破千磨萬擊，而發展出更高的思想與更大的智能。

(三) 領導一二人，可用荳油燈；領導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領導一國之眾及全世界就要太陽，至少要月亮那樣的光明。統而言之，無論領導多少人，總是要拿真理之光，

照人向那正確的道路走去。如果領導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隨的人的眼睛閉了看不見光，或者甚至把他們的嘴也封起來了，連路上遇危險也不能喊，那領導的人們不但是費力不討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難免會出岔子。

夏衍：

一、起碼要承認青年學生是一個有人格有人權的人。尊重他們的人權，讓他們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頭腦來想的自由。

二、假如這樣的思想統制能夠收效的話，那不僅希特勒可以永遠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會二世就亡國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現代化技術的龐大機構，在德國人民中散佈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現在，對蘇聯的侵略戰爭失敗之後，德國人民不就開始用同樣現代化的機構在反對法西斯主義麼？

三、我以為最好是培養青年人的客觀態度。——讓青年人和現實社會接觸，讓他們自由地感覺、自由地思索，然後讓他們根據自己實際所感和所想得來的一切，來自由地判斷。

茅盾：

家庭是一個圈子，學校是一個圈子，這兩個圈子外邊又有社會這個大圈子。這是個比喻。這比喻好像有點機械。

但我們姑且這樣假設(當然事實上這三個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響，而且這三個圈子在甚麼線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們也暫時不談)，一個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塗的家庭，除了賭和吃，便整天想些損人利己的勾當，甚至損人而並不利己的勾當，他所見的社會又是以貪污為能幹、以強橫為威風、以欺詐為德行，那麼，即使他進了個好的學校，結果他會被教成個甚麼呢？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此所謂好的學校只是設備差、尚能灌給他一點知識，那麼，有了知識的他，將來要貪污、欺詐、強橫的時候，其作惡的能力和 method 也會大些。然則這「好」學校給人的知識適足以濟惡而已。我們又設想：如果這所謂好的學校是不但有好設備、好教師，還有好學風；教師不但教得好，還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麼，該青年將來的結果，大概是三條路罷：一是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完全抵消了學校中所給予他的影響。二是他覺悟了，且有勇氣反對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悶，悲觀厭世。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夠教育出配作民主國家的公民，教育設施之必須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會上必須真有民主，即國家真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外表與內容不合，決無好結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國家即一套思想統制的辦法，乃至領導青年的辦法，自然都是不應當有的。而領導青年姑不談威脅利誘等手段，單是自己不檢而且以言語欺騙，其結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設想、便是適得其反的。

沈志遠：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現為極端對立的姿態。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論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罷、褐色也吧，或其他任何顏色也吧，都沒有兩樣)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當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則充當耍木偶戲的人；他兩手拉住一群木偶頭上的線，就可為所欲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係，是主與奴的關係。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應當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樣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獨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們的人格，讓他們盡量去發揮他們的天才，而自己居於從旁輔導的地位。兩者的關係是兄弟般朋友般的關係。教育者對受教育者不但絕對不能為所欲為，且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極善的)，而只有用說服、解釋、理喻的方法。主與奴的關係，在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域內都絕無存在餘地，何況乎在神聖的教育園地內？

其次，和前一點相連帶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對於受教育的青年們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誘，一隻手手槍(或者棍棒)，一隻手鈔票(或者地位)，根本談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足十足的奴才教育。

極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針恰恰是要發展人格教育，培養青年的獨立人格，因而他們的教

育方法是因勢利導、循循善誘，依照最新的集體主義民主制的原則，教育者並且應該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來檢討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機關內，那種一手手槍、一手鈔票的卑鄙勾當，是絕對沒有存在餘地的！至於「蓋世太保」之類的東西，更不許其混跡於神聖潔白的教育園地之內！

極端相反的，民主主義的教育，卻以培養和鼓勵青年大眾的自由自覺精神為其神聖的基本方針。它不要青年盲從，而偏要青年懷疑：遇事要問一問為甚麼？怎麼樣？以及怎麼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當作木偶、當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動（包括學術研究、生活訓練，以及各種集體活動之自由），培養他們成為高度自覺、精神活潑、極富於自動創造力的一批國家社會之自覺的棟樑。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將隨法西斯本身之總崩潰走進墳墓；民主主義的教育必將隨民主主義在全世界上的總凱旋而得到進一步的昂揚。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夢想者啊，趕快讓給進步的民主主義吧，不然你們的墳墓也不會比納粹們遠一點的！

黃炎培：

我認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覺後知」。既然如此，年長者應該盡量將自己的知識去告訴後輩。但是有兩點應該認識，一是人類的思想和天賦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實

驗過，以同樣一句話，某甲的反應與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場最好要因材施教，對甲應用適合甲的方法，對乙應該用適合乙的方法，決不能籠統用一種方法。其次，青年天賦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各色人材。為青年本身想，應懂得他們天賦的不同；從社會需要想，也不應教以同。

講政治與教育不同，政治應有政策、方針，應該同。把政治意義施之教育，應該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統一目標提出，讓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達到這目標。具體說，一個國家生存要有民族國家的觀念，這是最高統一要求，不能放鬆；又如教人知道應該為人服務不自私，這是基本做人道理，這都要說得透徹；至於怎樣去做，那就讓每個人自定辦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個框子，叫別人進入我的框子，這樣一定失敗。須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許他服從，但絕對不及讓他自己選擇一條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啟發，使他很了解這條路最好、最適當，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贊：

翦先生首先說明一國的教育政策，與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英美蘇聯等國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進青年思想自由地發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國家的教育政策，則是反民主的，對青年思想是統制的，

是屠滅文化思想的。「用武裝築成一條文化思想的狹路，在狹路的這端，寫智識分子從此入口；在狹路的那端，寫智識分子在此領取官吏的委任狀。因而一切智識分子為了陞官發財，都擠滿了這條唯一的狹路。這就是法西斯統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這樣說。

談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達到他們統制思想的效果時，翦先生就說：

「中國有句古話，『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強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這又何異強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莊子說了一個笑話，他說，人有惡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趨而影亦隨之，終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會的陰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質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陰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這和莊子所說的笑話同樣是一個笑話。」

「除非永遠站在黑暗之中，則一個人總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還是存在的。不過淡薄一點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頭髮，也有他的影子。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統制是徒勞而無益的事情。」

最後翦先生說：

「一個皇帝和一個乞丐，他們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統一不起來的。因為皇帝所想的，是國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飯。我們既無法要皇帝擔心明天的早飯，也就無法要乞丐擔心國家大事。所以還是讓他們各人想各

人的。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以為領導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讓他想他自己所願意的，研究他自己所願研究的。這樣，他們的天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是要從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鎖；換言之，要求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眾國成立的時候，馬上就認識了全體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國政治制度的人們很早就開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決策須由人民通過自己所選的代表們來決定，那麼人民就必須握有了解問題的手段。因此，美國現在實施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約在兩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建立了。

原則雖然很快就被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體人民可以獲得基本知識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來的過程，是長久而緩慢的。雖然使全美國青年都受初級教育這一目標已經大部分實現了，確立教育制度的過程卻還在繼續中。民主國家的教育制度必須經常改變和改進，目前戰爭環境對於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說明這一點。

不論在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聯合國家今天正在取得勝利，主要地是因為英美的教育制度優於軸心國家的教育制度。那結果，可以在許多方面看到。由於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國就能夠很快地重新組織全國的生活，從平時生活轉入戰時生活，美國就可能生產已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難於置信的大量的軍需物品，練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戰鬥的力量之一的部隊。要沒有民主的民眾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為可能，因為在美國的學校裡，青年人不但學到基本的語文和科學，學到各國的政治和歷史，而且學習如

何思想，如何去發現真的和假的，如何組織自己，實行合作的團體活動。美國青年在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學習如何負責任，如何獨立思考。不論在課程中，在學校生活中，教的都是這些東西。在美國現代化的小學中，教學的進行，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有趣的合作事業。學生學到和自己切身有關的一切材料，這樣就對於學習發生興趣。在教授各科中，經常使用問題法，把學生必須解決的問題放在學生的面前。問題的解決，也許需要參考圖書館裡的書本裡的一些材料，也許學生們不得不去請教鎮市上的某一個商人，才有辦法；這之後，也許還得運用自己的數學知識，計算一下。最後，教師和全體學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匯合攏來，開會自由討論，在會上，判斷了各人所得的事實和知識之後，才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美國學校裡的教師們幫助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諸如此類的經驗。

這種教育的結果，使美國人民具有十分熟練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注重個人和別人合作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這些本領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美國參戰後的二年半中，受訓練學習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萬以上。美國工廠裡今天有好幾百萬人是短短的幾個月以前還沒有夢想到會在工廠裡作工的人。現在美國武裝部隊有一千二百餘萬人。兩年以前，這些人之中大多數還不知道如何使用現代化武器。但現在，他們都學會了。他們都明白為甚麼要學習作戰所需要的新的技術。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能力

已經救了國家。

這種教育制度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小學和中學是戰時許多社會活動的中心。美國小學生已經收集了幾百萬噸的廢鐵、廢橡皮，廢紙和廢油脂。學校對戰爭盡了很多的力量，而且賣出戰爭郵票和公債票，募集了鉅額的款項。中學的課程已經改動了，改得更適合於美國青年進入軍隊或工廠服務。美國青年滿了十八歲的，差不多全部進軍隊服役。專科學校和大學，沒有一所是像平時一樣照常開課的。美國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時期內作這些變革，因為它是由負責的和受過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分，使學生的知識和品性的發展，成為民族的力量真正的工具。

的確，美國民主的基礎是自由和民眾化的教育。這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正在勝利，因為民主國家不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體公民。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經停頓很久的復旦師生合組的憲政研究會召開了第七次的座談會，座談的題目是「青年與憲政運動」，同時，並由周毅城教授講演「青年運動在歷史中的地位」。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這是周先生全篇演說的結論。在結論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決條件。有政治民主，才會有經濟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從事民族解放的戰爭，「所以」，周先生強調的說：「中國青年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政治民主。」……

在說到國內政治方面的情形時，周先生表示他不願多說。但是他說：我們現在連政治民主的起碼條件如人身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都還沒有，距離「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僕」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遙遠得很了。

周先生的話講完以後，就有一個同學起來發言，提出中國青年應做的兩件反省工作：肅清自己的奴才性和為新中國的需要而努力。另一個同學則指出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說：「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這天到會的除周毅城先生外，還有張志讓先生，陳望

道先生，張孟聞先生等以及同學近千人。那位同學的話剛一講完，校長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結論，把這成千熱誠關心國事的同學散了。

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誰輕輕的說了一句：「嘉陵江月為誰明！」黑壓壓的一股人流，靜靜的向校門外流去。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重視青年

今日的報上，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舉行青年大會，生動而熱烈；一是英國商務部大臣達爾頓氏的演說，對英國政治有所評述，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蓋居高位者，老年人過多，青年人則殊缺乏展其抱負之機會」，他要求能重視青年。

達氏這種由熱愛祖國所指出的批評，我們讀了很感動。平常有些人也都說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寶貴的力量，然而實際上卻未能積極使青年的純潔進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發展，這實在是一大損失。這情形實在並不限於某一國。

——《新華日報》短評 1942 年 10 月 20 日



第七輯

私人資本須自由發展

唯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

抗戰勝利迄今十個月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切經濟措施，不獨未能幫助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在物價波動，通貨膨脹，交通阻塞，外貨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匯關稅政策與官僚資本壟斷諸方面，給予民族工業以打擊，造成民族工業極其嚴重的危機。……說明了今天要在國民黨獨裁政府統治下來挽救民族工業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像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廣大解放區所採取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措施，才會給我們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一條新道路。

沒有去過解放區的人們，往往誤信那些頑固分子的惡意造謠，認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放區的經濟措施，不是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破壞資本主義。理由是共產黨的理想和目標，應該是實現社會主義，怎能是發展資本主義？其實，這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甚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

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的，我們的資本主義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發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理論上，主張在目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實上，在一萬萬以上人口的廣大解放區內，採取了一切措施，促進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向上發展。

在這裡不必引證許多老解放區私人資本發展的事例，只舉幾個新解放區，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後的數字來看罷。例如張家口在日寇佔領時，該市兩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閉，解放後，僅僅兩個多月，不僅舊的商號紛紛復業，而且有新的商號開張，並比戰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該市現在繁榮起來的商行，已達二千七百餘家。河南的安陽、焦作等地的煤礦產量，比敵偽統治時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後都相繼復業，四萬失業工人，盡都有了職業。……從這些零星數字中，我們看出了解放區工商業發展的特點，就是在勝利後，不僅過去倒閉的全部復了業，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廠與商號增設，這正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工廠倒閉、商號停業，成為一個相反的對照。

我們再引兩個美國記者的報導來證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記者寶丁在訪問張家口後發表談話說：「張市為八路軍解放後，雖只兩個月，而社會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員，他們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許多工廠都很快地復工了，真引起我的欽佩」。又如勝利後特往解放區作五個月旅行的美國記者博樂報導解放區的經濟實況時說：「在解放區：（一）私人生產企業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勵；（二）地主經營仍舊，所不同者，只是過高的田租由佃農要求減低而已；（三）外來的中外資金極為解放區所歡迎；（四）解放區的政府除對敵偽的產業外，並無沒收任何財產的企圖」。博樂並且報導在解放區不論資本家、地主也一樣熱心工作的情況說：「在解放區從事工商業的資本家也很熱心。我和許多商人、地主、製造商談天，發覺他們熱心是有理由的，因為共產黨人雖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為目標，但同時，他們也給地主和製造商以利益」。

這些引證，還說明了解放區工商業的發展，並不等於一般的通常發展，而是具有迅速發展的趨勢。然其所以能夠這樣發展，又是有深遠的原因的。這就是：

第一，因為解放區首先有民主的政權，實行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使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了農村廣大群眾的購買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

第二，因為解放區民主政府還積極地實行了各種正確的經濟措施，例如實行貿易自由政策，廢除了敵偽統治時

的種種統制、配給等對貿易發展的限制；又實行合理稅收，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大大減輕了工商業的負擔；更實行發放貸款，解決了工商業家的資金困難，同時還注意運輸事業……來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見，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必需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時刻為人民服務，處處為人民打算，並能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個條件，正是解放區已經做到、並且還要繼續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說來，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確實是很明顯的了。

——《新華日報》1946年6月14日



戰後私人資本的機會

——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答根舍·斯坦因問

戰爭結束後，恰當地對待資本是一件互利的東西。這不但適用於中國資本，而且也適用於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我們需要發展工業。我們要用國家之間自由貿易原則，去取代日本使中國殖民化的原則。我們應該用發展現代工業，提高農民生產力和增加購買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業發展、惡化農民生活條件，以至導致他們對發展生產失掉興趣的政策。用工業進步代替工業落後，（這是指國民黨現在執行的經濟政策）我們預期，取得土地以後的農民，對提高生產會更加關心。

——《美亞文件》第690～717頁



「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就是自取滅亡」

——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國人民實際上是農村人口，是農民。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當中，農民至少有三億六千萬。知識分子、高級職員、商人和資本家只佔上面薄薄的一層。農民就是中國。

像中國這麼幅員遼闊而又落後的國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必然是農業佔優勢。

因此，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中國將來的基本問題。中國除非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基礎，否則是不能成功地實現工業化的，因為農民必須要為這種工業化的產品提供真正的市場。

我們以日本為例，由於它是在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去謀求工業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隨帝國主義和向外侵略。它沒有從解決本國的土地問題入手。

華萊士和其他一些美國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中國農民》這篇文章的布魯克斯·阿特金)對中國的這一基本事實表示出一種清楚的認識。

中國農民的基本要求是從封建的租佃關係中解放出來，不再依賴地主資本家貸款和收購他們的產品。這就要進行土地改革，還要實行民主。農民必須獨立自主，有權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

從總體上看，農民和全中國人民都不準備實現社會主義，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也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

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國民黨與中國人口中的廣大農民群眾沒有任何聯繫，它是一個由軍人和地主集團組成的政黨，這些集團通過一種保守而又毫無創見的官僚主義實行統治。國民黨對於根本改善農民的狀況，實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殘餘這樣一些事情，過去無所作為，將來也不會有所作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為這樣做了就會侵犯國民黨主要支持者的權力基礎。

國民黨由於懼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這樣，它就成了一個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體。這就是國民黨不能從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徵。

國民黨不願解決土地問題，藉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來作為工業化的基礎，它就轉而採取硬性規定的、國家支配和控制工業發展的原則。因此，它在國內的政權方面，或在國外同俄國和其他鄰國的合作和友好關係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個牢固的基礎，它就傾其全力發展「國防工業」，並迷戀於權力政治的危險遊戲。

可以預料，在這些政策當中埋伏未來的國內和國外的衝突。如果它堅持這種政策，那麼這種預料一定會成為現實。在這些政策指導下，國民黨不能解決中國國內的基本問題，不能引導國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為遠東的一種穩定力量。而這些政策如果沒有國民黨內部的一場革命，沒有一個全新的領導集團，是不可能改變的。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則是一個代表中國農民利益的政黨。它制定的綱領是要使農民問題得到民主的解決：減租減息，實行累進稅，扶助生產，促進合作化，從根本上實行民主政治。在這一基礎上，隨各階層人民在團結的而不是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資本主義企業，中國共產黨就將成為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健全的工業化的促進力量。這些就是實現和平和穩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證。

正如在中國的前途上不能忽視農民一樣，也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想要忽視它，但是它的槍炮不能給它帶來勝利。總之，絕大多數戰士像中國人民一樣都是農民。因為我們是為了人民，而且來自人民，所以我們是代表中國人民說話的。人民從我們的經歷中認識了這一點。

……

召集國民大會，這是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美國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將關閉和平的大門。一旦召開國民大會，則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們將進行戰鬥，因為我們不僅為目前解放區一億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而且為全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一 不民主的經濟和政治

中國現在既需要經濟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事，因為沒有一定形態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而沒有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也將無從保障一定形態政治民主的。——這並不是「畢其功於一役」論。因為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人並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甚麼形態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去認真檢討現實的情況，從現實出發來提出問題，卻從社會主義的空論來自娛，以為實現經濟民主就是意味實行社會主義。

但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來看問題。

從實際上看，我們只能斷言說，我們現在無論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民主。我們處於比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更落後的情況中。

從經濟上看，現在的廣大人民毫無私有財產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好的命運。他們的產業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權官僚資本的排擠和統制下面，談不到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料被控制，市場被壟斷，自由的民族資本家的企業，要按照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發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中，有一個就其本身範圍而言是公平的法則，誰能提高生產力，

提高產品的質量，誰就能在自由的市場中取勝，這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競爭，因此它在一定時期能有促成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當腐敗的官僚資本挾國家權力而猖獗的時候，就不會有公平的競爭，於是正規的民營企業只能破產。自由資產階級要正當的由企業經營中來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積蓄資本是不可能的。結果也就必然造成生產力停滯甚至降低的現象。

由此可見，經濟的不民主，既有害於工人，也有害於一切小私有財產者(包括農民)，同樣有害於自由資產階級，而只是有利於寄生在農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國主義勢力的買辦和那操縱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由此就產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關係就是以不民主的經濟關係為基礎，而其目的也就是為了鞏固不民主的經濟關係。

反映到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樣表現極端落後的不民主的狀態，廣大人民群眾在實際的生活苦難中，沒有過文化生活的可能。他們的生活慾望被遏制，他們的一切知能都集中於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這一件事上。特權者不承認勞動人民有獨立的人格，以為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個人的個性；而勞動人民在同樣的苦難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縛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發揚其心意和才知。這種個性被壓死的狀態，決不能產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獨立的經濟生活有密切的關聯的。封建時代很少有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就是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給於統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膽的人才

會有反對權威的思想。縱至現在，社會上真正的自由職業者(甚至於教授)很難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發揚自然是受盡摧殘。廣大的人民憑自己勞力，所得到的一點最卑微的財產都沒有保障的時候，那種把個人的一切都歸於命運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這各方面都極端表現不民主的落後性的時候，中國要進一步，就必需實現政治民主，又必需實現經濟民主，那是斷然無疑的事。就整個社會說，實現政治民主，還是為了實現經濟民主以求社會生產力解脫封建性的束縛，而能加速提高；就廣大人民的要求說，假如政治民主並不能保證每一個人能夠過自由的經濟生活並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沒有經濟民主，則政治民主將只是空洞的東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畢其功於一役」論者不同，我們必須由認真地考察現實而指出現階段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方向到底是甚麼？

二 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為甚麼現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

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並不意味一時的讓步，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積極政策。這正是因為現實條件下，

廣大人民的私產並沒有保障。農民沒有享受耕種的收穫的保障，工人沒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保障，自由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合法的利潤的保障。實行種種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財產的保障，那難道不是一個極大的進步麼？

拿古代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來看，固然在那時代也有私有財產，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實際上，全國的一切財富其實都屬於專制統治者所有。在國家的名義下，人民的任何產業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剝奪。所謂「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就是侵蝕人民的私有財產權的最通常的辦法。只有皇帝、貴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以一切手段來吞併人民的財產而過其不事生產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會的條件而前進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護私有財產這一個問題。

不同於獨佔資本主義時期，在那時期，由於生產力已因生產過程的高度社會化而提高，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獨佔資本家的手裡，因此就不能夠提出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倘若使社會財富(主要是生產手段)分散給眾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會生產力。所以這時就必須提出社會財富的社會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但在封建社會條件下，生產過程一般地還是私人性的，少數特權者用強制力量來併吞社會財富，所以社會公有制不可能實行；而使財富分散為多數人所分有，那正是促進社會生產力前進的唯一方法。

所以實行種種措施以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那是在現

實條件下所必須爭取實現的經濟民主。

——必須消滅利用特權勢力以侵襲人民財產權利的活動，所以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府」，「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必須切實地保障農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障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息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

——必須使民營企業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對他們的障礙，所以「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與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與推銷產品的便利。」

——也必須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也就是要「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均引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實行了這一切措施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範圍，但是使得人民不至於擔心自己的財產橫遭摧殘和剝奪，使得農人能夠享受自己的勞動收穫，使得工人解脫超經濟的剝削，逐漸提高生活水準，使得民營企業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競爭」下被扼殺，這不是經濟民主麼？

要徹底實現這樣的經濟民主，沒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國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須能夠認真實施這一切經濟民產的做法。假如是單獨由自由資產階級專政

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那也還不可能認真照顧到工人農民的利益，而且中國自由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也將使他們不能夠撇開工農力量，單獨完成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任務。所以中國的必須實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也就是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民主政治。

實現了這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一定能夠「為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對於這，我們是否害怕呢？一點也不。相反的，保護私有財產，扶植私人資本，正是對中國有利的事。

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徹底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必然的後果。固然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資本主義，但那是買辦性的。並且和封建剝削勢力相勾結的資本主義，是憑借強制權力以掠奪人民大眾，損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反對這種資本主義，但不反對在以解除封建壓迫與民族壓迫為前提而生長起來的自由的私人資本主義。在這兩重壓迫去除後，就產生了私人資本能夠獨立自由地生長的可能，解放了並且漸漸富庶了的農村更是為資本主義開闢了廣大的市場。

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不是維持獨佔資本主義而是鼓勵自由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非常薄弱，並無力實行經濟上的獨佔，除非寄託在買辦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獨佔上。在取消了這種政治獨佔後，資本主義就會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還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提高了生產力一樣。

更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是既要保障私人資本，又要保障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小私有制也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不過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不斷地犧牲這些小私有者而進行的。在中國，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一時還薄弱，不能在全部國民經濟佔絕對支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初步條件後，將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組織起來，提高其生產力。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所將實現的經濟民主，雖不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和歐美各國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將按照民主主義原則逐步地完成徹底的解決——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剝削的封建殘餘將徹底消除，不像歐美的許多國家中那樣，在這問題上半途而廢。勞動人民的小私有制將在經濟上獲得發展的便利與在政治上獲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像在歐美許多國家中那樣被犧牲了作為獨佔資本主義生長的肥料。這是對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經濟民主，和那以人民大眾為基礎的政治民主相輔而行。由此我們也就不必擔心，由廣大發展私人資本將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形成對人民不利的獨佔資本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倒可預見，當人民的私有財產一般的受到保護和自由的資本主義擴大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必能加速地增長；在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化完成的時候，就會產生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可能。

三 「畢其功於一役」論的真相

社會主義不是讓人們在口頭上空談的。能實行社會主義不能由主觀願望來決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來決定，而要根據客觀現實，根據廣大人民實際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來決定。廣大人民現在所要求的是甚麼？他們苦於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兩層束縛，他們苦於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農民要求減輕負擔，要求土地；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這些要求都沒有包含社會主義的內容。只有在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時，人民才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在現在的條件下，「畢其功於一役」論不過是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話而已。

但我們要知道，「畢其功於一役」論者其實並不都是認真想在現在實行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說這種空話往往不過是掩飾其不肯和不敢認真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任務而努力。譬如，為了避免觸及最現實不過的減租減息的問題，他們就空談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為了使自由的私人資本不能充分發展，他們就空談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實質上是前資本主義性質的獨佔壟斷，卻自命為比自由資本主義更進步，以此為借口來圖謀扼殺民營企業。——這就是許多「畢其功於一役」論者的真相。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脆弱，他們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傾向於「畢其功於一役」的說法。他們不提出正面

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害怕遭遇無產階級的反對。其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為從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下解放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那是既對資產階級有好處也對無產階級有好處，所以階級矛盾是可以調節的，要使之調節，卻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資本主義裡加上一點社會主義。只要私人資本保持他的獨立自由，並且使其生產事業適應於人民的需要，更照顧工人的經濟權利與自由權利，那麼它的廣大發展決不會遭受人民的反對。假如怕人民，空談社會主義為點綴，實際上卻投到了封建買辦性的獨佔資本的懷抱中，那說是自己走向了絕路了。

——《群眾》週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為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為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發表「對於當前經濟問題的意見書」，全國工業協會亦於日前舉行座談，提出很多極其寶貴的主張，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實在是一件使人十分興奮之事！

今天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並不是偶然的。抗戰打了八年，後方的生產事業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縛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掙扎。勝利到來了，一些碩果僅存的工廠，不但未曾復醒，反而在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遇到更嚴重的災難。中小工業不要說，就連中國興業公司、渝鑫鋼鐵廠等十餘家規模較大的工廠，亦在這個時候，頹然倒下了。政府對於這個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購生產的貸款，變為收購機器和設備的貸款。這種辦法意味當局所重的，不是怎樣為工業界打開一條出路，而是樂於為他們送終！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垮了不要緊，有強大的外國資本可以來中國投資；中國的民間工業垮了不要緊，有居高臨下與外國獨佔資本結不解之緣的官僚資本可以在各重要生產部門勃興起來。在當局的這種打算之下，中國民族產業的生存自然發生問題，也就使他們不能不起來抗爭了。「苦幹不問外事的作風走不通了（李燭塵先生語）。」

今天的中國經濟的確使人擔心的。官僚資本和外國的獨佔資本貪婪地進行無情的襲擊。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原來是以輕工業為依據的，但現在收復區中的棉毛絲麻等，

幾乎全部國營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謂國營，其實就是官僚資本的「官營」。因此，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工業將來會變成日本那個樣子，全國的經濟命脈由幾個大財閥所獨佔。這種看法自有其中肯之處，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戰前的日本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個大財閥並未成為另一個國家的獨佔資本的附庸。中國的情形，恰恰與此相反，如果離開外國獨佔資本之支持，則中國的官僚資本是不容易發展到支配與操縱地位的。所以假如繼續在買辦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國經濟就可能變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體。

中國將要走甚麼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對不民主或假民主的鬥爭，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自由的國民經濟對官僚資本和外國獨佔資本所壟斷的半殖民地經濟的鬥爭。中國的人民大眾（連民族企業家在內）爭取前一條路，而少數反民主的買辦官僚，則想把中國拉回去走後一條路。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一心一意和中國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經營三者組成的」。二個月前，周恩來同志在星五聚餐會上亦指出：在這三種資本中仍然是私人資本佔多數，今後中國必然要經過一段保護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我們要反對的是官僚資本、壟斷資本與侵略資本。（反對侵略資本並不就是反對利用外資，我們是在不妨害中國主權之下，歡迎外資的）我們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的態度，是和全國經濟界（特別是民族工業家）一致的。

或許有人把我們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的主張，當作在野黨的宣傳吧，過去數十年的教訓，特別是當局這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訓是這樣的，誠然使人民對任何人不敢輕信。我們的的確確認定中國必須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我們的政策處處著眼這一點。在陝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中，新的富農經濟是在農村中發展起來了；一些地主的資金轉移向工業投資了，中小型工業大量地在每一個角落長大起來了。我們在民主的解放區中已經這樣做，我們決心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國其他各地去。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的內戰與封鎖的話，我們是歡迎後方與收復區的經濟界人士，去參觀，去看一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做的。

正如政治一樣，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一個轉扭的關頭。我們歡迎產業界的代表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為經濟民主而鬥爭；我們歡迎全國經濟界的人士在會外在各地為這個問題而努力。在這裡我們和你們的見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個政治民主的中國不能不是一個經濟民主的中國。我們將同心協力為中國政治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新華日報》社論 1945 年 12 月 31 日

第八輯

天賦人權，不可侵犯

切實保障人民權利

從來的革命運動都是人民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眾，給不給民眾以民主自由。對於英勇鬥爭中的中國，民主始終是團結與進步的基礎，因為離開了民主就不能團結全國人民起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沒有民主也就沒有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這是為甚麼邊區施政綱領明確的規定：「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責成當選為行政人員的共產黨員應堅決執行之，並指出「人民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國主義借戰爭的掩護把人民從多年鬥爭中獲得的民主權利剝削殆盡的時候，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實行高壓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財產、自由沒有一點保障的時候，在陝甘寧邊區從過去的民主傳統向新民主主義的路程前進的時候，這樣的尊重民主自由與保證它的

徹底實現，是具有怎樣偉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對犯過錯誤而願走向光明的分子採取寬大的態度，禁止不經過法定手續來逮捕、審問、處罰任何人，反對把人拖到卑鄙無恥的道路上去，用這些事實來使得人權得到充分保證。我們決不空談保障政權，而是真心誠意地要人民起來參加政權的管理，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機關的職權與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並實行三三制，保證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中的人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我們決不空談保障財權，而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做到保護私有財產，獎勵私人企業，嚴禁隨意動員徵發，實行合理的統一累進稅收制度，維護農民從過去土地革命中獲得的利益，保證佃農債戶向地主與債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樂業。這樣就不只是給人民帶來了美麗的希望，還真正地要他們享受到新民主主義的果實。

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邊區過去早已注意保護，今後仍當循此前進。只要是抗日的有利於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言論與出版物，無論是出自任何抗日黨派與團體個人，都有發表與出版的自由，政府還給予使用會場與印刷機器的便利條件。在這裡，不會有思想的統制，我們鼓勵自由研究，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歡迎邊區境外願做抗戰工作人士來此開辦學校，

設立出版機關，組織文化團體，並且給予必要的幫助。人民不僅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還有武裝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怕人民的組織與活動，祇怕他們不能積極動員起來。我們要保障的居住與遷徙的自由不是消極的，因此我們幫助外來移民解決他們各種困難，保護因革命行動被迫來到邊區居住的人民，救濟流亡學生與災民難民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自由地生活，還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這樣，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權利。讓全國人民看到我們高舉起來的民主旗幟，是飄揚多麼鮮明的色彩！

僅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夠的，公務人員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還是不夠的，必須人民自己珍貴這種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才能獲得的權利，要求它在邊區得到切實的保障，並把它推到全國的範圍裡去。

當廣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權利時，它不僅成為物質的力量，還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保障人權

「除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處罰……」。這是二屆參議會通過，經邊區政府命令公佈的「保證人權財權條例」規定得極明白的。

但是，在延安，卻發生了不幸的「學療人命案」：學療的總務科長、秘書和管理員，竟然把運輸員劉世有捆綁起來，以致釀成人命大案。

從這事件裡，我們看出，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碼條件；還不曉得，隨便捆人押人是應該肅清的「游擊作風」之一。

這類違法事情，在邊區恐怕不只這一件。我們願意喚起社會人士嚴重注意它的揭發與糾正。讓我們共同努力於革命秩序的建立與鞏固！

——《解放日報》1942年1月27日



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李新

聯合國憲章裡規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國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實現蔣主席宣佈的四項自由。偏偏在這時候，有人高呼自由萬萬不可行。這種意見，顯然違反民意，志在維護國民黨一黨政府的現狀。

《和平日報》昨天的社論，說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聽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國家軍隊』與國家軍隊對立，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完全不合事實。這並沒有說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裡。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討論中，中共及其他黨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見，這裡不多討論。要說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國民黨黨治黨軍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請以事實來回答！

看吧，「衣冠不整」的人，還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內戰；老百姓開會，特務就去搗亂，動不動就要拆草棚子。這類事情數不清。人民「安居」了嗎？大學教授逢場就去擺地攤、賣東西，工人時時會失業，失業後又不准要求救濟，還要抓代表；官辦工廠也拖欠工資，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樂業」了嗎？這是因為軍隊沒有國家化呢，還是因為人民的自由權利被國民黨一黨政府剝奪得乾乾淨淨呢？只要顧事實的人，都將異口同聲說一句，不能安居樂業，是因為沒有民主自由啊！

他們又說了，英美蘇都沒有實現民主理想，中國來實

現，就「不切實際」了，更何況中國是在訓政和憲政之間呢？我們再來看看事實吧。英美蘇等民主國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利，中國不必「開風氣之先」。可是，曾否追隨「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之後了呢？他們又提到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匱乏」、「不受恐怖」兩大自由，都「不能便沒有疑問」。反對自由者的話，是夠露骨的了。在民主國家，罷工遊行示威，幾時未曾做到？舉美國為例，罷工不僅在發展，政府還根據康納利法案，承認罷工是合法的。遊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還可以請政府派警察保護。至於教授治校，不受黨化，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現在的西南聯大，就是經過教授會議來處理校務，這與其說是理想倒不如說是教育上優良制度的確立。說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獨裁者外，倒還沒有聽見有人反對過。現在重慶還是第一次看見公然對「不虞匱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問。如此說來，人民只應有匱乏的自由了，窮人王正興必須賣兒子，陳望道教授必須擺地攤，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匱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業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吳金山也只有被押起來了。特務橫行，便成了政府執行恐怖自由了。正告發表這些違背人民利益、維護獨裁專政的謬論的人們，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當局，匱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條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

走了。人民要求和爭取四大自由，是沒有力量壓得下擋得住的。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①前天在憲政座談會演講三種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他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並勸勉大家要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我們讀了孫哲生先生演詞，覺得語語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願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國廣大軍民都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對日抗戰，大家都認識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最主要的任務，也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說的：

「這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這一認識，因之能在七年艱苦抗戰中流血流汗，歷盡艱辛困苦，總是極盡忍受之能事。許多國際盟友，只要一度來華考察過，莫不為我們軍民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這是最好的證明，中國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

但是民族自由與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是分不開的。過去對這一點，見解龐雜得很。孫哲生先生的演講，特別舉出總動員的例子，舉出盟邦募債成功的例子來說明：「要使人民力量動員起來，必須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進國家民族的自由」。這種見解儘管如孫哲生先生自己所說，被有些人所討厭，認為是「尾巴主義」，但是真理總是真理，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會舉起雙手來贊成……。

孫哲生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說：惟有我們的敵人日本

和德國，才是只講一種自由的，他們的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會積極作戰。「有自由的國家不可侮，沒有自由的國家，雖暫時強大，最後還是要失敗。」這兩句話，更是不移之論，目前盟軍勝利的捷報，正在印證這個真理。

沒有問題，三種自由在今天，從其重要性說當然是民族自由為主；可是沒有政治經濟自由的配合，民族國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這種血肉相聯的作用，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抗戰七年的今天，還待孫哲生先生來闡揚其重要，真要不勝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從三種自由互相的關聯和作用，來說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時孫哲生先生從時間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經濟自由並不能一概推移到戰後去處理。

他指出：英美過去有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所以雖在戰時，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擬戰後方案。這是別人的例子，說明雖在戰時也不推諉應該做的事情。其次從戰後環境說，大戰一旦結束，各國紛紛復員，積極振興；我們國土遭長期大戰破壞之餘，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時再談這些問題。這樣的說法，也正反映了事實的需要。

孫哲生先生這些意見，在這國際民主潮流和國內人民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提出，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

他給每一個民主主義者指出了獲取自由目標的方法和道路。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

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社論
原題《孫哲生先生論三種自由》

① 孫哲生，即孫科(1891—1925)，廣東香山人，孫中山之子。時為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1949年退居台灣。



自由不是專賣品

抗戰是為了民族的自由，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專賣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業。誰也不能自由到說：這玩意是我的，高興給誰就給誰。更不能自由到說：「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1月22日 短評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標尺

昨天本報和別的幾家報紙都刊載了一段本市新聞，說是朝天門屠戶張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隊的幾個警士借口捉賭，劫去錢財。事後張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個是保長)，反被拘押毒打。這十幾個警士是派駐民食供應處倉庫的庫警，依理根本沒有在夜間侵入民家捉賭的權力。出事時，當地保長簽署證明書，證明張家並未聚賭，且有衛戍總部稽查處水上檢查所人員到場目擊並無賭具，則捉賭之說，顯屬無稽，但縱然真是賭犯，也絕對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長一起關在警察局裡，毒打成招，而且還不准其家人探視，比對付江洋大盜還厲害！所以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無怪乎張德操的家屬和該街居民百餘人要到衛戍總部王總司令公館門首伸冤，又攔截汽車、呈述冤狀了。

這樣的事也許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受冤屈，被栽誣，遭虐待，簡直已習以為常了。但正因為這類事情一向層出不窮，我們更不能不喚起社會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報》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裝店被一群也以抓賭為名的軍人衝入，損失了數十萬元的消息。軍警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而衝入民家，人民有甚麼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財產可以這樣地被劫掠，還有甚麼私有財產的保障之可言？對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隨便，又有甚麼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財產

的自由權利，叫平民怎麼能安居樂業？

據說，這一案的被害人家屬現已聘請律師向法院起訴，衛戍總部王總司令對此事也極為震怒，想來法院與當局對於這樣一件事，應該能很好的處理吧。

由這一類事件，我們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舊布新實在不容稍緩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較有保障，又經常施以衛國愛民的教育，經常督責他們以愛護人民為天責，就不至於發生這種騷擾民間的事情。在張德操家保安隊的一個隊長曾向到場的衛戍部人員說：

「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大家不要為難」（《商務日報》所記為「我們軍警原是一條陣線」）。這話分明是把軍警看做是在一條陣線上共同對付老百姓，豈是衛國愛民的軍警說得出口的？又假如現在各方所主張的《損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頒佈，且根據此法，嚴辦幾次，則雖有不法之徒，也會有所忌憚，不敢胡作亂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佈的提審法已經實施，並且法院對平民訴冤給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為保障平民而設，那麼雖有冤獄發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像張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紙提審狀，就可很好地處理了，何至於在今日的陪都街頭還要演出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擲輿告狀」？

保障人權，嚴禁非法拘捕，實施提審法，改革司法，這都是在《和平建國綱領》中明白規定的，都該快快實現才好。

假如實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個個能安居樂業，

免於強暴侵凌的危險，那麼民主還是落了空的。所以我們斷不能把張德操案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事件看做是無足輕重的社會小事。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2 月 8 日



保障人民自由的開端

國民政府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日，宣佈了《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四條，其中第一條就是關於保障人民自由的。這個宣佈深得各方面輿論的歡迎。不過我們也需要指出，政府當局在抗戰中和抗戰結束後宣佈保障人民的自由已經有好幾次了。遠的不說，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當局就曾頒佈過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條例，最近的是在三個月前的雙十會談紀要中，當局又一次表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但是政府當局這種諾言，並未兌現，其中道理何在，現在我們也不必再來深究。無論如何，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國家中人民所應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權利，政府無論用甚麼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國家中是總不能容許的事情。我們自然希望這回不再落空，當局如果真有與民更始的決心，就不應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條件，而應立即切實地做到。

政府當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其實是不難的事，無論如何，這比束縛人民的自由權利要容易得多。過去政府當局為了限制和妨礙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殫精竭力，用盡了一切辦法。既訂立種種法令，使得人民動輒得咎；這還不夠，又另外想了許多辦法，設立許多機構，以補法令之不足。本來，在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都是「公

僕」，這些「公僕」都應該為人民服務，可是在中國竟有為數很不少的「公僕」，專門以迫害人民為本領，難道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不好麼？國家的財政一向都很困難，但在拮据的國庫中卻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卻用來殘害人民。譬如拿過去大後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聞檢查所和圖書雜誌審查處說吧，每一個這種機關中的人員，都比一個大報館的編輯部還多。現在這些「公務人員」又紛紛到「收復區」去辦同樣的事了。而在大後方各地，航空郵電檢查員至今還在忙於檢查和沒收。為了控制紙張、印刷所、會場、出版所，當局所費的人力和財力更是不可勝計。官辦的出版所，雖然出版品不受歡迎，但仍無限度地賠錢，無所顧惜；官辦的團體，雖然得不到群眾擁護，仍大量地給以津貼，這都無非是出於包辦一念，要使人民的出版和人民團體活動困難。還有龐大的特務機關及其所屬的集中營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從國庫中開支多少經費。這一切經費從何而來，還不都是人民的完糧納稅的聚積麼？

以人民的血汗來養活許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來創立許多壓迫人民自由的機關，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合理的事麼？

當局花了這許多人力財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結果只是證明了一句老話：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民到底是不會在強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進步意志究竟還是縛束不了的。現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轍的表示，那麼第一步做法就應該是立刻放棄一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為了束縛人民自由而設的法律、辦法和機關。這是最不花錢，最不費力的事。只

要當局有決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決不像束縛人民要費那麼多的手腳，花那麼多的人力財力。

蔣主席所宣佈的第一條關於「人民之自由」說：「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由此可見，政府當局也已承認蹂躪人權的特務機關不應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應再有效了。在這方面，人民也應該幫助當局來考慮，哪些法律條例、哪些措施、哪些機關都是殘害人民自由權利的，一一公開提出。事實上，人民已經這樣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現行出版法應該廢除，對收復區的民間出版事業的限制法令也應該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議的確有事實根據，符合民主的原則，政府就應立即採納，立即實行。取消過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鐐銬，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實的開端。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1月13日



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 論張君勳先生的建議案

憲政實施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裡，通過了張君勳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為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為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

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除了上述三項外，包括選舉權、思想信仰自由等等在內。英美更有其議會等等。就是這樣，英美人民也還認為目前的民主制度缺點還多，還不廣泛、不充分，連羅福斯總統也主張在經濟民主的基礎上擴展政治民主，使民主制度帶更廣泛的人民的性質。我們在中國談民主政治，還是把它當作要建樹要實現的東西。而且，我們現在談實現民主政治，不是單純的因為人家如此，我們也要來搞一下，裝裝樣子。也不是單純的添為民主國家聯盟的成員之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強。主要的還是因為新的民主主義已成為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們不能實現民主政治，我們就不能充分的動員、積極的奮戰、親密的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我們該知道，一個國家在戰後世界民主大家庭裡的地位，是以戰時努力的程度來決定的。這裡說的戰時努力的程度，應該包括打仗的努力和民主的進步。所以，儘管還有人反對民主，民主已經和戰爭的勝利及戰後的和平分不開了。儘管中國的民主政治要根據實際情形、循自己的道路發展，可是，人民必須有民主權利，民主必須以廣泛的人民為基礎，卻是不能改變的原則。這樣，人民必須獲得基本權利，並予以保障，難道還有懷疑和猶豫的餘地嗎？

為了抗戰勝利，為了戰後和平，為了政治的進步，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2 月 1 日

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

國防最高委員會在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廢止的三十八種法令中，屬於集會結社自由的，有十四種之多。其中應由國民政府明令廢止的有《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共三種，規定由原公佈機關廢止的還有十一種。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國府及各原公佈機關的廢止這些法令的明令。想來總該馬上能做到。讓我們來看看究竟為甚麼這些法令要廢止，廢止了對人民有甚麼好處。

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產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我們可以指出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首先，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制度的束縛。本來集會結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論性質，地點及參加者的職業性別如何，事前均無須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假如參加集會結社者有違犯普通刑法的行為，則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則，聽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國就與這完全兩樣：「各種人民團體組織之成立，無論下級團體或上級團體，均應先經政府之許可」（《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四條）。在《人民團體

開會規則》第二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每次開會應於會期前將開會事由、時間、地點等呈請該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官署……」。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制，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准」，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為。可是，現在既然廢除了這些法令，那麼這種不合理的「特許」制度就不應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會結社，不受單行法令的束縛。

其次，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所謂《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就是在民國二十九年為此目的而設的。規定警察可以有權隨時命令一個集會一個人的演說中止。又如《非常時期團體組織綱領》第一條上規定：「各種人民團體，除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外……並受軍事機關之指揮」；同時也有「明令解散」之權。這樣，凡主管官署認為不適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難或解散。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時就根本沒有解散人民集會結社之權的，只有認為某種集會可能發生騷亂時，英國警察才可以稟准內政部，當場宣讀騷動法，使會眾自動解散；假如警察機關判斷錯誤，還須負一定責任。美國的法律亦大致如此。顯然地，兩相比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我國的作法是要不得的。這次政府當局既已通知過廢止，當然就是把所謂「主管官署」的這種權力取消了，不再給軍警機關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權利。

最後，由行政官署委派民眾團體中重要主持人員的制

度，也是在這些法令中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比如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十條確定：「各種職業團體應設書記一人，以曾經特種訓練合格之人員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職權是：「負推進各該團體各種活動之責任」。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眾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為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甚麼人民團體呢？這種制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了。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法令未廢止前，中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既受到特許制度的束縛，又隨時會受軍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經常會務也常為官派人員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廢止了這些法令以後，一切束縛人民自由的行為已失去法律的根據，那麼，人民就應該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運用起來。

我們希望，政府方面趕快把這些已決定要廢除的徹底廢除，並且繼續審查是否還有別的同類的法令也應廢止，在這次決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種是關於集會結社的。當局到底準備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佈，因為這三種法令原文也有種種極不合理的定規。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中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請許可」（見該法第十條）。這和已決定廢止的《非常

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中的規定也是一樣的，也應該廢除才好。又如工農組織團體，在《工會法》、《農會法》尚未廢除的今天，也照樣有法可憑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們希望徹底廢除這些法令的束縛；我們人民也盡量幫助政府，蒐集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來，請求政府以明令廢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復了自由的時候，為了運用這些自由，就應該充分運用起來，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種必要的團體會社，並且依法改造和充實原有的人民團體。過去的人民團體，內部的組織與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則的，不適合各該團體會員的要求，就可以根據各該團體會員的意志來加以改造過，使它成為名符其實的人民團體。

集會結社自由的根本權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裡來了，我們應該好好的運用它，發展它，讓他在整個民主建設事業中，表現出更輝煌的成果來。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2月18日



限制遊行，人民自由又遭損害

本市消息

內政部公開頒行一種限制人民遊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據中央社訊，其要點如下：負責籌備遊行的人員，需於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遊行宗旨、集會地點、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呈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須事先送當地「治安主管機關」審查。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致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本市市政府業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有了這個「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更可以隨意於事先防止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了。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3日



快釋放政治犯

政府早經明令公佈釋放全國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囚冤獄，未獲釋放；並且仍有成千上萬的無辜被囚的人，在遭受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慘遭殺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憤！

杜重遠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聞得羊棗先生含冤歿世，中國呵，你的優秀的兒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戰勝利、和平建國開始，國家正在用人之時，他們卻竟屈死冤獄，怎能不叫人感到萬分痛心！成千成萬的學者、專家、教授、進步的青年，無故被捕入獄，受非人的待遇。他們正是中華民族的精華，才高有能的優秀兒女，他們為國家為人民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不但不得國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獄，有些害民禍國的敗類，不但不遭誅戮，反而冠戴優加，橫行不法。這樣下去，民心怎能得乎？

我大聲呼籲：立即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嚴懲虐待犯人、毒殺犯人的兇手！未獲釋放的政治犯應切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為。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

法治與人權

一 立法必須依據人民的公意創制

衡陽《大剛報》：「……一般對法治往往有所誤解，以為法治之極，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實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無，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別，是在於這所謂法，是否最後淵源於民主的公意？這所謂守法，是否執法機關的本身行為也須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極，則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執法機關的政府本身的一舉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義，不在人民是否有法為『守』，而在政府官員之是否依法為『治』。

然則怎樣才算真正的法治？

從政治學的一般的觀點看來，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法治狀態下的所謂的法，最後必依據於人民的公意而創制，故法治必須以民主為其內涵，倘法律最後決定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思，則一切依法，便成為毫無意義……

(二)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進行的公私行為，非依法律，絕對不能變更之。因為法治的起碼要求，在於建立合法的社會秩序，合法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於一切合法的行為，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 真法治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雲南《正義報》：「所謂法治，即建立一個健全的法度，這個法度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議決的，也就是全國上下，都要在這個法度的規範之內行動，任何人不得違反，任何人不得加以變更」。「我們認為今天問題的關鍵，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問題，而是要哪一種法治的問題。因為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這是我們不能不加以分別清楚的。甚麼是假法治呢？我們且看封建時代，同樣有一套法律，可是這個法律是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設的，皇帝及其特權階級是站在這個法律之上的，他們可以執行法律，也可以拋棄法律；他們可以創造法律，也可以毀滅法律。換言之，法律的執行是他們束縛人民的工具，而他們本身則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甚麼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築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而作為民主政治之表現形態的法治，它必須具有這幾個特徵：第一、國家必須有一個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憲法；而從這個根本法所派生出來的一切法律，也為全國上下所一體共守……，第二、憲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權利，而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濫用權力。故國父中山先生說：『憲法者，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在這種原則之下，誠如中山先生所說，政府只是人民的公僕，它沒有無限制運用法律的權力，它必須受憲法的支配。同時，在憲法的規範之內，它必須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得侵犯。第三、選擇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權、修改權及廢止權，應當

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諸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同時，政府當局不僅要受人民的監督，而且人民應有選舉及罷免之權。一名話，要認真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要行使直接民權，使人民獲有選舉、複決、罷免、創制之權。」

三 應有一個可守的法

柳州《陣中日報》：「厲行法治，先要養成守法的觀念及具備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後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夠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為真正有價值的法律」。「中國曆史輾轉於封建專制的束縛之下，政治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時代，『天下一家』，帝王為一切人的主上，即區區一個縣官，也號稱『民之父母』；『聖旨』便是法律，『憲諭』盡成典章。民國以來，諸法紛立，可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至今沒有正式產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則於逐漸養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憲法決不能不早日具備」。「抑法治和治法互為因果，不是說法律產生於先，法治即必然興起於後，須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條文，非另有一種制度，即法治和實行法治所寄託的根本——憲政實行以後，法律固難以發生充分的實效。」「官吏的敢於違法，人民莫從檢舉，就政治的角度視之，又為法治制度的根本——憲政沒有實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誠為實施憲法的張本。但最後完成法治，仍有賴於憲政的實現。二者互為結果，

也互為前提。」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無私

成都《華西日報》：「要想國民虔謹奉法，必須對於立法與執法的各個方面，均須詳為考慮，乃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論，應當以『立德』作基礎。所謂『立德』也者，一種法令精神，應當以最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出發，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時還應當切實體檢國民之實際生活環境，勿使法令有任何千格難通之處。」「其次談到執法，政府當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貫徹，某甲可以逍遙法外，而某乙卻又盡法懲治；或者今日之諾言，明日即成廢話，而不能使人民發生堅強之信賴，則人民之玩法惡習，必難根除」。

五 先決的問題是保障人權

成都《新中國日報》：「要變憲政、談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權；要人權得到保障，則必須有一定的法紀，所謂法治軌道是也……。」「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行得徹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幾番條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違法者有所畏懼」。「要法軌和人權被尊重，必須人民自己起來監督官吏，必須實現民主的監察制度。人民一日沒有權來監察政府、特別是下級機關的行動，則人民身體自由的保障，雖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話」。

「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必須先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違法犯紀的事無論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筆直書，把他宣佈於報紙，則貪頑之徒，不啻得了保障，而社會輿論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開的，我們希望言法軌與人權者同時加以注意」。

——《新華日報》1944年7月20日



第九輯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打開我國的地圖，睜開眼睛一看，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地區，哪裡沒有災荒？單就報紙上發表的材料來看，可以看出災荒是異常嚴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江蘇、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陝、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災，尤其是湖南等地，實在是慘不忍聞。

固然，大部分災區是經過敵偽佔領的地區，但有許多地區都是從來沒有淪陷過的。現在的嚴重現象，是耕地荒蕪，副業雕落，耕牛盡失，農具俱毀，疾病蔓延，難民流離失所。總之一句話，農村的生產幾乎已完全破產，農民的生活已陷於絕境。舉例來說，湖南本是產米之區，現在卻以草根樹皮為食；衡陽附近，每家餓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縣，遭敵偽破壞，至今損失糧食八百多萬擔，房屋三百多萬間，牲畜三十多萬頭，農具七千多萬件。養蠶本為副業，但是飼養用具損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餘縣中，受災縣份竟達五十多，損失耕牛近百萬頭，農具三百多萬件。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情形相似。至於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難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沒有統計，也無法統計。即以廣西一省而言，難民就有三百十四萬四千人，傷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萬餘人。江西傷病的三百五十萬，流離失所的達一百六十多萬。至於川、陝、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風、蝗、雹等災，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農立國」的中國，立在這樣的農村

大破產當中，還說中國沒有經濟危機，簡直是騙人，那只是國民黨一黨領導毫無辦法解決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麼會有這樣嚴重的災荒呢？敵偽破壞固是一個重大原因；然而，為甚麼抗戰期中，沒有能夠阻遏敵寇的前進；這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應該負責的嗎？敵寇投降以後，至今已有七個多月，災荒卻還在擴大和嚴重化起來，這又是誰負責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樹皮草根，卻還有十一萬日本俘虜「卻吃從老百姓那裡『徵』來的米」，這種情形又何止湖南？現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老百姓的米，而且還在受「優待」嗎？而且像山西閻錫山那裡，不是還有收編了的日軍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麥嗎？此外，不是還有待遣返的日僑三百萬人，也在吃米，遲遲不遣送日俘日僑回國，好好供奉他們的，不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其次，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並沒有立即真正進行整軍復員，還繼續保存許多正規部隊和各種名目的隊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慶取締「衣冠不整，拉去當兵」的事情發生。這些也都是只有消費民糧，絲毫也不從事生產的。由於上述原因，更由於日寇投降以後，內戰再起，至今反動派的內戰陰謀仍熾；內戰的進行，以東北為尤烈，所以徵軍糧始終未減未停。以已經破產之農村，負無法負擔的軍糧；加之原有苛雜，原封未動，而物價高漲，竟達無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災荒呢？

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號，到處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賑濟，並豁免攤派，緩徵軍糧二百八十萬袋」，

提出「應停止攤派軍糧，並速調撤別動隊及遣派俘虜」。湖北人士呼籲：「軍糧俘糧負擔太重，縣鄉兩級人員隨意建立名目，苛擾人民，望當局趕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請減免軍糧等，都是身受其苦而發出的衷心呼籲。這也證明災荒之原因，實在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人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一面否認經濟危機之存在；一面對救災則完全依靠外國，本身卻甚麼也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人民沒有事實證明政府是真能為人民的，救災如救火，決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過。現在，應該趕快從治標治本兩方面入手。趕快進行賑濟，免徵軍糧俘糧，抑制物價等，以稍紓民困；同時，卻須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僑，整編軍隊，並用一切辦法使災區災民能夠開始從事生產，安定生活。老實說，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及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飢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3月30日

民主的正軌：無保留地還政於民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甚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複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制；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據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當前的政治局勢，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民主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還政於民，就是把人民應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真正交還給人民。如果離開這四種人民權利，甚至任何人民應有權利都不交給人民，而高唱實施民主憲政，還政於民，那就

未免是空談了。

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佈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至於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廣大的解放區，已經建立了人民選舉的政權，組織了服務於人民的軍隊，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與教育，就是說，人民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已實現了充分的民主，在這些地方，問題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認和保障。只有這樣才能顯出還政於民的誠意。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選舉政府，有權決定法律。合於這正軌的就是民主，不合於這正軌的就是不民主。前者應該得到發揚光大，而後者應該立即改途易撤，真正還政於民，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麼？然而有些不願意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不願意中國從落後進展到民主進步的人，他們空談實現民主，卻不把任何一點自由交給人民；不但如此，對於人民已經得到自由權利的地方，他們還要加以取消，說是取消了這些民主，才能夠實現民主。這樣一來，倒好像政府不由民選，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選舉的政府，人民決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論出版集會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碼條件，但他們認為要求這些條件，是阻撓民主。沒有黨派的合法地位，沒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組織，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但他們認為提出這些要求，就是反對還政

於民。在他們的世界裡，簡直一切都是顛倒的了。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人民作主，這是全國人民無不知曉的事。抗戰八年來，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應得的權利。邊區和解放區一萬萬以上的人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應該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後方和敵佔區人民是沒有得到民主的，現在應該得到，如果不讓他們得到，就是阻撓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國也應該是民主的中國；在民主的中國，取消民主和阻撓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中國共產黨不會模仿蘇聯制度

——1944年毛澤東與福爾曼的談話

在延安，毛恰巧並不是一個難以接近的預言家，不是一切智能與指導的源泉，他的話也不是毫無問題的法律。當然，毛澤東的觀點與建議在形成政策上，有極大的影響，但它只拿來當為討論的一個基礎，而由該黨各領袖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作最後通過，這些領袖們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圖章，因此毛所宣傳的演說，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來，再由他的黨內同志整理過，最後的形式，因此是黨委員會的混合表現，而並非純粹是毛自己的觀點。

他對我說，「第一，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更其願認為我們現在所在做的，有些像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為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為封建社會桎梏的奴隸。80%以上的我們的人口是依賴小塊土地生活的農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屬於窮奢極侈的大地主的。由於近 80%的佃農，須以他們生產品 50%-80%償付地租，它等於實際奴隸所償付的。

「不過為設法解放這幾億人民與用土地改革來改進農民生計，我們不想像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但在 1937 年 9 月 22 日，和國民黨與政府締結協議後，我們放棄了這種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個勸告地主

減租達到合理的數字，而同時向他們保證這些減低了的的地租一定由佃戶正常地交給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我們也和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並且在一互利的協議之下，我們要准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我們自然要做。但有好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我們將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流進來，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因此對於外國投資十分需要。

「講到政府——像你曉得的一樣——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採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國民黨所實行的那種情形。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裡面，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在今天的蘇聯，卻是沒有地主、沒有商人、沒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我要求說明，「那麼為甚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他的答復是，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所說的話，」他說，「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那麼為甚麼，」我堅持說，「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名稱——

「任何共產主義以外的名稱呢？」

他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對於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如果我們是突然改了別的名稱，在今天的中國——以及外國也是一樣——就會有那些人利用它來作資本，要指斥我們想隱蔽某些事實。不，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該改換名稱。我們也無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 哈裡森·福爾曼《西行漫記》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產黨員無權力排斥和決斷一切

毛澤東

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

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的道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針對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甚麼都好，別人是甚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裡，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

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煉，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和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了解我們的主張，了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辦好起來。各位參議員先生不辭辛苦，來此開會。我很高興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2日
原題《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在共產黨裡，祇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裡，祇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
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毛澤東（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裡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為了甚麼呢？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甚麼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要堅決地徹底地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有絲毫留情。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麼，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

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憲政是甚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剛才吳老同志的話，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甚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

甚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說是「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

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佈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門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甚麼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裡一套，手裡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第四個是馮國璋，第五個是徐世昌，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甚麼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

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定，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佈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胡塗了。事情決不是這麼容易的。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的困難，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為甚麼？憲政的困難，就是因為頑固分子作怪；但是頑固分子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比方汪精衛，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裡去了。比方張國燾，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鬥爭會。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斗，七斗八斗，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

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思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

總之，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發通電，並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地做下去，做他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

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 原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第689-698頁 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產黨絕不搞反民主的一黨專政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為，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為，不論他是屬於何黨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為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甚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為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麼，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

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

「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麼，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72—177 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共產黨徹底實踐民主政治

我們在民主方面做了些甚麼實際工作呢？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這在上段已經講過了。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了人權與財權。人權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機關依照合法手續不能任意逮捕，並且必須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審判和處置。財權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人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凡是及齡公民，不分階級、性別、信仰和財產，都有這項權利。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不論在政府與參議會之中，都實行了「三三制」。甚麼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參議會代表也好，各級參議會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委員也好，中國共產黨自己規定，共產黨名額都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選舉出來的代表或委員，共產黨員超過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請辭職，讓給次多數的非共產黨人士。這個制度的目的是甚麼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中國共產黨是主張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從共產黨本身起，就不做一黨包辦或專政的事。

以上種種措施，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保證政府是民主的政府。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董必武選集》第 110—112 頁

三三制的實質：政權共享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就主張聯合民主政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是人家不要他，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內戰時他沒主張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主張革命的統一戰線政權。廿五年的八一宣言、廿五年十二月的決議都是說明：一切反日反賣國賊的分子，不論他代表那一階級，那一政治派別，那一社會團體，那一武裝隊伍，都可以加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抗日開始以後，這類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澤東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說：

「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既統一戰線的政權。共產黨人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採取我黨中央會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而使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佔三分之二。」

「不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有存在與活動之權。」

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上說明：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

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拿共產黨在政權上的主張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比較，完全一致，共產黨也和孫中山先生一樣這樣說就這樣做：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都已實行了三三制。因為他深切知道沒有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權，不能發揚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勝利。如果某黨派佔優勢政權就歸某黨獨霸，那是違反歷史規律，背叛民眾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敗。

除有長久革命歷史的國共兩黨外，幾十年來屢僕屢起的，包括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至其他階層的民主運動，遠之如「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國會」「民主政團」以及某些較小的黨派。他們的綱領，都是要求「選賢與能」，要求政權大家有份。他們不贊成「一黨專政」，更反對把他們當「阿斗」。

三三制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制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為甚麼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

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

舊社會遺傳下的劣性：

一，「自以為是」。不管人是否「以為是」而強人是我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無窮的。「自以為是」即令有幾分是而未必能成為天下之公是，而常流為所謂「成見」。二，「惟我獨專」。這是權利欲或領袖欲的表現。生怕人來爭權利或者分權，於是排斥、忌刻，甚至屠殺隨之發生。三，「以小失大」，個別利益，包在全體；各階級黨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會。然而人們往往見不及此，既然「外御其侮」仍要「內鬩於牆」。四，「互不信任」。由於上述三者，造成各黨派階級間深刻的裂痕，你懷疑我，我懷疑你，人家是人，無端疑之為鬼；疑人為鬼自己也變為鬼，鬼道橫行，「特務成為國是」。他不知道，揭開一看，原來不過如此，小的異完全可以統一於大的同。

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須克服。然後三三制才能實行、才能有實際。

政權是人民的，黨是人民中前進部分，替全體人民爭取政權的。孫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為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四萬萬人找出路，不是為若干國民黨員陞官發財。共產黨也是一樣，一切為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參加政府工作」。

甚麼叫領導？「領導是帶路的意思」（毛澤東語），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他知道跟我黨來有好處；其次，

黨員很積極，有信義，站在一切政治鬥爭的前頭，他知道跟我們黨員走不會吃虧。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在後面跟，從沒有帶路人要比跟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強迫人家跟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

有些無黨無派的人士特別是從來就屏在政治之外的農民，對於參政不很積極。因而有些人說：不是不要他來，而是他不肯來；不是我要把持而是他們不提意見，或提的離題太遠，然而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從來沒過三三制即民主政治的結果。歷史經驗告訴人民的：要人民對參加政權有興趣，只有當權的黨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權公開的事實擺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運用政權，也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權與民意機關中練習。如果說「訓政」尚有某種意義的話，那麼三三制就是訓政的最好辦法。

——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27日



人民民主優於階級民主：以三三制為例

三三制的民主，比階級民主的內容更豐富，要有包涵同中之異的度量，和發現異中之同的見解，要有駕御一切的遠見，才能取得一切的贊成。然而一切都歸宗於一點：民主習慣，遵守決議，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風的養成，共產黨員應為首導，一，是共產黨員有實力的區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須約束自己。別人對的，虛心採取；自己不對的，馬上改革。追求真理，沒有成見。其次，共產黨人要知道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不是和共產黨人一樣，否則會使他們感到不滿與不安。第三，要有誠懇說服的態度，要知道有槍的人一句話不謹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好覺，而勉強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氣破肚子。如果說階級民主今天這樣明天仍是這樣，甚至後退；那麼，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賽過一天。因為三三制內包有階級黨派的矛盾，矛盾是推進機；不進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復存在。

前進的綱領與建議，前進的工作效率和徹底執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營養劑。比如共產黨西北局的五一政綱，二屆參議會中某些決議和某些提議，不管提出的是誰，而因為恰合於大多數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而見諸實施。於是三三制就更有力了。因此參加三三制各階級各黨派必須力求進步，否則不會在政權和

民意機關中出色，尤其有實力的黨派，更應提高自己，以黨的卓越的政策和黨員的模範，行動加上「開誠佈公」，才能保持住與提高其領導地位。

—— 摘自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27日



三三制：一黨專政的天敵

老百姓在解放區做了主人，就是說，解放區實行了民主。解放區實行了哪些民主呢？解放區實行的民主有好幾方面，比如今天要說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的一種辦法，一種制度，用這種辦法、這種制度，好讓各階級、各黨派大家都有機會來參加政府、管理國事。

要知道甚麼叫三三制政策，我們看一看解放區的老大哥——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個大概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完全是由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民主選舉出來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稱他林主席，林主席本來是老同盟會員，革命幾十年，現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銘，大家稱他李副主席，李副主席曾經服務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國醫，是陝北的公正紳士，不是共產黨員。邊區政府的廳長，比如教育廳長柳澗，是救國會派人士；比如教育廳副廳長霍連果，還有建設廳副廳長霍子樂，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產黨員。政府委員會，十八個人中間，只有六個人是共產黨員。

在陝甘寧邊區，除去邊區政府有非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縣長、科長，以及鄉長、鄉文書以上的各級行政人員，也有很多是非共產黨員，統計起來，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參加經濟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與其他黨派、無黨無派的人在一起辦事，互

相商量問題，實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設邊區，大家一樣，在政府中間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見在討論的時候，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那就能夠實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開始，陝甘寧實行「精簡政策」，最初提出這個政策的，還是非共產黨員李副主席。

邊區政府是由邊區參議會，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邊區參議員，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地主紳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數民族的代表等等，他們又是從邊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黨派，以及各種不同信仰的人民當中，經過由下而上的普選運動，選舉出來的。

在參議會上，參議員們和衷共濟，不僅批評政府的工作，並且通過了許多議案，交給政府去做，還選舉出參議會常駐委員，在參議會閉會的時候來監督政府。常駐委員有九個人，其中只有三個人是共產黨員。

各位聽眾！十八個政府委員當中，只有六個是共產黨員，參議會九個常駐委員當中，只有三個是共產黨員，可見得，共產黨員在裡面所佔比例，都只佔三分之一。

為甚麼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呢？這就是因為實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這個政策規定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好讓更多的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參加到政府裡面來。

過去，解放區裡的老百姓熟悉共產黨，常常選出許多共產黨員來為他們管事，自從共產黨或無黨無派的人佔得

更多一些；如果共產黨員當選的不夠三分之一，怎麼辦呢？那當然是選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區為甚麼採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共產黨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廣大人民及愛國黨派、民主人士都來管理政權。中國人口很多，共產黨員佔一小部分，為了要使黨外的廣大人民都有他們的代表來共同管理國事，所以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權機關裡，自己約束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像國民黨那樣，由一個黨的少數人來包辦政府，主張各黨派、各階級都有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人民，現在都在努力爭取實現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現在，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還沒有實現，只有解放區實行了三三制政府，這就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解放日報》1945年12月7日



政權開放才有利於黨的領導

讓我們設想，有這樣三個不同的縣參議會和縣政府：其一、縣政府和縣參議會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其二、議會議員、政府委員會中，黨外人士都在半數以下；其三、真正實行了三三制。這三種縣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風上，會有甚麼差異呢？在共產黨員思想意識的鍛煉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甚麼不同呢？

先讓我們看第一種。

議會、縣府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黨員的第一個任務是服從組織決定，因此當一個任務到來時，他們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這一個任務？」關於這一任務本身的政治意義在那裡？為甚麼要這樣做？這一個根本問題，卻不會發生爭論。對於黨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這一問題也很少考慮，因此對於政策的理解也就不會深刻，甚至對於政策的研究與把握失掉興趣。大家統都以「完成任務」為滿足，逐漸發展的結果，是政治上的遲鈍，以至癱瘓。

在工作制度上，極容易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一方面議會和政府不能發揮其獨立的機能，在人民面前減低了它們的威信，同時也使黨委紛忙於日常的政務，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領導。大家都是黨員，做的是一件事情，討論的是一個題目，又何必挪移三個地方（縣黨委、縣議會、縣政府）開三次同樣的會？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為對於黨外少

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對於領導群眾也常應用黨內的領導方式，強迫命令偏偏多於解釋說服；而黨員或幹部在群眾間起的「模範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強或過於突出。

結果是：黨的政策不能變為廣大人民的主張，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負擔；縣委、參議會、縣政府、以至群眾團體的負責人，在人民眼裡多變成了「公家人」，不再是與他們血肉相關的「自家人」。

第二種怎樣呢？

因為縣議會、縣政府都只有少數的黨外人士，黨外人士來時勉強，進門不敢講話，或少講話，辦事則敷衍表面。因而我們也就容易不把黨外人士當數，或誤以黨外人士當真沒有跟我們不同的意見，於是多數人已經討論決定了的東西，回頭來再特為少數人開一次會，把原案照樣通過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煩。黨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懶得參加這種黨政不分的會議了。於是一切事情仍舊習慣的進行起來：照樣地不研究政策，照樣地沒有解論，照樣的「完成任務」……。我們主觀上也許當真想跟黨外人士合作，但是實際上變成了「請客」，黨外人士也許當真打算到議會裡來發抒他們的意見，到政府裡來施展他的抱負，但實際上卻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這種情形，對於共產黨員毫無好處；對於縣黨委的工作，依舊是個累贅，而縣議會則容易變成一個空洞的形式——甚至連形式也很難得保持。

在第三種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黨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講話，他們或者根本就不同

意我們的主張，或者是同意我們的主張而不讚同我們的辦法，或者同意主張辦法，而反對我們提出來的人選。在這種情形下面，共產黨員——首先是被選到議會裡和政府裡去的共產黨員，就不能不細心的、深入的去研究並把握黨的政策，如果依舊是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別人的立場和意見，而想出種種的對策，使別人接受我們的意見，同時也接受人家意見的好處。如果依舊是自高自大，目無旁人，他們就會被孤立、受打擊，以至一事無成了。同時，他們也就不能不時時刻刻記憶自己是共產黨員，牢固的站穩自己的立場，為抗戰和革命打先鋒、做模範。如果再馬馬虎虎、吊兒郎當，連群眾都會公開指責你不配做共產黨員了。

於是黨的政策當更為廣大人民所理解，黨員行動當更為廣大人民所擁護，這便是革命勝利的保證。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實行轉變了。黨已經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張與辦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慮通過政治領導爭取大多數以實現黨的主張的辦法，關於實際政務上的瑣細項目，它就只好放棄、也不能不放棄了。議會裡既然有了不同意見的辯駁和鬥爭，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形式；即使我們每一項主張能夠在議會上毫無異議的全體通過，這些主張本質上和以前也已經根本上有了差異，因為它們已由黨的主張變為人民的主張了。縣政府再根據議會的決定，負責制定詳細的、具體的執行方案和步驟，縣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責任和獨立的工作。

只有黨與政在工作上的明確分開，才適合於民主制度的體例；也只有各自獨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潑辣、更有生氣的實現對於廣大人民的領導。

最後，在新的情況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個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不從頭到尾來個徹底轉變了：關的門，必須打開；別人的意見，必須傾聽，強迫命令，必須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謂掌握與貫徹黨的政策，所謂了解情況，學習並運用策略，只有跟黨外的主張與黨外的人士相接觸、相比較時，才有其實際的意義；所謂黨政分開，所謂改變作風，也只有在議會裡、政府裡當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黨外人士時，才更容易實現這一個轉變。

三三制不僅是符合於全體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權形式，三三制還是鍛煉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黨的組織，使之真正成為全體抗日人民、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為引導他們走向勝利之路的帶路人的必須的途徑。

我們一定要堅決的、毫無猶豫地實行三三制！

——《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敢鬆懈」

——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選自黃炎培《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權機關，它必須真正有權，而黨是領導政府工作的。我在這裡想談一談黨與政府的正常關係問題。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黨的構成分子——黨員，在政府機關中工作，同時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一員。黨和政府這樣就發生了有機的聯繫。黨在政府中來實現它的政策，是經過和依靠在政府內工作的黨員和黨團。黨只能直接命令它的黨員和黨團在政府中做某種活動，起某種作用，決不能駕乎政府之上來直接指揮命令政府。這是我們同志應當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黨領導下所頒行的法令，所公佈的佈告，所提出的號召，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首先應當服從那些法令，遵照那些佈告，響應那些號召，成為群眾中愛護政府的模範。

黨包辦政府工作是極端不利的。政府有名無實，法令就不會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權。過去有些同志以為黨領導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揮政府，這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黨不能凌駕於群眾和政府之上

• 徐特立（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領導，第二是組織上的領導。前者的任務，第一是政治理論的建立，第二是政綱的制定，第三政策的決定，第四是正確領導方式的確立。它應當因此而得到群眾團體和政府深刻的認識和自動的執行，而不含任何的強迫與命令，這便是平常所說的黨的領導權。黨是沒有強迫執行命令的權力的，所以它沒有武裝，沒有監獄，也沒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個權力機關，只能靠它的黨員在政府機關中，群眾團體中普遍的發生核心作用。

政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忠實於國家，忠實於民族，忠實於黨的政綱和政策的執行，在群眾中成為一個最前進的模範人物，然後能在群眾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黨的威信，然後能使群眾團聚於黨的周圍，這就是所謂「起核心作用」。但這裡並不是用拉夫式強迫群眾擁護黨，群眾擁護黨是出於他們的內心作用。因此，我們領導群眾是要靠政綱政策的正確，在事實上要成為廣大群眾生活意識所反映的要求。黨在群眾的意識中要能夠使群眾認為黨是民族的，國家的及自己的救星，這才是真正的領導權。

至於普通所謂爭領導權並不是爭取政權，而是爭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綱政策的實現。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用黨來代替議會，也不是以黨來代替政府，包辦一切政治，

成為黨的專政。把領導作用與政權混合起來，這在實際上便等於取消了黨。

其次，黨的領導作用不單純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張去取得群眾的接受，卻是經過各種組織而使它實現起來。因此，除經過黨的本身的核心組織之外，還要經過政府的組織(當權的黨)及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假若政府的組織及群眾團體的組織不健全，雖然有黨的組織，也就徒然成為一個空洞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在組織方面必須有政府、政黨及群眾團體三種組織。

黨的任務是在領導；政府的任務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眾團體的任務是在使群眾自治。三者的任務各有差別和範圍，而且互相聯繫，缺一不可，兩兩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強迫作用，拿孔子的話來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強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深入群眾的內心，卻是今日正黨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級官階之分，對於群眾有官民之分，這裡便含著名份的差別。可是在黨內，一切黨員都是同志，無所謂官階，也無所謂名份，更無所謂同鄉和同姓，一致統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下，沒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說服：就是黨內的處罰也只有勸告與警告，到了開除黨籍已是無以復加了，同時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黨。因為黨不是權力機關，而只是領導機關，用通俗的話來說，假若我們認為政府是父親的話，那麼，黨卻便是母親。

黨的專政只能說是黨的政治主張透過政府而達到實現，並不是用黨來代替政府執行政權。而透過政府也是由

自己的黨員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黨對政府下命令和強迫政府執行。更不是政黨駕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別的獨立機關，各有各的上下級關係。即黨被群眾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認為黨是他們的上級，在組織應該服從，而是為黨綱及政策的正確，是一種救國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張，同時黨員也是群眾所推崇的模範；因此黨的「黨德」和黨的政綱不是在群眾和政府機關之上。倘若認為「黨」是組織上在群眾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會走到強迫群眾和命令群眾的路上去，而使一個國家形成兩重政府的形態。如果黨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則成為屋上架屋；如果黨的命令與政府的命令是歧異的，則群眾無所適從。故此政黨必須集中精神於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而決定正確的政綱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執行一切政務。

政黨以政治為它的生命，每一個時期的政治轉變，必須竭盡全力發動全黨來迎接這一轉變，把國家社會乃至把整個國際轉危為安。在這種嚴重潮流之中，某一個政黨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麼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盤石，誰也不願意推翻它，同時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還會擁護它。因此，稍有歷史的政黨，不會把爭權奪利去代替救國救民的任務，也不會把黨的專政看做是黨的權利，而不看做是黨的義務。如果以爭權利來代替專政，那麼，就會使黨員變成黨官，政治家變為政客，政黨變為政客的集團。專政的意義弄錯了，結果國家遭到滅亡，自己的黨也會被敵人毀滅。同時一切政黨都應該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但是只

見近利而不見遠利，及只見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朋友的利益，也是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以黨專政的口號下，變為以黨專利，更為嚴重。因為他不顧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幫助，孤軍獨戰，結果就變為此路不通。例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馬克思是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共產黨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同時另一處地方又說：「共產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產，而不是廢止小農民的財產和小職工的財產」。列寧也是共產黨的首領，他認為農民大眾和殖民地國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殖民地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利益，間接就等於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進攻時，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熱中，如果離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狹隘的階級利益上，使得國家滅亡，而自己的階級也會同歸於盡。在這種情況之下，還不愛惜朋友，幫助朋友，以致犧牲了朋友的利益，結果犧牲了整個民族利益，也就是等於犧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目前法國及中國的天主教也和共產黨合作，因為他們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敵人是世界的侵略陣線，威脅了一切人類。這並不是說，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絕對相等，但是在一定範圍內，共同的利益是絕對相等的。因為政黨自己本身不是等於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併為一黨，也不能夠隨便拉朋友進自己的黨裡來。

黨的專政是保證政綱政策的實現，而實現的是大多數的朋友，卻不是單純的自己的黨員，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黨員來執行，那就無須要領導了。所謂「領導」也就是政

黨對友軍起核心作用。怎樣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幫助友軍，使友軍健全起來，以便達到共同的目的。蘇聯只有一個政黨，而政府中負責人不一定全是共產黨員；一九三〇年，蘇聯聯邦中的日耳曼共和國的勞動部長便不是黨員。而蘇維埃的代表，只能保證黨員佔多數；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時教育部就有許多非共產黨員，其中科長如賴子玉君，馮觀潮君都不是黨員，師範學校校長羅欣然也不是黨員。目前邊區政府柯柏年任編審科長，董純才任科員，均不是黨員。不久以前，孫銘勛由邊區政府主席團委任他為教育委員，而孫是延安師範的教員，亦非黨員（延安師範是西安省政府辦的）。社會教育科長楊其華，同樣不是黨員。因為有許多人才，有專門學識和經驗，他們自己不願意加入黨，卻願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條件不夠入黨，但在政府負責卻有餘；因為政黨和政府不是完全無差別的。如果行政人員不問他們願意不願意而強迫他們加入黨，那麼，黨的組織就會不能鞏固起來。如果沒有入黨資格的人就不許在政府負責，那麼就要遺棄許多有用的人才。在過去蘇聯紅軍中的軍長師長，不一定是黨員，但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必須是黨員。因為司令員是由政府委任指揮軍隊的，政治委員是由黨委任指揮黨員，保證黨和政府決議案執行的。現在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有許多非國民黨員，可見以黨「專政」不是政府機關都用黨員，而只有保證黨的政策和政綱能夠實現。怎樣實現是要經過廣泛非黨員的群眾，而自己的黨員，只是群眾的核心。

在一個國家內的組織力量，是政黨政府及群眾團體。

政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盡領導責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眾。政府用他的最高權力在黨的領導下保衛國家，他的威權是用來對敵人，而不是用來對友邦及對自己的群眾。群眾團體擁護政府，擁護當權的黨，在不妨礙整個社會利益，國家利益條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權利。以上三種組織互相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則天下無敵，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滅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題《政黨與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版



論延安學校黨支部對群眾團體的關係

在群眾性學校中，黨的支部與群眾團體，是並行的。假如說支部是從黨的系統來保證教育計劃的完成，則群眾團體是以群眾組織的力量來進行學生自治，各種課外活動及文化娛樂等輔助教育使教育內容更豐富更生動。（如果我們不把教育僅限於書本上的知識的話）因此在完成教育作業的意義上，支部與群眾團體是沒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應該鼓勵黨員積極參加群眾團體的活動，同時對這些團體必須採取團結、幫助和提攜的方針，只要這些團體是符合於抗戰、團結、進步的原則並向學校履行一定的手續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眾性學校的學生，是來自各階層各地域的知識分子，一般的說，除抗日救亡的目標是比較一致外，其觀點其立場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眾團體，也在某種程度內各懷有不同的動機。唯其如此，他們對民主作風格外重視，支部工作者應該掌握住這一特點，不僅宣佈而且實際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學術研究的自由，和作風上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

為甚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因為延安是共產黨員佔優勢的地方，學校裡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須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寬容的器度，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得住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黨中央曾有正確的對群眾團體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執行不善、手法拘謹，也會影響到這種民主作

風的實質的。所以黨員在群眾團體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辯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去求得各種不同意見之漸趨於一致，性急也是沒用的。

黨內同志一方面尊重別人批評的權利，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要闡明自己的信仰與理想，批評別人錯誤的意見，二者不可缺一。在黨外同志來說，批評別人，被別人批評，這不等於思想上壓迫。在黨內同志來說，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則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遠不會把錯誤的意見領導到正確方向上去。只有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在紛紜龐雜的意見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確，這才看出領導的必要與黨的意義。

但是上面所說的領導，自然不是支部對群眾團體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組織上的把持，而是要通過黨員提出積極的意見，使黨的主張貫徹到這些團體中去。領導的中心環節，就在於主張正確與別人相信這些主張的正確。而不是倚恃人多勢大。這裡的區別，就是「以德服人」與「以力假人」的區別。

過去學校中由於個別黨內同志存在狹隘的觀點和拘謹的手法，致死黨員與黨外同志之間，塗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而某些黨外同志也固執於自己是「群眾」因此對某些黨員有過高的要求。後來黨內同志和黨外同志一齊積極參加與自己興趣所近的群眾組織，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關係，這不惟沖淡彼此間存在的隔閡，而且在團結上起了組織的作用。「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同志合作，無權利排斥

黨外人士。」這就是黨員對黨外同志所採取的原則。

學校中支部對群眾的問題，就是現實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問題。因為來延安的青年有各階層各政黨的前進分子，有不同的社會關係，有不同的政治認識，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在群眾團體的選舉上，必須廣泛的容納這些人。就是說這些團體的組成分子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與這團體的領導部門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應成正比例。這就是說，假如組成分子中黨員佔百分之三十，則領導部門中黨員也只能佔三分之一。後者隨前者的變動而變動。這可使保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領導機構中去。這對這些團體是有好處的……

假如黨員被選到領導機構中，則民主作風，寬宏氣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個工作上問題的決定，儘可能經過協商、傾聽黨外同志的意見，取決於多數，明知解決問題失策，亦須以解釋說服的辦法糾正。剛愎自用，盛氣凌人，自以為是等不良習慣，都應該反對。萬一有原則上的分歧，解釋無效，則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見，迨將來事實證明看。假如黨外同志被選到領導機關，則黨員須自覺的忠實於自己的工作，以減少領導者的困難。並進而設法協助領導者解決其發生的疑難問題，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全校性的人數較多的團體中的黨員加以適當的組織，由支部領導使其多少具有黨團的形式，這在延安的學校中還是必要。

因為黨員重視其所參加的群眾團體，遠不如重視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這組織的任務應該重在督促這

些團體中的黨員執行決議、遵守紀律、積極工作以保證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顯然這與一般的黨團是有區別的。

為要加強支部與群眾團體間之聯繫，支部有關會議歡迎這些團體的代表參加互相交換意見，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緊密。

教育計劃的完成，在學校範圍說來是很大的組織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學生中半數的黨外同志團結起來，步調一致，這對教育工作將是很大的損失！從此目的出發，則團結群眾團體，團結黨外同志，應當作為支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報》1942年8月2日



政府的權威非建築於群眾畏懼

政府有權，要為群眾做事，為群眾謀幸福，不應該妨害群眾、壓迫群眾。邊區個別地方政府有脫離群眾的現象，這是政府工作中很嚴重的病態。

邊區政府權源出於群眾，政府負責人是群眾代表選舉出來的，這已表明政府和群眾關係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權，已深入到社會的基層。政府要傾聽群眾的呼聲，採納群眾的意見，了解群眾的生活，保護群眾的利益，但這還不夠，還要使群眾敢於批評政府，敢於監督政府，一直到敢於撤換他們不滿意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樣，群眾才感覺到政權是他們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群眾對政府的批評也許有錯誤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有時為群眾所不了解，因而發生誤會。這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向群眾解釋，說服群眾，切不可打擊他們，更不應當對他們借故報復。我們要相信群眾是可以說服的。

至於那些敵探、漢奸、托匪及專心破壞政府威信、妨害政府工作的壞傢伙，政府決不能放縱他們，但必須在群眾中揭穿那些害蟲的罪惡，用群眾的力量來懲治他們，而不是政府簡單地判罪了事。

政府的權威，不是建築在群眾的畏懼上，而是建築在群眾的信任上。群眾一經信任政府是他們自己政府的時候，政府在當地就有無上的權威。

——《董必武選集》第 55-56 頁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

邊區政府是我們黨領導群眾建立起來的，政府也在黨領導下工作。政府所頒佈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們黨員應當無條件地服從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們公共生活所必須，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經過了一定的手續才制定出來的，秩序是經過一定的時間才形成起來的。在制定和形成時已經滲透了我們黨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和活動。我們如果違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壞了社會的秩序，我們自己必須負責，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

我聽說我們邊區有些黨員同志犯了法，因為他自以為是黨員，想不受政府的審判和處罰；而有些地方黨組織也覺得黨員犯法，是黨內的事，讓他逃避政府的審判和處罰。這都是不對的。國民黨在全中國範圍內因為它的黨員不遵守它領導的政府所頒佈的法令而遭受到國人的痛惡，這是我們應當拿來作為鑒戒的。黨員應當自覺地遵守黨所領導的政府的法令。如果違犯了這樣的法令，除受到黨紀制裁外，應比群眾犯法加等治罪。為甚麼呢？因為群眾犯法有可能是出於無知，而我們黨員是群眾中的覺悟分子，覺悟分子犯罪是決不能寬恕的，是應當加重處罰的。不然的話，就不能服人。從前封建時代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傳說，從這傳說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難道說我們共產黨不應當主張比封建時代傳說下來的一點法律上的平等更前進一步嗎？

我請求邊區黨通過一個決議，警告我們黨員必須遵守邊區政府的法令。黨員犯法，加等治罪。這不是表示我們黨的嚴酷，而是表示我們黨的大公無私。黨決不包庇罪人，黨決不容許在社會上有特權階級。黨員毫無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這更表示黨所要求於黨員的比起非黨員的要嚴格得多。

——《董必武選集》第 58-59 頁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十輯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

專制政府！

合法的罪惡

門納

有史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沒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變以至於今日，雖然有了若干次的鬥爭，但依然還是沒有一部「人民的憲法」出現。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會有甚麼權利與方便，而青年學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誣蔑屠殺的義務。

中山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的時候，標明了聯俄聯共擁護農工的三大政策，認真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當時國民黨所統治的地區之內，一切愛護蘇聯、愛護共產黨、愛護農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語行動，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檢討了若干年來革命失敗的教訓，又接受了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所以要建立黨軍，因而開辦黃埔，號召青年入學，培植革命的軍事幹部，雖然中山先生不久就與人間別離了，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血液，還不會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排泄出去。中間經過五卅慘案，洶湧於全國各大都市的罷課罷市罷工的愛國運動，只有香港和廣州得

到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撓破壞摧殘。所以當時一般的青年，都視黃埔為革命聖地。尤其是兩次東征，青年們用熱血頭顱打陳楊劉，鞏固了革命的根據地以後，風聲所播，全國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黃埔的浪潮，當時的黃埔當局，對於這些青年，也可以說是「來者不拒」。以後的北伐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也就是得力於這些青年的踴躍犧牲。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輝煌殿堂，可以說是用這些青年們的頭顱來建築成的。

可是，那時廣東的國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國的廣大地區，是被認為不合法的。因為國民黨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封建軍閥，當然不會承認它為合法，在那時非國民黨統治區青年，要想到黃埔去，也實在是困難而危險的，稍一不慎而被發覺了，就會走上被拘禁或屠殺的惡運。封建軍閥當然認為他自己的這種行動是合法的，因為他自己是被帝國主義者承認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當時的青年們要從死裡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們的熱血頭顱來求得民族與人民的生，在他們的踴躍犧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謂合法的封建軍閥們，不久之後，一齊都望風披靡。而從前所謂不合法的廣東國民政府，現在也屹立於紫金山前，一變而為合法的了。

這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呢？一方面，是這些不惜為國家民族而灑熱血拋頭顱的青年們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炮轟下關，血洗濟南，他不敢反抗；散佈在各地的封建軍閥官僚，只

要旗幟一換，就可以加官晉爵。他是跪在帝國主義胯下，伏在封建勢力的懷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從前在廣東時認為合法的青年們的種種言語行動，如今又轉變為不合法的了。如果這些青年還不識相，還要保存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還要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話，那就會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大屠殺，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萬。靠青年起家的黃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龍庭上，發出猙獰的狂笑了。

可是，算盤又還打得並不怎麼如意。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隊伍，又在江西開闢了根據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閻馮之流，又隨時要設法分庭抗禮，「天下」還沒有完全成為「一家」，又靠甚麼去替他征討撻伐呢？當然又還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現在的號召青年，並不像從前在廣東時那樣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術了。

從黃埔演變而來的軍事學校，四面八方的去開展，用種種方法引誘大量的青年進入這座學校，灌註一些「命令重於生命」的迷魂湯之後，再替他到沙場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學校中，則黨義、軍訓、紀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劑。周考、月考、期考、會考、文憑，就是重重枷鎖。黨權高於一切，服從領袖，聽到「領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個天真活潑的青年，受了這樣黨化的幾年教育之後，就會變成死板板的沒有靈魂的奴才。如果有不願意替他做砲灰、或不願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現了一點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誣蔑為「共產黨」。被加上這一名詞

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說，自從黃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龍庭以後，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國青年，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為奴才，便要被誣蔑屠殺而成為冤鬼，當中沒有別的路，如果還有別的路的話，那就是死裡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

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踏步向中國前進，國亡無日，全國青年奮勇起來的愛國浪潮，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愛國有罪」。木棍、石塊、水龍頭，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們的禮物。「攘外必先安內」，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區域內的「安內」的良方，而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為合法的。

經過西安事變的當頭一棒到蘆溝橋的炮聲，全國青年如瘋如狂地湧上抗戰前線，參加了各種抗戰工作，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氣，認為「自由」來到了。然而，曇花一現，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他不曾負擔起他應該負擔的團結全國青年的神聖任務，反而造成了使全國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當特務，同學如寇仇，製造摩擦，釀成慘案，不一而足。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與支持下，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執行嚴肅工作而使他們看得不順眼的人們，都被認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營。集中營如雨後春筍地建立起來，成為大規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這就是高坐在重慶小龍庭的帝王在抗戰期內對青年們所樹的德政。

日寇投降後，這個合法政府已經無外可攘，就可以一

心一意地來進行「安內」的工作。在抗日戰場上望風披靡的英雄們，現在一變而成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魯門赫爾利馬歇爾等的助紂為虐，內戰英雄們得意忘形。然而全國青年是不甘心讓這些英雄們置民族國家於死地，一齊怒吼起來了。從昆明的「一二一」慘案到重慶的「二五」、「二八」慘案，中間經過不知多少洶湧澎湃的浪潮，在所謂合法政府的心目中，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從黃埔出身的關麟征杜聿明，在「你們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開槍的自由」的黨義下，進行了合法的殺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佈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

中國人民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將近二十年的長期專政中，中國的混亂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十年，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內戰。結果，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在抗戰的八年中，越到後來，國民黨反動派越是抗戰消極、反共反人民積極。日本一投降，他們就把他們在抗日戰爭中保存的實力大量派出，全國大打。……

長期的災難折磨中國的人民，但同時也教育了他們。從二十年來的歷史事實，他們深深地懂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專政不改變，中國就永遠不可能安定，中國人民就永遠不可能有好日子。這個真理，不但中國的人民懂得，而且許多遠隔重洋的外國人，也都逐漸清楚地了解了。現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來養肥自己的奴才們，才還在那裡厚顏無恥地講他們那個臭不可聞的「法統」。而三國會議的決議，卻不但要國民黨停止內戰，並且要它放棄一黨專政、放棄它那個「法統」。

然而站在人民的頭上、吸人民的血過活的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是輕易地就放棄他們的專政的。恰相反，他們要用各種方法來繼續維持他們的專政。內戰是一種方法，製造暴行與血案也是一種方法。今天，中國還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裡！

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要變不要亂」。彷彿誰要把中國變得更亂似的。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

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其實，「要變又要亂」的人是沒有的。中國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實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而且知道只有變方能止亂。與這相反，「要亂不要變」的人卻是有的，那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企圖「以亂止變」，他們正在用各種可怕的亂來阻止他們的專政被改變。自然，他們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安定」就是全中國人民的禍亂，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全中國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少數人的「安定」也不過是主觀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們殺不完，他們抓不完，他們關不完，因此他們就難於「安定」。他們最恨共產黨，說甚麼共產黨一天不消滅，他們就死不瞑目。他們大概認為是共產黨破壞了他們專制獨裁的「美」夢。其實，就是沒有共產黨，他們的夢也是不能實現的。袁世凱時代，中國沒有共產黨，但是袁世凱的專制寶座還是沒有坐穩。滿清時代，中國更沒有共產黨，但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萬世不變。

自然，今天中國人民有了共產黨，而且是這樣成熟與強大的共產黨，對於反人民分子的倒行逆施，是一個重大

的阻力。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就像保護自己的眼珠子一樣，這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神聖的天職。……英美盟邦記者在親身訪問了解放區之後，或者說：「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格爾德：《關於中國的近況》）；或者說：「在各個游擊區和邊區裡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費爾特：《中國內部的危機》）。

這些神奇的創造不是由於別的，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無時無地不是在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奮鬥。中國共產黨人的這種特點，這種精神，就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沒有飯吃，他們情願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設，他們替人民建設；遇有艱難危險的事情，他們能夠為人民的先鋒」。

而對於國民黨人，則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這樣承認，即：「在我個人感覺到，我們甚麼都不行，如果有點行，我們的國就不會如此。我們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為人民的表率，所以我們的黨員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並且受人民的厭惡……」（以上均見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總理紀念週講演詞》）。

這的確是兩黨的根本差別點。這也同時是兩黨許多爭論的分歧點。一個(共產黨)，一切為人民；一個(國民黨，主要是其統治集團)，它的目的卻是為了維持少數人的獨裁，因此它的政策與辦法，就是內戰、特務、屠殺、逮捕、抓壯丁、加重賦稅、濫發鈔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國極端混亂，它使人民極端痛苦。

國民黨的論客們，你們說你們是真的希望全中國的安定嗎？那麼你們為甚麼要東拉西扯，信口胡說，不敢把真正的亂之源說出來呢？中國人民早已知道甚麼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

停止內戰！

取消特務

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略有刪節



民不畏死

黎望

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學人、誨人不倦的長者、堅貞不屈的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在李公僕先生的血跡未乾、全國人民創痛猶新的時候，又被法西斯特務反動派暗殺死了。

這是中國反動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無恥最卑劣的暴行；這是反動派千百種罪惡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惡。這樣一位千百萬人民愛慕的長者，這樣一位學行優異的學者，僅僅是為了執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就不能見容於中國法西斯反動派。最後是出於這種最卑劣、最險狠的暗殺行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反動派對於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難想見。

由於李公僕、聞一多先生之被暗殺，已經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務猙獰險凶的面目，已經使全中國的人民警覺到，反動派已經不惜與全國人民為敵，要實施血腥的屠殺政策！

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鉢，已經反動派一手繼承下來；一切專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已經完全做了。反動派已經集了一切橫暴、險狠、卑劣、無恥的大成。

反動派也許在得意的獰笑吧：可是，別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個李公僕，是一個聞一多，然而繼續起的將是千千萬萬的李公僕、聞一多，千千萬萬爭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鎮壓不了、也是屠殺不了的；要不，一切暴君的統

治就該永不會動搖了。米蘭街頭墨索里尼的屍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屍灰，該就是殷鑑不遠的。

在反動派的眼裡看來，大概以為這種血腥的恐怖政策，將會鎮壓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運動，封堵住一切人民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切專制暴君的封堵水流的行為，最終是逃不掉滅頂的命運的。要想這樣來屠殺盡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夢想。人民的力量正如像勒納湖裡的水蛇那樣，是會在切夫的頭頸上，重新生長起一個頭來的。至於反動派這種自絕於國人的行為，正如像漢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說：「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

反動派要想用這樣的屠殺來恐嚇、來鎮壓住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中國人民在這種血腥的暴行前，對於橫逆的忍受到了極度的時候，中國人民將會表示自己的意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反動派也就會臨到入墓的時候了。

在生者的創傷、死者的血痕前，雖然會使一些善良者嘆息、劫懦者卻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猶疑者堅定腳步，而千千萬萬被死者的血浸漬的戰士，將會跨過死者的血跡，奮然前行。

七月十六日 晨五時欲哭無淚中寫成

——《新華日報》1946年7月18日

人權和觀瞻

中國人的人權，直到今天，還沒有一點保障。抗戰以前，成千累萬的愛國誌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緝；現在政府也感到這樣明目張膽地幹，會引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抗，同時也有礙「國際觀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學生、教師、工人……各種愛國分子的名字都寫上了特務機關的黑名單，讓他們「自行失蹤」，暗暗被殺死，永遠沒有人曉得。

但是公開的逮捕，還是一樣毫無顧忌。重慶市不到一月之內，就有幾乎上萬的人被抓去，送到師管區，沒有拘票，不根據任何法律，高興抓到就抓了關起，稍不順從，就開槍打；還製造了一個只有政府當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為了「國際觀瞻。」

暗逮明捕，既然都是為了觀瞻；那末在黑名單沒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沒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沒有釋放之前，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政府宣佈的「保障人權」，不是為了「觀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論無恥主義

舒燕

搶劫、放火、搗毀、暗殺，肆無忌憚地做這一切，然後又掩飾、推諉，盡量地把種種美名歸於自己，把種種惡名歸於別人，這是一年以來我們見慣了的現象。

也許有人想，這究竟還算知恥。

不，不是，這正是充分的無恥，是無恥主義的基本原則。無恥而成為一種主義，成為一種體系，就不是簡單的東西。在那個體系裡，貫串了一個無恥的方向，一切都統一於這個方向之下，一切都是無恥的。

威爾斯先生真知灼見地指出：這種「新聞統制」和毒品貿易人口販賣同樣的是一種有關全體人類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企圖行使這種法西斯制度的時候，正像我們不能聽任一個國家用鴉片毒品來荼毒其餘各國人民幸福一樣，除了用國際道德輿論遣責之外，還該有一種集體的國際機構的力量，來制止和消滅這種罪惡的滋長。他強調地指出：只有這種國際機構的具體的明文規定和實力制裁，才能保證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論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再度生長，而這種國際規定，絕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對派」所叫囂的所謂內政干涉。正如國際機構切實調查和制止一個國家的販賣吸食鴉片毒藥不能算是內政干涉一樣，戰後國際機構經常不斷地調查和阻止「新聞統制」正是保障國際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威爾斯氏具體地建議：「規定一個國家必須能

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其已予其國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為人民不可動搖的權利。」當然，單單憲法文字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國際機構要求每個政府都能以實踐這種規定作為參加國際機構的條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剝奪了人民的各種自由而提出控訴，這樣的問題應當由國際組織的國際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個政府觸犯了它加入國際機構當時所作的諾言，破壞了它應當履行的義務，那它就顯然再沒有資格被認為國際社會的優秀分子，並應當受到國際機構憲章可能規定的制裁與懲處。」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裡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裡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德黑蘭會議莊嚴地宣言，我們要創造一種「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的和平，這是沒有「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的「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好感，而企圖剝奪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自由的分子將會沒有資格跨進「民主大家庭」的大門，因為在這大家庭的門上已經掛出了一條家法：「剝削言論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內。」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社論
原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風氣・秩序・容忍

讀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報的《風氣與秩序》的社論後，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風氣與秩序來。這大半年以來，從一二一昆明的「國軍」用機關槍、手榴彈，殺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學生與教師起，一直到最近暗殺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東，又由東到南，數不清的打與殺，及每天都有的貪污作惡，在中央日報的社論作者看來，算是甚麼風氣與秩序呢？

由於老百姓對那種風氣與秩序不能「容忍」，向政府要求過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統治者就認為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就認為是必須「戡」的「亂」；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黨專政，而被稱做「中共的尾巴」，並且暗殺其領袖；社會賢達不能容忍，贊助了中共與民盟的主張，而被誣為「受利用」，列入黑名單；國民黨內的開明者不能容忍，贊成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即被視為「不穩分子」。

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而反動派則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御用的「民意」機關，發出「請求政府戡亂」的通電。於是凡是不容忍反動派那種壞風氣，壞秩序的老百姓、共產黨、民盟、社會賢達，乃至國民黨內的開明者，都在被殺、被捕、被戡、被排除之列了。曾經有人向中國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這就是叫中國人民永遠作反動派的奴隸的意思。這是多麼如意的算盤啊！

——《新華日報》1946年8月20日

「黑名單」

紀懿

最近有人偶爾看見了一份後方各大學的「黑名單」，印得很精緻，硬殼，封面是全黑色，裏面的字，當然也是黑的了。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據說很少，每個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樣，推其意，大概是「共產黨」、「民主同盟」之謂。可見這份「黑名單」不但印得精緻，在他們做「調檢工作」的時候，也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可惜的是，它雖精緻卻不精確，據說依看見的人所知來斷，被列入的大都是無黨派的純潔青年。只是他們平時也關心時事，希望和平民主。於是紅帽子一頂就給硬帶在他們頭上了。

民主同盟原是國共兩黨之外的黨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組織，因為主張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產黨的週邊組織」的「榮冠」。共產黨是「赤」，那麼，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紅」的了。於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改組政府的，就一律歸劃「左傾分子」，非「赤」即「紅」，非「共產黨」即「民主同盟」了。

黑名單上的「共」、「民」小注，想來他們也找不出真憑實據來。只不過把不順眼的、不跟著自己搖尾狂吠的人一古腦兒寫上去，再照「不順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順眼的當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們這樣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並非乾

拿津貼，於是就煞有介事似的來了一個分別。

黑名單「史」的考證，無法做到；因非「個中」人，不明「個中」事。可是記得離打國仗前還很久，就聽到這個在小孩子聽來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辭了。抗戰前列入黑名單的是為了他們要求「抗日」、要求「救國」。抗戰中列入的是為了要求「民主」、要求「堅持抗戰」，勝利後列入的是為了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民主」。這樣看來，戰前不肯抗日救國、抗戰中實施一手獨裁打算跟敵人妥協，勝利後要繼續獨裁下去打內戰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單、要一手殺盡「黑名人物」的人們了。

十八年來。被壓死在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計數，黑名單也不知燒毀多少次又新製多少次。無數優秀青年的性命，就在這「燒毀」與「新制」之間被兒戲般地斷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槍殺、被毒害、被活埋卻像死了又復活一樣，永遠殺不盡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黑色象徵死亡，可是它也是「鐵」的表像。「黑名人物」正是錘煉中的黑鐵，這些鐵塊，將要在千錘百煉中成為堅韌的純鋼，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單的製造者，終歸要被層壘高堆的黑名單壓死。不見俄國的沙皇？又不見希特勒正在忙著印黑名單的時候，自己首先垮了下來？

——《新華日報》1946年7月2日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複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甚麼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

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週末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短評

「守法精神不夠」論

磊落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報》載：『市政府鑒於各階層人士守法精神不夠，擬於最近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研究「守法運動」具體辦法。』

打風在重慶流行，實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夠了，但這些違法犯法的究竟是些甚麼人呢？檢查一下：一連串殺人行兇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槍桿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負維持治安責任的人幹出來的？幹了之後，個個都逍遙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夠的不是別人！正是這批踏在人民頭上為非作歹的傢伙！

要誰守法呢？請老爺們說明白點！

——《新華日報》1946年5月26日



奴才見解

田家英

讀史記《秦始皇本紀》，覺得奴才的見解常有其獨特的地方。秦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於是忙煞了一批幫閒、幫兇、走狗之類，浩浩蕩蕩。除了三呼「陛下神靈聖明」，揚著鞭子，監督奴隸刻石歌頌功德，這些唯唯諾諾或者噉噉喳喳的奴才，便忙著「使天下無異議」，策劃「安寧之術」，改官制，嚴刑罰，強化特務基層活動，運用嚶羅監察網。這裏，最有名的自然是「焚書」與「坑儒」。

焚書，這在中國「書缺有簡」算是最早了吧，非秦書，皆燒之，詩書百家語欽定不准讀，准讀的是醫藥蔔筮種樹之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讀核准的書，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過，雖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非顯出奴才身份並不高貴了麼？所以站在奴才立場最好的不是奴化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當掘一個大坑，推他下去，於是便有異議了，秦時當有言論，可惜不及詳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張，那宏文是：

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諸生不是所謂「真儒」，而是當時幹犯禁令的人，所謂禁令現在雖無當時甚麼《出版法》或《檢察條例》可資考證，但「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必然是「亂黨和反動分子」，亂黨和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綱

紀嗎？進一步來講所謂「儒」應該是明大勢，識大體，了解始皇從分割中求統一之心，最少是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不造謠言攻勢「宣傳反動思想」。(《民意》一六八期)這篇話，給我們活畫出橫眉怒目，一張吃人血口，這些「亂黨和反動分子」為甚麼不「明大勢，識大體」呢？我們看到一種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們仰視光明，要掙扎，不安於眼看淪為奴隸。

這種奴才在秦始皇當時是很多的。單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鑕，棄市，戮車裂，抽脅，磔等等二十餘種，應有盡有，污蔑人類的刑罰，獸性與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類天性了嗎？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鳴鞭自傲的奴才，他會覺得殘酷就是道德，諂媚就是學問，屠殺是他的本能，沒有人供他們殺戮，他們會失業的。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他人血跡，使自己發肥的總管。

然而站在主子立場又不盡是這樣。殺一人而安天下，統治者自然要為，但是屠戮淨盡誰又來作奴隸呢？所以主要的辦法還需別來一套，這樣，另一種奴才就大搖大擺地走出來了。

李斯就是一個。「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捨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這是一種隻知助虐固寵、毫無原則的人，他的辦法不同的，「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呂、金人十二」，對於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現代話說是「整飭學風」，方法是：統制教授「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特務橫行，暗探林立，有言詩書百家語者「隨

時報請撤懲」，「士學習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學生干涉行政之風」。總之一切設施不過為著使諸生與真理相遠，與現實相離，將來，理想社會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師今而學古」，戀著過去也為法令不容；「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諸生為要多少「知」一點去想呢？當然不准。同時還準備著一套萬一要想，也得依著自己的邏輯，避免想出毛病來。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這就用著第一種奴才作為補充，開除，思想測驗，失蹤，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用著這兩種奴才，是成功了的，諸生在欺騙、壓制之下，觸不到新的現實，聽不到新的聲音「由聾而啞」，緘口結舌，最多也不過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類征服下來了。

但是李斯之流卻沒有看到另外還有力量。

這決不是國治天下不平了。事實的功德圓滿卻是與原意相反，統制是為了「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可是還來不及『把「諸生」改為新的名詞』，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焚書，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卻並不是儒——亭長，走卒，翁牖繩樞之子，田亡隸之徒，根本不讀詩書的人。沒有武器，他們會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若問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為甚麼被一批烏合之眾，一群死囚，幾根木竿，亂者四應，秦的政權摧枯拉朽，統治立摧？

賈誼說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仁義不施」：防制異己，壓迫文化，束縛思想，箝制輿論，以刑殺為威，以收括為務，踐踏，奴役，納賄，貪婪，天下大亂，更加甚的常常是這些謀籌劃策，唯唯諾諾，或者嘰嘰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報》 1941年12月8日



今與昔

田家英

「能懺悔的人」，據說「精神是極其崇高的」。最透底的懺悔是從新的做人，斬犯綁赴刑場，為了表示不甘屈服，總得大叫幾聲「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快刀從頭頸飛過，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長，二十年後依舊是鋼筋鐵骨，依舊是一條好漢。

這方法在中國，流傳是頗廣的，而且越來越高明。不甘落後的人加以研究，覺得二十年畢竟太長，麻煩得很，於是另有新法：趕緊「貸款」，趕緊入黨，趕緊做好漢。

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漢們，也自有其內心的苦悶在。「反動」已經變為「革命」，舊英雄已經裝成新英雄，「名利羈鎖之中」，「鼓舞喧鬧之境」，耍猴兒戲的最怕人揭開面具，望著他毛茸茸的臉皮，問起如何前後不符，直弄到騰挪不得，觸及隱處，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當今天的看」。

這就是今與昔的差異。

自然，消極地表白終究不算善法，一來為了體面尊嚴，一來為了證明自己從『不知道「轉變」』，聰明人往往就會把過去說得含混模糊，或者把舊帳陳跡扮飾得雪白瑩淨，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這類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單看每臨紀念，報紙期刊上總常有許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過

領餉作事的編輯，訴說他一直就為新文化戰鬥，但彎子一繞，又在另起爐灶，從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幾位教授文人在作「光榮的回憶」。甚至連鄭學稼、梁實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遊行示威，宣傳講演，制旗幟，貼標語」，使用過「喚醒沉醉的大眾的手段」！結論如何？不過從「五四」證明「學風」的亟待整頓，學生不應過問政治。（引文均見《中央週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這裏躲閃不開。戰士闖將與吃肉吸血的幫閒之間隔一條多寬的鴻溝，但事情卻偏會作弄，在同一個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與昔有著如此的差異。

「覺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這精神是不錯的。但卻必須是大體上能明是非，辯黑白，至少也本著良心奔赴去路，倘若僅隨勢力旋轉，為了津貼領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兩下嘴巴，淌幾滴眼淚，用歪曲來證明內心的忠誠，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險惡的構陷，把世事塗飾得漆黑一團，以之騙人，兼騙自己，這就比之簡單抹煞歷史，更卑劣得多。

不過，這卑劣中卻仍然存有點「古道」在，因為究竟還承認有過那篇帳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來愈為精進，恐將不久，好漢們連「改帳」也嫌麻煩，乾脆算盤一響，帳簿一翻，就把兩眉一橫：「那是我？——我一直就在這邊。」

在好漢們身上，今與昔是難於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鷹，作蟲類。——《解放日報》1942年7月10日

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不要分割

羅斯福總統在其致美國第七十八屆國會咨文中，提到了美國國內右派反動分子的問題。他說：「真的，如果這種反動發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們又回到一九二〇年後的所謂『正常』時代，那麼，我們敢斷定，我們縱然在國外戰場上克服敵人，但在國內也必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羅斯福總統在這裡不但為美國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而且為其他許多國家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

我們敢說：許多重要國家國內的右派反動問題，決不止於是一個國內問題，這必然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由於一個國家在國內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因而它在國際間也必然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支柱，而不能為民主主義的支柱。以故目前講求國際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講求國內的民主。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因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懼的東西就是法西斯主義。羅斯福總統主張免除恐懼的自由，應當首先解釋為把法西斯的威脅和恐怖加以徹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國家國內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徹底免除，那就等於整個國際間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解除。

無論國內的民主也好，國際的民主也好，都要從本質上表現，形式是次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民主就是人權。人權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權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權利。人民無

法行使權力，也就無法享受權利。目前測量民主的程度，不僅是拿享受權利來做標準，而且是拿行使權力來做標準。我們不要以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僅僅是一個權利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權力問題。只有實際行使這種權力；才能叫做享受權利。

在這次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在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民都感覺到他們國內的民主非常不夠。羅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認一個《第二人權宣言》。在保障人權方面，我們中國更應當與我們的偉大盟邦——美國——競賽。

再者，民主與和平是密切聯繫的。這就是說，國內的民主與國內的和平是密切聯繫。同時，任何國家內的民主與和平又與國際的民主與和平密切聯繫。我們中國今天與英美兩大盟邦比肩作戰。……因此，也就是為了國際的民主與和平而鬥爭。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社論

言論思想自由和國際文化交流

近來，各地方談論言論自由的很多，這現象該值得興奮和鼓勵的吧?!這無論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這樣的需要，都認識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訪英團回國之後，王雲五先生談到過英國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我們已經評論過了。那天在國民參政會上，訪英團也作了報告。其中說到：「英國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各地報紙向來很發達。」這句話在我們讀了之後，真是感慨頗多。原來報紙發達，是以言論自由為前提；言論自由有促進報紙的發達，又由訪英團加以證明了。輿論沒法蓬蓬勃勃的發展，這對輿論界是件苦事，對政治卻是個損失。

這些話本來都是老生常談了，可是談到言論自由就總會聯繫到。

問題還不只此。訪英團還提到英國文化界希望加強中英文化聯繫，特別注意交換教授學生及圖書等事。這是很重要的。正像訪英團所說：「雙方應即積極推動。」英國既「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學術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麼，交換而來的教授和學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出來的。他們的思想是沒有受過任何限制的，言論在戰時所受的拘束是也與平時差不多的，這也就是說他們只看得慣過得慣這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歡迎他們來，是歡迎他們到一個民主國家來，在他們想像中是和他們本國一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怎樣才能讓他們證實這種想像呢?怎

樣才能使他們有「和在家裡一樣」的感覺呢？反過來說，英國既認中國是民主國家，一定希望中國的交換教授和學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現出中國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這些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須有民主自由，這個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進，才有意義。寫到這裡，可以舉一件小事情，說明沒有民主自由，是阻礙國際文化合作的。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國留學生監督控制學生思想的辦法廢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學生到美國大學和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因為思想言論自由是美國的民主傳統，特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民主國家親密團結的時候，不能不對違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議。雖然這項要求，政府是否接受，還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來，各國就該嚴重注意了。這實際上是要求把國際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則，就是說，這種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義為共同的出發點和基礎，民主國家只能幫助民主國家，也只能向民主國家獲得幫助。

從國內人民要求、國際潮流所趨看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趕快從原則的討論，走上切實的現實了。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0日社論

代後記

還要走很長的路

李普

新華日報老友潘培新送給我這本《歷史的先聲》，因為其中收了我兩篇文章，特意買來相贈。我十分感謝。披讀之下，感慨萬千。後來編者笑蜀找到了我，說這本書將在香港出版，要我寫篇序。這本書裏說的都是真話。共產黨人為真理而奮鬥，更不應當說假話。本著這種精神，在紀念我黨建黨八十週年的時候，我就來說點讀後感吧。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寫過一個專欄。本書收錄的《一切光榮歸於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報從新華日報轉載的，兩者都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慶是南京淪陷於日寇之手以後國民黨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駐紮於此。

一

這本書收集了當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論，主題就是要求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毛澤東 1944 年答中外記者團談話。他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

這些話對不對呢？我認為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叫做《中共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說，新中國建立五十多年了，中國民主化的歷史任務至今還沒有完成，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至今還沒有實現。我認為這也很符合實際，也是很對很對的。

然則為甚麼沒有實現？何以故？原因何在？這個問題很大，是個大理論問題，也是個大實際問題。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沒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問問，我們從中能夠得到甚麼經驗教訓。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制度方面或者體制方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制度或者好的體制。這個好的制度或者體制形成文字，主要是憲法。吸取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我認為首先就是修憲。鄧小平接觸到了這個問題。1980 年他說：

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甚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他這些話說得好。我想的是，今後我國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對掌權的公僕，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們老百姓承認並且希望他們都是君子，這才有可能選舉他們為我們服務，但是還要防止他們變成小人，使他們上台以後不可能為所欲為，使他們企圖不擇手段而不可得。換句話說，我們要建立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耍手段說假話欺騙人民，使他們不可能站到「法」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須這樣小心謹慎、步步設防，根本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本質壞的人未始不可能變好，本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西方哲人有的說：「不受制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有的說：「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甚麼樣的壞事都可能幹得出來的權力。」歷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越是權力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並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制衡不可。只有幾種權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權力才有保障，國

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二

這裏讓我們進一步追問，然則，何以我們沒有或者沒能制訂這樣一部憲法呢？讓我們再從毛澤東說起吧，其實這遠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本書收錄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一段對話，人們常常引用。我認為毛澤東這段話看起來很對很好，其實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更經不起實踐的檢驗。1945年黃炎培同幾位民主人士訪問延安，談到治國方略，他向毛澤東說，希望中共諸君找到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毛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起來很對很好。但是，第一，這是他上台以前的話；上台以後，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作數了。第二，他預先肯定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正確的，必定是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監督的目的僅僅在於叫當權者不敢懈怠、以至於不人亡政息而已。這一點，拿毛澤東本人的情況來對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他們「監督」，結果他打了五十五萬人為「右派分子」；並且公然說他當初的動員

和請求是「引蛇出洞」。後來他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面紅旗」，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對這種惡政，人民別無他法，恐怕只能期盼他「懈怠」一點才好。特別是他晚年親自發動和指揮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國人民的大災難，冤獄遍於國中，暴虐史無前例。這場暴政延續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場，人民無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離開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細想想毛澤東這一席話，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說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勵臣民進諫，也可以說出大致類似的話來。而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民主和民主監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約束掌權者，限制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侵犯人民的權利，不可能做損害人民的事。毛澤東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代肆意折騰的雄主，今後大概不會再有。民主憲政時代的真諦，他腦子裏完全沒有概念。

尼克松由於水門醜聞下台，毛澤東完全不能理解。他無論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這一點最足以說明他腦子裏毫無憲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松1974年下台，1976年秋毛澤東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兒夫婦倆拜訪毛澤東。單少傑教授在《輕談水門醜聞，調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據當事者的記載作了非常傳神的述評。請允許我略作刪節，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松遞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讀著……

「總統先生的腿怎樣了？」

「好多了。」

「好好保養他的腿。他說過還要爬長城呢。把這話轉告總統先生。」

「他已經不是總統了。」戴維·艾森豪威爾插進話來。這位尼克松的女婿正是毛澤東此次談話的真正對話者……

「我樂意這麼叫他，你管得著？」

老人家容不得半個「不」字。接著他又大加發揮地說道：

「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甚麼了不起？當你手中剛好有一台答錄機的時候，錄下一次談話有甚麼錯？誰讓你們美國有那樣多答錄機！」

為了美國，戴維不能同意這話。他說：

「這個問題很複雜，關係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辯，又搶過話來：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為甚麼不？簡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兩卷錄音帶就能把一個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是紙糊的是甚麼？甚至是衛生紙糊的。在東方人眼裏，西方政治帶著一股奶味。他們對水門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過似的。英迪拉·甘地說：「為幾卷錄音帶大吵大鬧，值得嗎？」薩達特說：「大驚小怪，統治者難道不允許進行統治嗎？」

前面我說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我的意思還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國人，而是指我們中國人，並且首先是指我們自己。當年我自己也是那樣看的。當美國為水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把

戲，是尼克松的反對黨民主黨煽動起來，愚弄老百姓的。後來看到共和黨裏也有人反對他，我認為這更可見資產階級政治的虛偽性，那些政黨的黨員不過是些政客，只為個人名利，見風使舵。近年來稍稍接觸一點美國和英法的歷史，才知道那是由於我自己太缺乏常識，對西方近代和現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實踐一無所知。改革開放以前，我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世界上再沒有甚麼社會科學。這種迷信把自己封閉起來，使自己由於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歲的飯，我相信現在七八十歲的我們這一代人中，像我這樣的不會只有我一個。

單少傑在他的文章裏說：

毛澤東在「水門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東西，恰恰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精華，即國家權力相互制衡的機制。在這種制衡的作用下，國家的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是至高無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權力的制約，即便總統也不能例外。如果總統做了假，犯了法，欺騙國會，蒙蔽人民，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相應的懲處。國會有權追究其責任，甚至有權彈劾他，把他攆下台。新聞媒體也有權批評他，使他在全國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贊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對票的選民中丟人現眼，無地自容。因此，在這種權力制衡下，很難產生出不受制約的獨裁政權或獨裁人物。這也正是那位居於至高無上地位，無人能管、無人能批的偉大領袖「不能理解」的。

單少傑這些話正是我想說的，我不能說得更好，所以乾脆抄下來。

三

最後再說說憲法的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一次全會上印發一張大字報，就把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打倒了。國家主席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的。何以這憲法就這樣如同廢紙，既不能限制毛澤東，也不能保護劉少奇呢？可見這憲法本身一定存在著大問題、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於是乎毫無用處！

所以我想，總結起這半個多世紀的經驗教訓來，我們中國的民主化要從修憲做起。首先就要研究憲法。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同時就是補上憲政民主這一課。我想不僅是我們老年人需要補這一課，恐怕許多年輕人也需要上這一課。順便舉個例吧，我現在居住的這機關宿舍區兩個小小的花壇上，豎立著幾塊紅字白底黑邊的牌牌，製作很工整。其中一塊上寫的是：「知法 懂法 守法 一個不能少；國事 民事 天下事 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幾塊寫的是「爭當文明市民」和「社區為我辦實事」之類，看來是有關機關統一製作或統一安排的。前一塊使我感到很遺憾，「知法、懂法、守法」當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時，還應當懂得「用法」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大家來研究憲法，討論憲法，然後大家來修憲、行憲！這又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則這種研究和討論根本不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言論比過去自由多了，比如現在各種

順口溜層出不窮，口頭流傳無遠弗屆。人們在朋友間、甚至在餐館裏，可以談論國事，不怕有人打小報告。但是人民能公開宣講自己的這些意見嗎？能舉行記者招待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嗎？報刊書籍能發表這些言論嗎？我國至今還沒有這種充分的言論自由，更沒有出版自由，雖然這些都是憲法上寫了的，卻還有賴於大家來爭取。所以研究憲法、討論憲法、修憲、行憲，又只有從爭取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大家跟我一樣，不願看到動亂，更不願再發生暴力鬥爭，那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中共十五大決定依法治國，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國的歷史能夠從此翻開新的一頁。中共是執政黨，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來，也來議憲、修憲、行憲。

所以，我認為，我們國家民主化的實現，還需要我們大家艱苦奮鬥，逐步前進，這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路。



重讀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

鍾沛璋

有一本很有意義的書：《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本書匯集了四十年代中共和一些民主人士們的言論，批評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並莊嚴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我跟李普同志說起，有一次機會，我把這本書當面送給了江澤民總書記，希望他能看一看。李普很高興，說這本書收錄了他過去的兩篇文章，現在他把這本書在香港再版，寫了一篇序。

歷史的遺憾

這本書裏記錄了1945年毛澤東與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一段對話。黃炎培說，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希望中共諸君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段周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李普對毛澤東的這些話不以為然，說標準至少太低。我說，這次談話，半個多世紀來被人們一再引用，說明人民對毛澤東的話是寄以強烈的希望的。遺憾的是希望的結果只是失望。怎麼來看毛澤東這段談話呢？我看，歷史的事實說

明，只能用四個字來概括，即：言而無信，這樣說被尊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似乎是大不敬，但是很抱歉，事實就是如此。

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蔣介石黑暗、獨裁的舊中國，與中國共產黨號召的光明、民主的新中國，兩個中國命運的搏鬥中，國民黨幾百萬美式裝備的軍隊，在短短的幾年中，被摧枯拉朽地打敗，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民意，全國人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而莊嚴的承諾必須通過切切實實的步驟去實踐。在取得政權之後，能否做到這點，正要通過歷史的檢驗。最早看出毛澤東問題的還是民主人士。張奚若就曾經對毛澤東提出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批評。最嚴重的大事就是輕率地放棄建國時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莊嚴通過的中國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

實行新民主主義，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各民主階級的聯合政府，在經濟上要發展，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業和手工業個體經濟、私人資本經濟和國家資本經濟等五種經濟。李普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誕生及其前後》一文，詳細記載了新中國隆重開國的盛況。當時中央人民政府除了毛澤東主席外，在6位副主席中，民主人士佔一半，在56位委員中，民主人士佔27位，也差不多一半。毛澤東曾莊嚴地宣佈：《共同綱領》「是我們現時的根本大法」。《共同綱領》中甚至沒有提出中國將來要實行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為此曾作過解釋：「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

業昌盛了以後，在多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才能走進社會主義的時期」。但是相隔不到四年，沒有經過全國政協，甚至沒有經過任何機構討論，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就宣佈從建國開始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大筆一揮，根本大法《共同綱領》就成了一張廢紙。

這樣，哪有甚麼民主，哪有甚麼早就承諾過的「人民來監督政府」呢？到 1956 年 1 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北京市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喜報。中國向世界宣佈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私有制。對此，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終生的被我國人民敬為「國母」的偉大女性宋慶齡先生，曾在 1956 年 1 月專門寫信給毛澤東，責問為何出爾反爾：「我們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前言了嗎？」毛澤東對這樣嚴正的批評卻輕蔑地不屑一顧。

缺乏民主，缺乏人民的監督，權力不斷膨脹，言而無信的事情就連續出現，中國人民的災難就接踵而來。1957 年，毛澤東號召黨外人士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大家來監督。開始時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忽然間又說是「黑雲壓城城欲摧」，把大家提意見說成是「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明明是所謂「引蛇出洞」的陰謀，卻強詞奪理地說是「陽謀」。結果把動員來的監督共產黨的 55 萬人民，一夜之間劃為人民的敵人。從此，中國人民無

人再敢言民主。中國共產黨也從此失信於天下。

再舉一例，就是 1959 年的廬山會議。會議確定的議題明明是要糾正大躍進、三面紅旗、造成「左」的錯誤，但是由於彭德懷中肯的批評，觸犯了毛澤東的尊嚴，會議主題立即變成批「右」。不但把一位赤膽忠心的開國元勳打成了反黨頭子，而且又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鬥爭」，使已經遭受嚴重災難的中國人民，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從此也無民主可言。

怎樣來看毛澤東這種言而無信的作為呢？也許從毛澤東對自己性格的分析中，可以找到點原因。毛澤東曾經說自己身上有「猴氣」，又有「虎氣」。甚麼是「猴氣」呢？就是無法無天的造反派脾氣。毛澤東從他年輕時「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爭其樂無窮，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到他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他把從陳勝、吳廣開始，中國歷代的造反頭子視為同志。從這點說，毛澤東身上的確充滿著「猴氣」。在革命造反的過程中，他提出過許多精闢的思想和見解，其中不乏真理，他贏得群眾，被擁為偉大的革命領袖，是理所當然的。甚麼是「虎氣」呢？「虎氣」就是霸氣。

魯迅生前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曾讀到過毛澤東的詩詞，感到有「山大王」的氣概，後來毛澤東寫了那首被許多人稱頌的著名的《沁園春》，歷數風流人物，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對歷代開國帝王情有獨鍾，要與他們比高低。建國之後，他又多次為歷史上實行專制暴政的秦始皇辯護，後來甚至明確地自比為「馬克思加秦始皇」。

把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革命導師，與實行暴政的專制君皇連為一體，實在是很滑稽的事。可見毛澤東的性格就是雙重的、矛盾的，他既有主張「民主」——更多的是「造反」的一面，又有熱衷於實行專制的一面。這樣，他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也就不奇怪了。

任何叱吒風雲於一時的領袖，都是很難與孕育生長他的土地和民族傳統割裂的。在我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農民造反，推翻專制的王朝。「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造反有理的農民領袖取得勝利後，又重新建立新的專制王朝。這就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在二十世紀我國這次最大的農民造反運動中（毛澤東曾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雖然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但從熟讀史書、「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身上，能說沒有中國歷史傳統的陰影嗎？造反的時候講民主、自由、平等，功成之後則重專制、獨裁，這正符合中國歷史的周期率。還是《國際歌》唱得好：「從來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但是遺憾的是，半個多世紀來，我們既唱《國際歌》，同時又唱《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許多年來，很少有人對此表示過懷疑。這恐怕也是我們的「中國特色」吧！

民主少一點

毛澤東當年與黃炎培關於民主的談話，粗聽起來很好，仔細一分析，就感到毛澤東說的民主少了一點，民主

成了民王。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就是要建立民是主，官是僕，主可擇僕，主可制僕，主可逐僕的民主體制。要建立人民有知情權、參政權、選舉權、監督權、意願表達權等的法律保障。民主少一點，就是把民主變成「為民作主」。把「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作為當官治國的最高標準。不能說，中國的歷史傳統中，一點也不重視民。孟夫子就說過一句傳之千古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許多造反起家的帝皇也知道「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利害，因此也常常說要臣民進行監督，表示願意納諫。毛澤東重視的唐朝開國皇帝唐太宗，就把愛提意見的大臣魏徵，稱之為能對照自己的一面「寶鏡」。而這一切都不妨礙，或者說只是為了有利於維護在我國推行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如果要把這也稱為民主，或謙虛一點，說包含著民主精神的話，那跟起源古希臘、經過幾個世紀許多國家的錘煉下，完善於二十世紀的現代民主，真是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再看看事實的發展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生日那一天，毛澤東發表了一篇雄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宣佈我們將要成立的新中國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受過一點民主教育的我，當時不大想得通。我們不是要成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嗎？為甚麼還要加上專政這兩個字呢？經過學習，明白了專政是對付敵人，行使國家的鎮壓職能。但是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不也都有鎮壓敵人的職能，為甚麼我們卻要嚇人地標明專政呢？我帶著這個疑問，一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到那時忽

然聽到宣佈說：「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就不僅僅是對付敵人，而是對付造反派之外的所有的人。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狗頭軍師張春橋還發表長文說，要對廣大人民實行包括上層建築領域的全面專權。真是一片不知是紅色還是白色的恐怖。

那麼無產階級專政又是甚麼呢？查查《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關於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再查其他著作，馬克思只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過渡，並沒有把它作為一種無產階級的國家形式。再查查列寧的著作，在十月革命前，列寧說過，如果沒有黨派在選舉中競爭，「人民揭穿騙局、查明真相的辦法也會少得多。」後來還提出了「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就意味著要實行多黨制，因為參加蘇維埃的，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外，還有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無黨派人士，布爾什維克還只佔少數。但是十月革命炮聲一響，情況就變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都離開了，多黨制變成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另一面，由於戰爭和嚴重饑荒，造成法制廢弛，秩序混亂，出現搶劫，怠工，於是成立了名為肅清反革命和怠工委員會的契卡，大肆濫殺無辜。一位共產黨員寫信給《真理報》稱，「我們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變成了一切權力歸契卡」。德國的革命領導人羅沙盧森堡就曾尖銳地批評列寧：說他不是在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搞對無產階級專政。後來斯大林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他的專政工具克格勃，不僅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而且把一大批老布爾什維克（包括黨的中央委員、蘇維埃

軍事委員和政委、人民委員會委員等) 都一起殺光。高爾基曾經痛心地指出：「不久前的奴隸在他獲得了充任別人主宰的可能後，就變成最肆無忌憚的專制。」(引牧惠：《德先生、賽先生與「以俄為師」》) 陳獨秀針對蘇聯這種情況，當年就指出：沒有甚麼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領袖專政。斯大林藉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個人專制獨裁之實，與人民為敵，屠殺了大批人民的精英和無辜，為日後蘇聯的崩潰，種下了禍根。向這樣惡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要民主，豈非虎口拔牙？

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所構建的，是以黨治國、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直接阻塞了國家通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阻塞了人的自由發展的道路，也阻塞了黨自身的民主化道路。

毛澤東既熱衷於無產階級專政，對提倡民主還是很不放心，又推行列寧所倡導的所謂「民主集中制」，說要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民主。看起來很符合辯證法。說穿了，是在民主之上加個集中，這是「為民作主」的另一種說法。誰來集中，誰來作主呢？當然就是偉大領袖了。

列寧曾經說過，要大家做革命的螺絲釘。這句話曾經長期被我們黨的思想政治者所引用。中國的劉少奇還創造性地提出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這在「文革」前，也曾一度被奉為經典。現在我們都可以認識到，這些說話都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因為這些說話都是提倡專制主義的人身依附。在人身依附思想的指導下，當然就不可能是「主權在民」，而只能是「為民作主」了。

由此可見，要不要民主，要甚麼樣的民主，關鍵還在於怎樣看待人，是著眼於人的解放呢？還是把人作為依附的工具，可以被專政的物件，或者就如歷代皇帝眼中的蟻民、奴隸？

恩格斯晚年，曾有記者問他：你認為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什麼？恩格斯回答，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這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毫無疑問，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要真馬克思主義，還是要假馬克思主義，要真民主，還是要假民主，這就是試金石。

大權不可獨攬

權力是好東西，又是壞東西。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鄧小平總結新中國幾十年的經驗教訓，說過一段很痛切的話：「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甚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就

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們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為甚麼在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呢？1979年，我作為中國青年政治家代表團的成員，到美國訪問考察。我走馬看花地看了美國的總統府白宮，看了美國的國會，翻看了他們提供的一些材料，還帶回一本美國的憲法，卻沒有搞得很明白。因為當時我的思想還是認為，美國的民主是虛偽的，是為美國的資產階級、富人服務的。但是有一點，我當時的印象是深的，就是感到美國的總統不好當，不像蘇聯的領導人那樣「一言九鼎」，可以一個人說了算。

最近翻閱美國這本兩百多年就制定的憲法，感到的確不簡單。自從這部合眾國憲法實行以來的兩百多年，儘管美國發生過許多大事，打過四年的南北戰爭，還與多個國家發生過戰爭，但是美國是至今為止世界上政局最為穩定的國家。不論聯邦總統，還是國會議員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在按照憲法的規定，按部就班，一絲不苟地進行他們的權力交替。

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如1968年，民主黨肯尼迪以微弱票數險勝共和黨尼克松。共和黨內有人提出，肯尼迪方面有和工會及黑社會聯手拉票的行為，提出不承認選舉結果。尼克松制止了，要求大家尊重憲法，服從選舉結果。而近次的美國選舉倒了過來，共和黨的布什與民主黨戈爾的選票數長時間相持難分上下，最後是共和黨布什以微弱多數勝了戈爾。儘管在競選過程中，戈爾曾與布什鬧得不亦樂乎，但是最後還是大大方方地承認自己失敗，祝

賀布什當選。憲法在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國也有憲法，但在我國老百姓的心目中，並不那麼至高無上。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殘酷事實教育了大家。我國的憲法既保護不了普通的老百姓，甚至連當年領導制訂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自己也保護不了。沒有經過憲法規定的任何法律程式，僅僅是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把共和國主席打倒了，甚至一直迫害到死，連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死者竟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說老實話，老百姓不知道我國今天的憲法是否已經管用。

美國憲法成功的奧秘在哪里？這是當今世界政治學的一門學術研究課題，吸引著許多學者、專家的研究。我對此不學無術，但是我感到是否主要是兩點：

一是「主權在民」。這是十七世紀乘坐《五月花》號船移民到新大陸的人們，從一開始就深入人心並且代代相傳的思想。美國的憲法樸實無華，它的基本原則就是保障每個個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自由和平等。制定憲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進全民福利，讓民眾自己能安享自由幸福。而人民民主的權力，又必須在法律的範圍之內，不同於我國的「文化大革命」，高喊「人民萬歲」，可以無法無天。雅典民主的滅亡，也正主要是因它宣佈人民高於法律。

一是「大權不可獨攬」。1787年5至9月，從全美十三個州到費城參加制憲會議大約55名代表，其中既有馳騁疆場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又有許多飽讀法律政治百科全書的律師和法官，還有許多有豐富行政和社會經驗的議員、

州長、商人和農場主。他們代表著大小不同州的各自利益。他們都是些十分精明幹練、善於盤算和討價還價，又懂得適可而止的人。在緊張、激烈討論中，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最大擔心，就是害怕大權被獨攬。因此代表們達成一個共識：要建立一個任何利益集團都不能單獨控制的全國政府。他們反復討論如何規定權力之間的互相制約和平衡。他們認為防止政府權力自我膨脹的首要前提，是防止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分支的勾結，防止官官相護。因此認為把三權分立換成一元化是絕對不可取的。為此，1787年的制定的憲法中，作了兩個設定：全國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之間的權力劃分。

儘管如此，大家還是擔心政府的權力會膨脹。因此到1789年，首屆國會又通過了十條憲法修正法，即權利法案，作為合眾國憲法的一部分。權利法案是對聯邦政府權力的限權令。它的第一條就是：「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因此可以說，美國的憲法是用來管政府的，是規範政府的行為的，而不是管老百姓的。刑法和各種私法才是用來管老百姓的。

每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各不相同，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去照抄外國的憲法。但是有一點是應該借鑒的，就是權力之間的互相制約和平衡，防止某一方面權力的膨脹和失控。我們的歷史教訓正在於此。領袖權力的膨脹和失控，曾給我們民族造成了最大的滅難。為甚麼今天腐敗之

風還屢禁不止呢？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於道德、思想，而在於鄧小平指出的制度，在於缺乏制約和監督。君不見，到現在到處還是「一把手」說了算，無人可以制約、可以管嗎？

民主還是要向西方學習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經濟，以及文化藝術的某些方面，已逐漸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在政治領域，卻還存在很大的禁區。比如關於民主，許多人還是抱著二十多年前我訪問美國時的想法，認為西方的民主是虛偽的，只是為富人服務的。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世界上最高、最優越的民主。至於說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等那一套，更是不能考慮，好像我們建國初期立下的「祖宗之法」，是不能動的。

我想，還是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來打開自己的思路。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明確地承認：民主的思想就是從西方來的。中國只有專制主義的傳統，而沒有民主的傳統。在專制主義制度下，中國的確也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出現長城、兵馬俑，以及絲綢之路等等。甚至直到五百年前，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自從人類社會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專制制度越來越嚴重地束縛中國的發展，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因為專制制度把人當作奴隸，束縛著人的聰明、智慧、積極性和創造性。西方國家自從

文藝復興之後，越來越重視人的權利、人的解放，發展了民主制度，使科學技術蓬勃發展起來。我們中國像沉睡的東方巨人，直到帝國主義的大炮打到了頭上，才醒過來，感到必須要向西方學習了。但古代文明的包袱實在太重，總是想把科學、技術同制度、文化分割開來，認為「祖宗之法」是不能變的。鴉片戰爭之後，幾經努力，幾經失敗。直到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倡導了共和。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就是中國向西方學習民主的第一份偉大成果。1917年的五四運動，是喚起衝破專制制度網路，求得人的解放的偉大啟蒙運動。中國人再不能停留在阿Q那樣的精神狀態了。中國的另一位偉大先行者、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中國開始學習求得解放的西方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

1940年，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綱領，這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民主的第二份偉大成果。粗略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可以看出很久以來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民主。直到1945年9月，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如何領導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注：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怖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與民主強國的合作。」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不但主張要學習二百年前（林肯時期）美國的民主成果，還主張學習二十世紀（羅斯福時期）美國的民主成果。本來，人類社會在不斷向前，中國要與時代同步，就理所當然地應該不斷吸取人類社會的新的成果。比如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些國際公約等，都體現了全世界人民在不斷探索人的解放過程中的思想結晶。對於把「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作為自己最基本信條的馬克思主義者，難道不應該關心和接受這些成果嗎？遺憾的是我們對此總是設置了許多防範，向公眾介紹得太少，使許多人還處於蒙昧無知的狀態。

再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我們看到，民主政治、高新科技和市場經濟，是二十世紀驅動人類社會向現代化高速發展的三駕馬車。這三者互相作用，結果是人的主動性、創造性高度發揮，社會的財富成倍數地增長，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不斷縮小。民主政治、高新科技和市場經濟是互為條件、互相關聯的。大量事實證明，如果缺少民主政治，高新科技就不能高速發展，市場經濟就不能順利運行。過去有人認為民主政治只適應於西方國家，東方國家很難適應。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就認為中國人落後、素質差，就搞長時期的所謂訓政，而遲遲不肯推行憲政。

事實證明，像印度那樣各邦操不同的語言，有著多樣化的宗教，社區性暴力事件和社會失序現象不斷的東方國家，在1947年獨立之後，不但推進了民主政治，而且還出

現了奇蹟。例如過去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饑饉不斷，自從印度建立了多黨民主政治和實現新聞自由之後，饑饉突然消失了。這使我不禁想起，1958年我國「大躍進」後突然出現了大饑荒，餓死了那麼多人，這難道跟人們當時沒有講真話自由，缺乏民主，沒有關係嗎？

當然，我們還必須看到，美國式民主只是為其本國各種不同利益和衝突建立緩衝的調節機制，而在世界範圍，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卻沒有受到制約，成為不折不扣的霸權國家。這要通過世界多元化，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努力創建世界民主的新秩序。民主是美好的，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際，都只有在對權力的制約中，才能實現。

現在不論是西方或是東方，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國家都選擇了民主政治，認為這是促進自己國家穩定進步和發展的最好的政治體制。中國是有十三億人的大國，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當然有它的複雜性和困難。但是想想，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革命根據地就進行過村、鄉、縣三級的直接選舉，在經歷半個多世紀社會主義教育，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都已有了廣大發展的今天，怎麼會沒有能力去完善我們的民主政治呢？只要有敢於打破束縛自己的僵化的教條主義，發揮眾人的智慧，本著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信念，堅定踏實地開拓前進，美好的前景就一定會實現。

憲政民主：現代政治合法性基石

——為《民主的先聲》(香港版)而作

何家棟

收集在《民主的先聲》書中的文字，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發出了挑戰，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制度。一時舉國回應，聲勢浩大。這本書就是當時報刊有關憲政民主論的一部分文章的結集。

《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於中國古代的政權來說，「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壟斷有組織的暴力，抵禦外來侵擾，維持國內治安，是政權得以存在、統治得以施行的現實基礎。而祀天拜祖，神道設教，則為政權提供了一種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礎。合法性就是對統治權的認可。沒有獲得某種普遍性的認可，單純憑藉直接暴力和強制的統治，會使整個社會處於持續的緊張之中。

盧梭說，「最強者也不能總是強大得足以永遠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轉化為權利和服從的義務」。在近代以前，為政權提供合法性依據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各種形式的「天命論」或者說「君權神授論」。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一般也就是維持兩百年左右，其間伴隨著「洪水將出，災火且起，

蕩滌民人」的戰亂，可見「天命論」不能提供國家長治久安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在它的觀念結構中，內在地包涵著「受命改制」，「聞誅一夫紂矣，未聞眾君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而在重新「受命」的轉折關頭，玉石俱焚就不僅是難免的，而且是「改天換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取代「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的是社會契約論和憲政民主論。在市場的啟示下，人們逐漸把政治統治的領域與神聖的領域區分開，將其還原為一種世俗的交易行為。納稅人出錢養活政府，政府則為納稅人提供公共安全，以後政府又增加了若干項社會福利，但納稅人必須拿出更多的錢。

「消費者是上帝」，哪個政府及其領導人能夠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納稅人就選擇誰。把政權（主權）和治權分開，主權屬於人民，治權委託給政府，用定期選舉領導人的憲政程式來代替不可預測的「改朝換代」，給現代社會帶來一種政治穩定與政治創新的動態平衡。英國作為憲政民主制度的開創者卻至今沒有一部成文憲法，美國憲法的基本結構和多數條文二百年來保持不變，說明憲政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不是紙面上的漂亮許諾，而是公眾對於保障基本人權和限制政府行為的程式性的共識。

馬克思主義作為「理性時代」巔峰期的產物，用人的「理性」置換了上帝的「神性」，通過科學主義的「真理觀」，滑向了天命論的新變種——歷史決定論。天命論和歷史決定論所面對的共同挑戰是，如何客觀地做出評判：誰能夠奉天行道？誰是歷史的真正代言人？馬克思對自己的理論很有信心，因為在他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代言人不是

一兩個先知，而是整個工人階級。他並不想否定憲政民主，而是想用「科學真理」這一新的合法性依據來補充和增強前者。既然工人階級正在上升，即將成為人口的大多數，那麼政治民主正是工人階級解放自己乃至解放全人類的必由之路。

憲政民主論與科學真理論並存的格局沒有持續很久。1918年1月5日，是俄國立憲會議開幕的日子。這是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全民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包括布爾什維克黨在內的俄國民主派為這一天已經奮鬥了近一個世紀。但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沒能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取得多數。在4440萬二十歲以上的選民投票後，布爾什維克得票率只有24%，遠遠低於社會革命黨的40%，在715個議席中只佔了175個。列寧當即發表文章說：「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革命的口號。他親自坐鎮立憲會議開幕的會場，指揮配備大炮和機槍的武裝力量驅散了出席立憲會議的代表。從此，「人民代表」被「代表人民」所取代，科學真理論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執政的唯一合法性依據。

中共的處境要複雜得多。在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和《論聯合政府》的一段時間裏，「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天命論被國民黨、蔣介石所壟斷，科學真理論的宣傳也受到「擁護孫中山三民主義」自我承諾的約束，聚集在中共旗幟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就成為憲政民主論的熱心鼓吹者。1945年2月17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的才是合法的》中說：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應當是一致的，因為國家一切的法都應當是經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議決的，

所謂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決定，合乎人民的意志。社論支援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所闡述的觀點：「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成，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式來達成」。對於民主程序的強調，乃是得憲政民主真諦之論。

「運用美國影響的另一個方式是美國人多談論美國的理想，每一個在中國或在美國與任何中國官員會晤的美國官員都可以談談民主。……每一個在華的美國士兵都應該是民主的活廣告。他應該向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說到底，我們中國人把你們美國人當做民主的典範。」「中國人民懂得民主，並且需要民主。民主並不需要很長的經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很精明，並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過是主張民主和社會改革。」如果上述言論不是由官方刊物《黨史通訊》披露出來，很難想像是當年毛澤東對美國人親口所說。既然有黨的領袖作榜樣，《新華日報》發表《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樣熱情洋溢的社論也就不會令人吃驚了：「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環。……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

數位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1949年以後的歷史再一次證明，科學真理論與憲政民主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是不能兩全的。對「民主自由的中國」的背叛正是始於不誠實。毛澤東本來對於「大民主」具有相當的自信，但是當知識分子在他的鼓勵下真正起來參政議政時，他馬上變成了好龍的「葉公」，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陽謀」。「科學真理」也要經受實踐的檢驗。當幾千萬中國人餓死於「三面紅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之下，「科學真理」便很難繼續作為執政的合法性依據。於是，就需要編造神話，煽動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退而乞靈於傳統的「天命論」。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除了執政黨及其領袖永遠是「科學真理」化身的迷思，通過民主方式重建政治合法性是八十年代中共黨內外改革派的共同要求。鄧小平在1980年和1986年兩次推動政治改革，都因黨內「理論權威」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遊說阻撓半途而廢。「貓論」、「摸論」和「政績論」本來可以成為向憲政民主論過渡的仲介，但是如果試圖以它們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一百年不動搖」，就

變成了淺薄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指出，意識形態的感召力會隨著國家官僚體制的僵化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加劇而衰落，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並使該政權靠經濟表現的基礎來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這樣，在共產主義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初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但是，當這種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就不可能再發展出建立在經濟表現之上的合法性。「威權政權幾乎毫無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績當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來源的話」。為了換取民眾的支援，威權政權的領袖們往往被迫作出儘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諾，而且他們還要反復強調這種經濟增長是在其他政權領導下根本無法實現的。

民主國家也講政績，但只是用政績來衡量和取捨政治領導人，而不是用來為政治制度辯護。對於威權政權來說，則存在著亨廷頓所謂「政績的困局」。他指出：在民主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賴於他們滿足一些關鍵選民對他們政績的期望。但是這一制度的合法性卻建立在程式之上，建立在其選民通過選舉選擇其統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職的統治者不可避免會作不出政績，這樣，他們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會在選舉中被擊敗。一群新的統治者會接替他們。因此，統治者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導致了這個體制重新肯定其程式的合法性。但是在威權體制下，政績平平既瓦解了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這一制度的合法性。九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城市

工人階級的失業現象急劇增加，社會兩極分化日益明顯，雖然知識分子的民主呼籲和民主運動沒有八十年代曾具有的聲勢，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感卻比那個時候大大下降了。

「政績合法性」不可能長命百歲，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不是凹點的穩定而是凸點的穩定，它不是向「憲政民主合法性」前進，就是向「科學真理合法性」和「天命論」倒退。但是人們不無遺憾地看到，歷史關鍵時刻在思想舞台上「閃亮登場」的，卻是一些喬裝打扮的老演員。

所謂「三個代表」，如果按照原《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的解釋，是為了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通過修改黨章，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那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共產黨的老祖宗恩格斯就是個工廠主。

如果是要用它奠定合法性的新基礎，則是從「政績合法性」倒退之舉。憲政民主論的精髓是基本人權觀與權力制衡機制。如果不能切實保障每一個人的憲法權利和自由，不論是「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兩個代表」（工農聯盟）、「三個代表」（工、農、勞動知識分子）、「四個代表」（五星紅旗上的四顆小星，即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乃至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全民黨」，全都是換湯不換藥。憲政民主論並不十分關心政府代表誰（哪個或哪些階級），而是關注它怎樣代表，以及公民通過怎樣的程式來制約自己選出的代表。不能說一個政權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代表性，就可以為所欲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政治學的一條公理。如果沒有權力制衡機制，私營企業家加入統治集團，只會加劇權錢交易，黑白道結合，使

腐敗現象愈發不可收拾。

按照憲政民主論的觀點，在「先進的價值觀」、「階級的根本利益」等與執政合法性之間不能建立剛性的聯繫，上述種種都需要在公正、公開的全民普選程式中來表達和驗證自己。韋伯認為，現代國家的決議只要符合法律程式，就足以體現政治的合法性而沒有必要考慮價值觀。被認為是合法性一種形式的正式法定性在政治學中所起的作用相當於客觀事實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所起的作用。由於不可能證實價值體系的真實性和存在於這些結果中的衝突關係，所以在缺乏更好的方法證實時使用了正式的法定性。為履行統治者的理性的和法定的制度，最適合的組織形式就是官僚機構，它避免了把政治陷入無休止的多種對抗勢力的爭鬥之中。法律不再是一個基本規範原則的表述，而是一種能夠根據實際需要轉變的機制，以正式而獨立的方式在對抗的價值和利益中找到妥協方案。精英的先進思想通過全民選舉機制和官僚機構的淬火、鈍化可能會影響一點時效性，但從總體上說這種延緩還是有好處的。根據波普的「試錯論」，任何人都無法掌握終極真理，精英也不例外，由於大多數選民和官僚機構天生就有保守的傾向，讓他們來給政治改革家們把把關，可以減少社會漸進改造工程中不必要的損失。

所謂「德治」，如果是用來規範執政者與官員的個人行為，不失為一劑溫補之藥如果用它來補充法治，試圖以二者的混合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礎，由於藥性的相克，弄不好就會成為一劑虎狼之藥。朱鎔基以做「清官」自勉，

說明當下做一個清官並不容易。新時代的清官起碼要做到「四不」：不說謊、不苟且、不貪財、不好色。說假話，掩蓋事實真相，口是心非，是一切政治腐敗的源頭。不能從這個源頭上反腐敗，所謂「德政」、「德治」都是畫餅充饑而已。

「德」的概念在中國始於商周更替之際。「德政」一說雖然常常用於君臣之間的互勉，但更多地被用來論證改朝換代的合理性，即從「失德」這個反面意義上來理解，所謂「五德終始」、「五德更王」。董仲舒認為：失德之君，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有道伐無道，易姓更王，「此天理也」。孔子曾感慨：「知德者鮮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見從人性論的角度來說，把希望寄託於「德治」是何等的不智。現代政治的運行機制不能依賴於執政者皆為「有德君子」的假設。從政治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說，「德」的旗幟從來都與反對黨具有天然的親和力，而很少能夠給執政黨增添光彩。依託憲政合法性，萊溫斯基醜聞還不至於嚴重干擾克林頓政府的運轉；如果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德治的基礎上，類似的敗德醜聞就會動搖國本。

重塑合法性，是中國政治改革必須邁過的一道門檻。否則，革命的情緒便會在地下蔓延滋長，執政者惶惶不可終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各項公民的憲法權利也不可能真正兌現。毛澤東曾說，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

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美國所有的報紙、電視幾乎天天報憂不報喜，專門和政府對著幹，可是美國存在了兩百多年，至今還沒有垮台。近年來頗有人論證說，中國經濟必須保持 8% 以上的高增長，否則就會影響到政治的穩定。可是在其他民主國家就從來沒有這麼一說。這就是「科學真理合法性」、「政績合法性」與「憲政民主合法性」的區別。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管他甚麼合法性不合法性，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槍桿子保江山」，行不行？歷史證明，秦始皇不行，馬克思加秦始皇也不行。秦始皇還有個兒子接班，「馬秦始皇」到二世便已「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在城鄉差別「九天九地」的時候，讓穿軍裝的農民向城裏人開槍還有可能，但是蘇聯東歐的經驗證明，一旦城市化基本實現，人民子弟兵朝自己的父老姊妹擺動扳機就下不了手了。

亨廷頓指出：面對政績合法性的剝落，威權主義領袖們可以而且確實是以下列五種方式中的一種或數種來作出反應。首先，他們可以直接拒絕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時希望或相信他們能夠把權力保持下去。於是，他們便像撈救命稻草那樣大肆渲染民主轉型的失敗案例以及民主政權的種種弊端，企圖由此獲得某種「負面合法性」。

其次，威權政權可以試圖通過用強制的服從來取代日益渙散的義務而生存下來。如果政權的領導人能夠就這一

過程達成一致意見，他們也許能夠推遲其不斷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後果。

第三種選擇是挑起外部衝突，並試圖通過訴諸民族主義來恢復合法性。但是，挑起一場戰爭是一項風險很高的策略。

第四種選擇是為他們的政權塗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現存的多數威權政權宣稱，他們將在適當的時候實行民主。隨著他們的政績合法性的下降，他們將面臨越來越重的壓力，要求他們兌現上述許諾。

第五，威權政權的領導人可以毅然絕然、因勢利導地主動結束威權統治，引入民主體制。這種情況常常發生，但總是先要求有威權體制下的領導階層內部的人事變動。我們希望，中國的前途將是上述第五種選擇，通過憲政民主體制來重塑政治合法性。這既是改革創新，也是傳統複歸——兌現「中共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重读50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入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谨以此书纪念50年前民主与独裁的历史性决战；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此决战前仆后继的中华英烈！

ISBN 7-81036-345-X



9 787810 363457 >

ISBN 7-81036-345-X/Z · 42

定价：20.00元



建 国 五 十 周 年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汕 头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

ISBN7—81036—345—X/Z·42

- I·历…
- II·笑…
- III·论民主—社会评论—选集
- IV·24

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责任编辑：英子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固安新知识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50千
版 次：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81036—345—X/Z·42
定 价：20.00元

